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在職專班論文

指導教授：朱新民老師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民進黨對中共一中框架的策略（2012-2015）

研究生：邱宇健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七月

謝　　誌

在動筆要寫論文的那一刻，驀然回首才發現兩年研究生的日子竟如此之快，還沒來得及感覺自己究竟這兩年學到了什麼，卻已到了必須對這一趟短暫的學術之旅做出結論的時刻。

能完成這篇論文，最要感謝的當然是論文指導老師朱新民教授。事實上，在一年級下學期聽朱老師教授「中共對台政策」時，其對九二共識辨思之清晰，兩岸關係論述之完整，我就已決定找朱老師當論文指導教授，甚至決定好論文題目與方向；只是我論文動筆動得慢，如果沒有朱老師的鼓勵跟下達指令的魄力，懶散如我就不可能在截稿前把論文趕出來，幾次跟朱老師提及想要延後論文口試的日期，他總是一句「趕快交出來就對了」，逼得我總算跟上同組同學的腳步，在期限內完成論文上架；也感謝邱坤玄教授、張登及教授兩位口試委員給我的指導，修正論文初稿不成熟的部份。

此外，我也要感謝機緣巧遇而結識的廈門大學陳先才教授，因為與陳教授多次的交流，讓我深刻體會到自身對兩岸關係認知的不足，才有動機報考政大國安專班，也才有機會完成這篇論文，所以藉此感謝陳教授這位亦師亦友的好朋友。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同學以及助教，因為有你們的陪伴與扶持，容忍與體諒，我才得以順利完成學業，就讓我在這裡衷心的說：「謝謝大家！」

邱宇健　謹誌於板橋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摘　要

2012 年 1 月 14 日，台灣總統大選結束，敗選的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在發表敗選感言時說，「這一次，我們已經接近山頂，我們還差一哩路。」一樣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召開，政治權力結構重組，接任的習近平的對台政策明確從九二共識轉向一中框架。究竟蔡英文的這最後一哩路與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有多少關連，民進黨要再取得執政權應該如何調整其中國政策，本文從中共形成一中框架對台政策的形成背景與意涵，對照民進黨各派系的中國政策，並分析歷次台灣總統大選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論述主張與選舉結果的關連性，來探討強調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民進黨，在國際局勢、兩岸因素、內部意見的整體環境下，如何突破中共所設下一中框架的兩岸關係：發現民進黨雖然有各種強硬手段與柔性手段來突破一中框架，但比較具體可行者僅外交手段及交流手段，因而提出五個穩健做法：一、進行心態調整，突破一中不等於要建立臺灣共和國。二、強化維持現狀的論述。三、營造正面和平安全環境，兩岸與外交並重。四、建立兩岸交流平台，維持台海的穩定。五、全球化視野下建立兩岸經濟競合關係。希望民進黨在主動宣示不追求法理台獨，並積極與中共展開交流的情況下，能增加民、共政治互信，共同維持海峽兩岸的和平穩定發展。

關鍵字：九二共識、一中框架、兩岸關係、政治互信、民主進步黨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January 14th, 2012, the lost DPP president candidate, TSAI Ing-Wen, made a concession speech after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Election, and she said "we are so close to the top of hill, and next time, we will make the final mile. "In the same tim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and the power structure in the CCP was redistributed. The successor, XI Jingping changed the Taiwan policy explicitly from "1992 Consensus" to the "One China Framework." How DPP's China policy will influenc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final mile." and how DPP adjusts its China policy to be in power again? This thesis is trying connect the results of president elections and the DPP's party platform related to China policy to see how DPP, a party highly expecting Taiwan's independence, break the "One China Framework" via compromising wi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cross-strait issues, and domestic society. I fine that the most feasible policies are diplomatic and communicated leverages, no matter how many tools that DPP have. Therefore, I provide 5 policy implications: 1) Changing old thinking. Denying "One China Framework" does not mean that the declaration of Taiwan's independence. 2) Maintaining status quo. 3) Keep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cross-strait via diplomatic leverage and China policy. 4) Establish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o stabilize the peace in Taiwan Strait. 5) Encourage posit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relations for both sides of Strait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era. I expect that the cross-strait peace and mutual trust can be created by the public declaration of not legally pursuing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intensified interactions with China.

Keywords: 1992 Consensus, One China Framework, Cross-Strait relations, Politial mutual trust, DPP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7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9
第五節　研究架構 12

第二章　中共一中框架形成的背景與意涵 15

第一節　中共一中框架形成的背景 15
第二節　一中框架的意涵 26

第三章　民進黨目前主要派系的中國政策論述分析 34

第一節　新潮流系的中國政策論述分析 34
第二節　英系-蔡英文的中國政策論述分析 38
第三節　謝系-謝長廷的中國政策論述分析 42
第四節　蘇系、游系-蘇貞昌與游錫堃的中國政策 45
第五節　其它論述 48

第四章　民進黨中國政策與獲取執政權的關連性 51

第一節　國際社會的關連性 51
第二節　兩岸的關連性 57
第三節　台灣內部的關連性 6

第五章　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對策研究 64

第一節　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戰略意圖 64
第二節　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機遇與挑戰 66
第三節　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手段方式 71

第六章　結論 83

第一節　研究發現 83
第二節　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務實作法 8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參 考 書 目.....96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圖目次

圖 1-1：本文的研究架構.....1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目次

表 1-1：未來可能途徑分析.....87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2012 年 1 月 14 日，台灣總統大選結束，馬英九總統順利連任，敗選的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在發表敗選感言時說，「這一次，我們已經接近山頂，我們還差一哩路。」她強調，「下一次，我們一定可以走完最後一哩路！」

這一句「差一哩路」，讓台灣社會和民進黨一度把敗選的「罪過」，歸咎於蔡英文「模糊的兩岸關係」；畢竟在選戰過程中，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一直採取不正面表態的策略，讓國民黨與中共有空隙大打恫嚇及利誘的戰術。因此，民進黨內不少中生代，甚至包括前行政院長謝長廷，都曾在選後建議，民進黨在兩岸政策的路線上，應該往中間修正，否則很難跨越邁向執政的「最後一哩路」。

然而，如果兩岸關係真的是民進黨邁向執政的「最後一哩路」，那麼民進黨的中國政策究竟該不該調整？該往哪個方向調整？是否如同謝長廷主張的向中間靠攏？如果是，要向中間靠多近？

讓我們回顧歷史，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上出現了許多「分裂國家」，例如東西德、南北越、南北韓以及台灣海峽兩岸，每個分裂國家的分裂模式、原因不盡相同；如今東西德、南北越已統一，南北韓雖尚未統一，但兩國互相承認且都主張未來要統一，只有海峽兩岸的中共與台灣對於未來是否統一產生歧見，而且雙方對彼此的政治地位存在著不同解讀。尤有甚者，在統與獨的拉踞中，台灣內部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政黨，也存在著對台灣政治定位的不同認知。

1997 年 7 月，時任台灣總統的李登輝先生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提出

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1]將兩岸政治定位的問題檯面化，接著在 2000 年陳水扁總統執政後，提出兩岸的政治地位是「一邊一國」，讓兩岸關係進入冷凍期，但接續著的 2008 年政黨二次輪替，馬英九公開說明兩岸關係依照憲法是「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而且接受九二共識。

事實上，自 1949 年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全面潰敗而遷台以來，兩岸一直處於分治的狀態；剛開始分治時彼此都追求統一，堅定只有「一個中國」，但台灣經歷解嚴、修憲、政黨輪替，逐漸對「一個中國」產生抗拒，因此即便 2008 年馬政府上台，也把底限設定在「不統、不獨、不武」。

如果說，馬政府的中國政策讓兩岸進入交流頻繁的新時代，讓蔡英文在 2012 年總統大選輸了這一哩路，民進黨就很容易陷入以下兩種繞不出的死胡同：一種是尾巴主義，檢討蔡英文敗在兩岸政策，敗在不承認九二共識；另一種是極端主義，檢討蔡英文敗在中間路線，敗在蔡英文未高舉台獨旗幟。其結果是前者只會讓蔡英文變成中共國台辦和馬英九的跟隨者，後者則會讓蔡英文陷入逃避現實的自我催眠，[2]讓民進黨走回老路。

因為這個結果，形成了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動機：後馬英九時代的民進黨中國政策該何去何從？蔡英文在 2014 年 7 月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我們也有信心，將來可以和中國維持一個穩固的關係，讓兩岸關係不會因為政黨輪替受到影響。」然而，在 2014 年地方大選國民黨大敗後，雖已證明台灣人民已動搖對馬政府大陸政策的信任，但民進黨內對兩岸關係的走向卻仍未獲致定論，更遑論要如何和中國維持穩固的關係，所謂的台灣共識其實還沒有共識，尤其民進黨中國政策第一道關卡並不在中共接受與否，而在民進黨支持者及台灣選民接受與否。換句話說，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要能幫助民進黨取得執政權，否則再完美的中國政策論述也無濟於事。

---

[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特殊國與國關係：中華民國政策說明文件》（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9），頁 1-9。

[2] 阮銘，〈蔡英文的最後一哩路〉，《南方快報》，2012 年 2 月 13 日，http://www.southnews.com.tw/specil_coul/Yuan/00/00145.htm，查閱日期：2014/12/22。

也因為有第一個研究動機，因而產生本文第二個研究動機：在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情勢下，民進黨中國政策與取得執政權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因果關係？以目前台灣情勢，各政黨間最大差異在於對台灣「國家定位」與「主權論述」的主張不同，前後執掌台灣政權的國民黨、民進黨對此之主張又分列於光譜兩端。從 2000 年到 2008 年民進黨主政的八年來看，民進黨在執政機會與中國政策兩條軸線的操作，不僅影響國內政局發展並在 2004 年再次贏得執政權，也影響中共對台政策的調整。然而，2008 年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軸線並未變動，卻喪失了執政權，甚至在 2012 年繼續吞敗；所以，未來民進黨在中國政策的定調上，要同時兼顧選舉考量與中共態度，本身就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難題。

貳、研究目的

鑑於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彼此間的政治定位問題也愈發無法迴避，而當前台灣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中共圖謀對台灣的主權，並存在著對台軍事威脅的行動整備能力，在中共從未放棄以武力犯台的前提下，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必須顧及國家安全，做為當前台灣國內最大的反對黨，並極可能再度取得執政權的情形下，民進黨確立中國政策的戰略與戰術實已刻不容緩。

在另一方面，中共雖然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方向從未改變，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內涵則充滿彈性，包含一中三段論的演變、九二共識與「一中框架」，姑且不論其過程是否試圖展現善意與誠意，仍可一窺中共冀望以和平發展方式達到統一的目標。中共對台政策向來不脫「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主軸，但回顧 2008 年馬政府上台後向中共靠攏以來，不管台灣民間反應如何，兩岸政府間對一個中國原則逐漸鞏固深化，一中框架理論遂產生於中共十八大工作報告，指明中共未來處理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可說是中共在確認馬政府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後對台政策的發展延續。

所以，基於前述兩個研究動機的前提，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分析民進黨在中

共一中框架的對台政策下中國政策論述的策略，兩岸之間究竟對於彼此要如何予以定位？什麼樣的對策可以極大化取得執政權的機會？本文企圖在存在於這些問題的許多解釋與說法中，以民進黨立場探究為了達到執政的政治目的，在不變動創黨時的台灣主體意識且能保障國家生存的情況下，在衡量國際情勢變動、美台中三邊互動、台灣民主深化及政黨輪替的情況下，找到對應中共一中框架最好的策略。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台灣政黨或政治菁英對於中國政策的方向，向來受到選舉情勢及中國對台態度的影響，也有學者在研究兩岸關係時關注這個焦點。不過，過去的研究多僅止於2000年、2004年、2008年的總統選舉，自2010年蔡英文敗選新北市長選舉、2012年敗選總統大選，尤其中共提出一中框架的對台政策後，鮮少有對這段時期所做的嚴謹檢視，尤其從民進黨的角度觀察者更付之闕如。所以，本文即是建立在此基點上，延續相關文獻之討論。

兩岸長期以來，是兩個擁有領土、主權及人民的主權實體，而究竟哪一方的政府才是代表「中國」政府的問題，以及是否分屬兩個國家的問題，經常造成兩岸關係的緊張對峙；但隨著兩岸雙方內部各自的政治、經濟、社會重大變化，兩岸已走向合作交流發展，若從「功能理論」來看，國際社會的和平必須透過經濟上的功能合作來達成，經濟上的合作不但有助於和平，更將為廣泛的政治合作奠定基礎，甚至某一面向的合作，即可能是另一個面向合作的結果或是誘因；經過這樣合作接續著另一個合作，不間斷的自然擴張，就會形成功能性的互賴網，透過互賴可以消除國與國之間的衝突，進而滲透到政治上而要求整合。[3]

[3] 何維國，〈兩岸和平協議可行性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頁 12。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就直接指出，兩岸隨著交流合作日漸熱絡，和平雙贏顯現的政治現實是，愈來愈多的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這樣的格局在國際社會上已難以撼動，台灣方面曾主張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台灣獨立」等論述都不切實際；而且，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意，台灣當局沒有能力片面改變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現況。所以，兩岸政治對話談判的核心不再是領土和主權意義上的統獨問題，而是一個中國框架下如何建立更好治理模式的問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國民黨、民進黨及共產黨利益最大化的政治選擇。依照劉國深的邏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似乎已成解決兩岸問題的最佳模式，待解決者僅在中共如何就「一國」的內涵問題與台灣達成諒解而已。[4]

然而，兩岸現實的發展卻並非完全依循這樣的脈絡，即便中國已成為台灣最大貿易國，在馬政府主政下兩岸甚至已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但在政治上的統合較之以往卻有更偏離的跡象。中國與台灣這兩個擁有主權身分的國家，雖然彼此交流合作發展緊密，卻仍然存在著「大國小國權力地位不對稱」的情況，而且「大國對小國有主權的要求」。吳玉山教授在〈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一文中，將這種權力不對等所造成的外在環境制約，稱為大小政治實體模式，其中大國的政策是確定的，就是意圖屈服小國的意志，小國對大國則可以採取抗衡或扈從這兩種策略。[5]套在兩岸關係上，就是中國意圖屈服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意志，中共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始終沒有改變，即使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發表的「胡六點」，仍然視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台灣可以選擇要抗衡還是扈從。

政治大小實體理論說明了策略的分析模式，但要探討政黨政策的形成，必須考慮到選舉競爭所造成的內在環境模式；吳玉山提出以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來分析，因為政黨都必須在選舉中競爭以獲得執政權，故其中國政策必然考慮勝選的

---

[4] 劉國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制度供給問題〉，《全球政治評論》，第 47 期（2014 年 7 月），頁 6-9。

[5] 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收錄《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主編（台北：五南，1999），頁 153-210。

因素。因此，就選票極大化對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解釋力主要在兩個面向：一是統獨爭議（認同面向），一個是經濟與安全的衝突（利益面向）。換句話說，執政者必須衡量執政機會（選票極大化）與執政責任（安全需求）的平衡。[6]

而在這樣的命題下，吳玉山的研究認為台灣的選舉有使各政黨的中國政策趨於溫和的作用，也能概括解釋2008年國民黨的總統大選策略及勝選，但與陳水扁2004年總統大選採「鞏固主權」以及「公投綁大選」，[7]引發美、中對台關係趨向緊張的策略相違；此外，以過去的文獻，如今也無法滿足對2012年蔡英文敗選和2014年國民黨地方大選潰敗的解釋，尤其面對當前兩岸關係和緩的狀態，民進黨在爭取選票認同時，其中國政策是否有必要趨緩對「台灣主權」論述的落實？

徐永明副教授曾指出，台灣過去選舉結果常出現關鍵性的社會分歧(soial cleavage)，由省籍因素所產生的分歧，促使台灣的政黨會以省籍與國家認同作區分，[8]社會分歧也成為政黨政治分析中的重要概念。北京聯合大學副教授陳星即將台灣的社會分歧，歸因於各政黨藉政治動員進而取得的政治共識，例如民進黨建構出來的「族群分歧」即是以這種方式完成，並推出「外省人賣台集團」、「外來政權」等論述，為自己的政治版圖擴大了空間；這種共識動員的背後其實是政黨對選票的渴求，政黨競爭往往被簡化為選舉策略的競爭，再簡化為政治行銷的技術性問題。在這種體制下，競選政策不只是為了提供資訊，更多是為了騙取選票。

依陳星的論點，台灣泛綠陣營對支持者的共識動員比較成功，因為2008年和2012年兩次總統選舉中，民進黨帶著陳水扁貪腐案的巨大包袱，仍然維持了超過40%的支持率；不過，陳星也指出，台灣經過近30年的政治變遷，社會民主化初期出現的參與爆炸熱潮已逐步冷卻，因此各類選舉投票率逐步降低，選民則從以社會集團的動員或政黨提名為依據進行投票決策，轉向更加個人化、私人化的政

---

[6] 林德宇，〈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6。

[7] 張炎憲、陳世宏，《吳釗燮與外交突圍》（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1），頁 91-96。

[8] 徐永明、林昌平，〈選舉地理如何影響台灣縣市長候選人的當選機率：1989-200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4 卷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122。

治選擇，相對理性的政治選擇緩慢上升，社會認知差異極化成為社會分歧的難度比民主化初期困難得多，沒有哪一種社會認知可以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例如，民進黨支持者並不一定反對兩岸交流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就使得民進黨欲將統獨分歧極化遭遇重大困難。因此，民進黨在2012年的總統選舉中，試圖通過主權的訴求，將兩岸關係重新拉回有限緊張的狀態，將兩岸經濟交流描繪成經濟統戰，將兩岸議題與族群議題合併及重新包裝，建構起中國與台灣的「族群分歧」，但因為難以極化統獨議題，讓民進黨無法「走完最後一哩路」。[9]

陳星的觀點或許不能說錯，畢竟中國的學者向來對民進黨較懷有敵意，如此推論無可厚非；但事實上，蔡英文在2012年的選舉，並沒有強化統獨論述，在本文的研究動機中即已說明；然而陳星的論點讓我們因此看出，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與取得執政權之間，必須回過頭化解過去民進黨自己製造出來的社會分歧現象。

而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關於國家「國內的選舉競爭」如何影響到「該國對外『政策』的走向」的文獻，觀察的焦點也同樣是在於選舉競爭會導致對外政策趨於衝突，還是增加對外政策的合作或友善趨勢。

民主和平論 （Democratic Peace Theory）的主張者認為一個國家內部的選舉可以促成它在對外政策上出現較具合作或友善的傾向。例如Gaubatz提到，選舉期間通常提供了反戰人士一個可以表達其反戰態度的政治空間，領導者如果忽視這些反戰聲音，恐須承受在緊張時期破壞社會團結的政治風險及成本，因而讓領導者捨棄戰爭而選擇和平的解決方式。[10]Lake則指出，選舉的投票，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表達異議的工具，可以被用來約束國家機關的行動，這也是為何民主國家之間比較不會彼此發生戰爭的理由之一。換句話說，由於選民對於使用武力的態度多半比較審慎，因此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不會輕易動武，以免在下次選舉中被民

[9] 陳星，〈試論台灣社會分歧嬗變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台灣研究》，第 120 期（2014 年第 5 期），頁 38-43。

[10] Kurt Taylor Gaubatz, *Elections and War: The Electoral Incentive in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of War and Pea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7, 78.

眾反彈。[11]

但Mansfield和Snyder的觀點恰好與上述說法相反，他們認為選舉通常會導引出較為冒進的對外政策，乃至於戰爭。因為正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常見出現好戰或激進的外交政策，這些國家有許多政治制度不夠健全，例如司法體系未能獨立運作、官僚貪腐無能、媒體自由受到限制等，在這種制度的缺陷下，選舉容易讓政治人物訴諸民族主義或其他激進與民粹的訴求，進而容易引發內戰或對外戰爭。[12]Isaacson在研究美國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經驗時則發現，當愈接近總統選舉投票日時，美國總統愈容易涉入或升高國際爭端，以獲取選舉的利益。[13]他發現，每當總統的支持度下降2%，則對外戰爭發生的時間就會延遲1%個選舉週期，也就是14.6天。也就是說，當現任總統的支持度愈往下降，他決定涉入國際爭端的時間就會發生在愈接近大選投票日的時候。學者關弘昌從時間序列統計分析的結果，也研究出在1995至2004年這段期間，愈接近總統選舉時，台灣對於中國大陸所發出的動作，不論是言語或其他行動都愈來愈具有衝突性質；[14]林繼文教授的研究更指出，台灣帶有和平意涵的重要動作，平均是在總統大選前的37.1週出現，而帶有獨立意涵、挑釁中國的動作，平均的出現時機是在距離總統大選前的18週。[15]

綜合以上這些理論文獻，我們可以簡單歸納出，選舉會影響到政黨或領導者對外政策的形成，但為了得到選舉利益，對外政策會採取較溫和策略還是走向較

---

[11] David A. Lake, "Powerful Pacifists: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6, No.1 (1992), pp. 24-37.

[12]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1995), pp.5-38.

[13] Ryan Isaacson, "Re-election Pressures and the Use of Force: Evidence of Diversionary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April 20, 2006), p.15.

[14] 關弘昌，〈台灣國內選舉對其大陸政策之影響〉，收錄《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主編(台北：五南，2009)，頁 217-238。

[15] Jih-wen Lin,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Washington-Beijing-Taipei Strategic Triang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aiwan at the Edge of Empires" conferenc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aipei, December 18, 2004, p.23.

激進的路線，各種理論與研究結果莫衷一是；吳玉山的選票極大化模式來分析各政黨對中政策似乎合乎邏輯，也符合國民黨的大陸政策與選舉結果，但對照民進黨中國政策的形成卻有所落差，顯現出民進黨的中國政策不能僅就能否取得執政權（選票最大化）來分析，仍必須考量其創黨價值及黨內菁英對政治理想性的堅持。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從民進黨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提出的「談判議題全面化」、「協商管道多元化」、「推動台灣與中國關係全面正常化」，認為民進黨中國政策的戰略清楚地訂在「兩岸關係正常化」的目標之上，所以企求藉兩岸全方位的對話與協商，來「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尋求兩岸共存共榮的政策方向；[16]因此，若以兩岸關係正常化的戰略目標來理解民進黨中國政策的形成，當可發現其中的一貫性。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民進黨各派系或黨內菁英對中國政策的主張，雖也偶有神來一筆之見解，但大多主張的堅持或調整，皆有其脈絡及延續性質，本文是以中共對台政策發表「一中框架」以來的民進黨內各種中國政策主張作為分析主體，比較各主張因應各種外在環境的彈性與優劣，並據此探究民進黨中國政策未來的策略。

「一中框架」是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他在關於臺灣的部分中指出：「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因此，本文的時間範圍以 2012 年 11 月 8 日中共提出「一中框架」以後至本文完成這段期間為主，以這段時間分析民進黨突破中共「一中框架」的策略，但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演變

[16] 陳明通，〈我國大陸政策的檢討與前瞻〉，《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29 期（2005 年 3 月），頁 54-59。

有其脈絡，為了清楚呈現民進黨各中國政策的主張及完整意涵，也會分析在此之前重要的中國政策意涵。

本文所稱的民進黨中國政策是指經民進黨決策核心如全國代表大會、中常會、中執會等所通過有關中國與兩岸政策、決議文、聲明、宣示等，及各派系領導人或中堅幹部的談話或聲明，同時也包括民進黨執政時期中華民國政府的官方文告、政策、新聞稿等，均納入本文分析之對象以此作為研究的內容範圍。

另有關中國政策一詞，其意涵等同一般所稱兩岸政策及國民黨政府所指大陸政策，唯因民進黨立場向把台灣視為主權獨立國家，中國是另一個國家，對其之政策當稱為「中國政策」，所以文中述及「國民黨大陸政策」、「民進黨中國政策」，或是兩岸政策，指的都是台灣方面對海峽彼岸的政策，合先敘明。

貳、研究限制

本文是要從中共「一中框架」對台政策的設定底下，來探討民進黨未來中國政策的走向，其策略可能是突破、可能是保守、可能是清晰、可能是模糊，所以限制研究的前提是「一中框架」，並不去探究其它中共對台政策下，民進黨中國政策應對的策略；而且，本文所做的分析是基於學理上運用蒐集的資料和文獻，歸納辯證來得出結論，但民進黨各派系或者各黨內菁英，在就中國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決策者的認知和判斷甚至於私下的政治運作，都難以讓外人知悉，第一手資料取得的困難，成為本研究在資料蒐集上的限制。

其次，民進黨中國政策的制定或調整，源於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包跨選舉考量、派系消長、輿論意見、政經條件、兩岸關係、中共態度、國家安全、國際局勢等等，其決策過程非常複雜，所以，為能深入研究，本文假設國際局勢、國內政經條件、派系實力、中共對台方針等都不改變的情況下，且時間限定在 2012 年 11 月 8 日以後，來分析歸納民進黨為取得執政權並與中共建立穩定關係的策略。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一般學術研究上所使用的方法分為研究途徑（researchapproach）與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兩者有所關聯但並不相同；研究途徑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研究要從哪裡著手，決定研究者切入研究主題的觀察角度，協助研究者選擇適當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研究方法則是蒐集與處理資料的方法，幫助研究者選擇適當的執行工具以獲取資料，進而獲得所欲求得的結論。[17]基本上，應該先決定研究途徑之後再決定研究方法。

研究者想要切入研究主題的觀察角度，就是在研究上先建立一個組織概念、系統、架構或模型，以確定研究的方向；本文主要採取歷史研究途徑，所謂歷史研究途徑，就是忠實地蒐集歷史資料並加以分析，因為歷史是人類過去活動的知識，是一種有系統的、嚴謹的認識世界的方式，研究重點在於事實的重現，並且重視考證。

本文以「取得執政」及「國家安全」作為理論探討的角度，試著從民進黨各派係及黨內菁英，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對中國政策的論述及重要談話、政策宣示及實際作為等當作檢視對象，整理出民進黨各種中國政策的主張論述與見解，以及中共對這些論述或見解的反應，進而歸納出在中共一中框架下，民進黨中國政策的應對策略。

[17] 朱浤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1999），頁 182。

貳、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指的是蒐集與處理資料的程序與手段，主要是指作者針對自己所欲探討之主題與相關問題，擬如何進行蒐集和分析資料，本文主要採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獻分析法與比較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利用文獻資料來對現象進行分析、研究的方法，本文藉此來尋找問題的定位、經驗的基礎，以及未來進一步研究方向的理由。本文的文獻分析主要是廣泛地蒐集關於國內外相關於「中共一中框架」、「民進黨中國政策」相關論文、著作、專書、新聞、學術研討論文、政府公告、政黨主張說明等資料，並加以分析及整理，總結出適合本文參考採用的文獻資料以進行研究。

至於比較分析法，羅斯（Richard Rose）界定其為「涉及某種形式經驗證據的呈現，而企圖有系統且明顯地進行政治現象的比較」。[18]比較分析法將不同的事件進行比對、辯證、歸納，找出其異同點，其運用基本原理有二：比相同與比相異。比相同的目的，是以類似的情況，作為當前研究對象的援引，可以作為同因必同果的解釋或預測；比差異的目的，則常為證明不同因則不同果，不能將當前研究對象的情況與其他對照情況混為一談。本文的研究目地既然在探討中共一中框架的影想下民進黨中國政策有何策略，以比較法作為研究分析方法，可以凸顯民進黨各派系及黨內菁英對中國政策的主張，在當前環境下的優劣與彈性。

第五節　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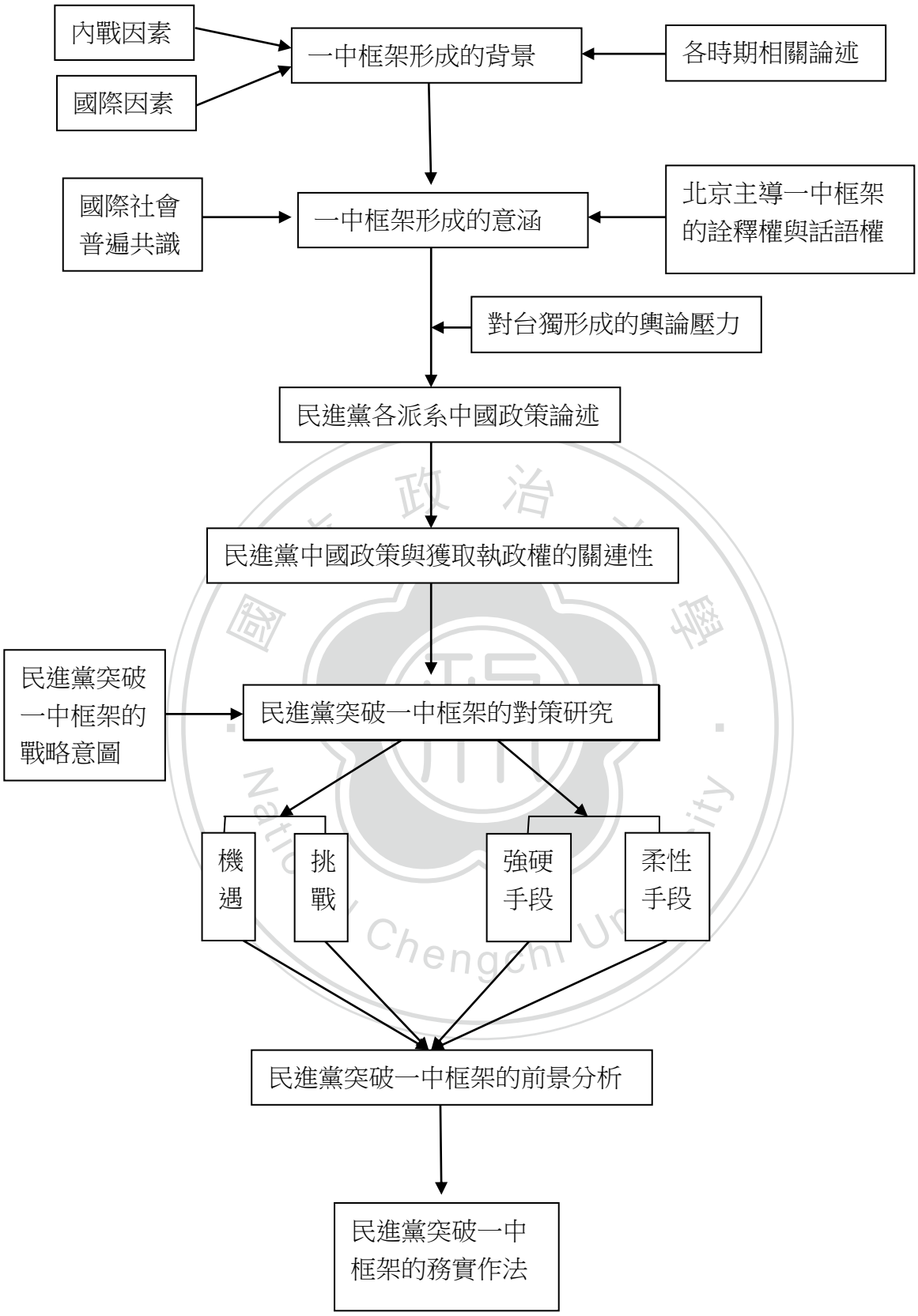
一、本文的架構如下：

[18] David Marsh and Garry Stoker，《政治學方法論》（*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陳青雯、葉銘元、許文柏譯（台北：韋柏，1998），頁 235。

第一章是緒論，主要在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及研究方法，並回顧歷史文獻。第二章主要分析中共的對台政策，從歷史事件及探討文獻資料，釐清中共現階段一中框架對台政策的意涵及台灣所處的國際環境現實，這部分包括了一些概念的界定與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方法。

接下來的第三章則是探討民進黨目前各派系的中國政策論述，並比較中共對各論述的態度及對民進黨的影響力；第四章主要以過去選舉結果論證民進黨中國政策與各環境因素的關連性。有了前述三章的分析與探討後，第五章便據此基礎探究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對策，並分析每一種對策的優劣及可能性。第六章則為結論，做為民進黨中國政策走向的建議。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1-1、本文的研究架構

第二章　中共一中框架形成的背景與意涵

第一節　中共一中框架形成的背景

壹、內戰背景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後，當時美國協助蔣介石國民政府運輸軍隊來台接收，默認中華民國擁有台灣的主權，但隨著1946年國共內戰開打，1947年1月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失敗，1948年秋季，共軍在東北、華東、華北三個方向發動遼瀋戰役、徐蚌會戰、平津戰役三大戰役，並取得全部勝利，國民政府精銳兵團幾乎全軍覆沒，國共內戰大勢抵定，美國即有意放棄支持蔣介石國民政府。

1949年夏秋之際，共軍渡江讓京滬等重地失守後，中共即著手進攻台灣，並以攻取金門作為攻台之前哨戰，因此1949年至1950年，台灣局勢十分危殆；美國當時對台政策面臨了如何處理和中共的關係，及如何認定中共在東亞扮演角色的抉擇，這個抉擇關係著美國如何因應「台灣問題」。結果，美國因為杜魯門政府對台灣的蔣介石並無好感，且受到冷戰局勢影響，考量其自身利益而對「狄托主義」有所期待，遂採取放手政策，不僅未積極援助自1949年12月遷台的中華民國，並思考與中共建立關係的可能性，[1]甚至發表《中國白皮書》，[2]將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戰勝利後對中共的一連串軍事失敗，歸咎於其自身的無能腐敗，與美援充分與否無關。

這樣的局勢一直到1950年6月韓戰爆發才產生變化，一方面美國認為北韓的侵略是國際共產主義擴張的一環，若不加以制止，東亞地區恐變成另一個赤化的

[1] 顧立民，〈1949-1945 年台灣安全局勢研析〉，《國防雜誌》，第 26 卷第 4 期（2011 年 3 月），頁 6-7。

[2]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3-7.

東歐，所以改採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策略，並封鎖中共，在外交上不承認中共政權是中國的合法政府；[3]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必須將用兵的重心轉移到朝鮮半島戰場，攻台計畫暫時被迫中止。

然而，台海局勢的緊張，還是到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於1953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1954年底台美雙方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才趨於穩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成為美國支持中華民國的法理依據，某種程度上也成為美國與中共敵對的象徵，讓中華民國正式成為美國盟邦，事態的發展終使中共的攻台計畫無法付諸實行。周恩來在1955年中共第一屆人大第二次會議說：「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4]正式將和平解放台灣列為指導原則，至此，兩岸局勢逐漸由戰爭轉向對峙，此後雖然歷經了1958年的823砲戰、小規模海上及空中戰鬥、國民黨對大陸沿海地區的登陸游擊等軍事衝突，但六十餘年來中共始終未能染指台灣。

兩岸的對峙態勢雖然在1980年代晚期，因為人員的互訪與貿易投資等各項交流接觸而有和緩跡象，但兩岸政治與軍事的對立並未消失，中共部署在沿海並瞄準台灣的導彈有增無減，台灣也未曾停止購買防衛武器，只不過雙方已從當年中國內戰敵對的交戰方，轉移成國際上對中國代表權的爭奪，再轉變成雙方在台灣主權地位問題上的矛盾。這其中的癥結，是台灣在李登輝主政後期，推動民主轉型的過程導致了台灣對於主權獨立的企求逐漸明顯，恰好抵觸了中國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5]

一個中國原則的產生，源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當天即向各國政府宣布：「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隨後

---

[3] 李明，〈韓戰前後的美國對華政策〉，「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2005 年 7 月 1 日。

[4] 周恩來，〈目前國際形勢及我國外交政策〉，收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 54。

[5] 關弘昌，〈從國際關係理論看和平協議之簽訂〉，《全球政治評論》，第 34 期（2011 年 4 月），頁 29。

又致電聯合國，聲明：「國民黨當局已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完全無權代表中國。外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與台灣當局斷絕或不建立外交關係，是新中國與外國建交的原則。」中共堅定認為，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即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國際上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民國從此結束其歷史地位；而且這是在同一國際法主體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新政權取代舊政權，中國的主權和固有領土疆域並未由此而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理所當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國的主權，其中包括對臺灣的主權。[6]

李登輝在1999年12月22日出刊的新潮周刊，接受日本名新聞節目主持人櫻井良子專訪中表示，1991年修憲已經把兩岸「內戰」作一了結，表明臺灣與中國大陸應是國家間的關係。[7]他說，「我在一九九一年修改憲法時，把中華民國支配全體中國的假象全部廢除，讓台灣的統治範圍限定在台灣，承認中共政權對大陸的統治權，等於把內戰作一了結。」[8]

如果就歷史脈絡來看，因為有國共內戰，而且沒有結束，才會有海峽兩岸的對峙，也才會有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李登輝的策略就是把中華民國的治權限縮在台、澎、金、馬，企圖利用修憲將內戰作個了結，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做出切割，把「中國」讓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台灣與中國是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鋪路。

然而，中共一直認為1949年的內戰至今沒有結束，[9]中共新華社於1979年1月1日對外發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告台灣同胞書」，雖宣布即日起正式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並希望「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

---

[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一個中國原則〉，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5-07/29/content_18293.htm，查閱時間：2015/6/10。

[7]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海峽兩岸關係紀要 1999 年 12 月〉，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52737&ctNode=5611&mp=1&xq_xCat=1999#069，查閱時間：2015/6/10。

[8] 夏桐，〈國共內戰與台獨無關〉，《海峽評論》，第 109 期（2000 年 1 月），頁 84-85。

[9] 郭震遠，〈中國內戰及其沿續中的兩岸政治關係-關於兩岸政治協商起點的探討〉，《統一論壇》，2010 卷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11。

之間的商談，結束兩岸間軍事對峙狀態」，[10]但也只是單方面的表示停戰停火，希望透過一種正式的官方接觸與談判，把內戰遺留下來的敵對狀態了斷。1993年8月，中共在「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指出：「中國共產黨願意同中國國民黨盡早接觸，以便創造條件，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11]其意義也是如此。

就因為中共仍把兩岸定位在中國內戰的雙方，所以兩岸還是一個中國而已，這也是中共之所以多次宣示，兩岸協商終止敵對狀態的議題，必須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前題的原因所在，因為如此一來，兩岸處理「內戰」衍生的問題，即屬於國家內部事務，而非國與國之間條約的簽訂。[12]所以，中共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新局面。」又在發表「胡六點」講話時，呼籲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建構兩岸和平穩定框架」。

2008年台灣馬英九政府上台，兩岸政策向中國靠攏，胡錦濤就在當年12月31日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上，首次提出「一個中國框架」的概念。他指出，「1949 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世紀40 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13]胡錦濤的目的，就是要從內戰的「歷史現實」回過頭來要求馬英九政府確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一個中國框架在國共內戰的背景下，延續著一個中國原則的發展脈絡，終至在中共十八大工作報告上產生「一中框架」

---

[10] 〈1979 年全國人大告台灣同胞書（全文）〉，《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 年 12 月 31 日，http://hk.crntt.com/doc/1008/4/4/2/10084425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44253，查閱日期：2015/6/14。

[11]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6-02/28/content_213349.htm，查閱日期：2015/6/14。

[12] 邵宗海，〈兩岸未來和平發展的方向與前瞻〉，《全球政治評論》，第 40 期，2012 年 10 月，頁 17-19。

[13] 〈胡錦濤：維護一個中國框架原則構築兩岸政治互信基石〉，《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8 年 12 月 31 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8609054.html，查閱日期：2015/6/16。

理論。

貳、國際背景

台海兩岸問題的發生和發展變化，原本應是單純的內政問題，而且應如同世界上只有一個美國或是只有一個英國一樣，中共本沒有必要特別強調一個中國原則，但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除前蘇聯及其它九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個月內與其建立外交關係外，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家，大多數仍承認撤退至台灣的中華民國，並維持著與中華民國的邦交，形同世界上同時存在著兩個中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中華民國；即便是為自身在華利益考量的英國，雖早在1950年1月6日就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法律上的政府，願意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但又聲稱不改變同美國一起「反對共產主義的長期目標」，並要繼續和台灣蔣介石政府「保持實際上的聯繫」，在實質意義上就是「兩個中國」的狀態。

尤其當時台灣與中共身處冷戰的國際環境，台海問題在解決過程中一直受到複雜的國際因素影響，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並隨著亞太格局的變化而變化；可以說台海問題是冷戰格局遺留下來的問題，在冷戰的形勢下產生，卻沒有因冷戰格局的消失而消失。

1950年代韓戰爆發，打亂美國原先放棄台灣蔣介石政府承認中共的計畫，在冷戰的反共意識形態下，美國一邊重新支持國民政府，一邊在現實政治的需求下企圖與中共修好，建立關係，形成美國「兩個中國」政策；影響所及，美國在每年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代表權」問題表決時，一貫以阻止中共入會為目的，但同時相信兩岸同時並存於聯合國才是真正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方法。美國這種分裂操作的手法，一直運作到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接受上海公報一個中國

原則為止。[14]可以說，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台灣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合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中國合法代表的同時，國際間已普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事實上，從1960年代開始，大批亞洲和非洲國家獨立，有許多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讓美國意識到中共的國際影響力逐漸增加，尤其中共和蘇聯在1960年代初期關係決裂，讓美國覺得可以拉攏中共作為對抗蘇聯的潛在盟友；到了1960年代末期，美國捲入越戰，為了解決越戰，美國更決定和中國改善關係。所以，美國在1972年2月28日和中共簽署上海公報並不意外，除確認彼此關係正常化符合兩國利益外，在上海公報中，中共重申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國則認識到(acknowledge)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此不提出異議(not to challenge)」。

自1972年上海公報以後，英、日等國相繼在當年和中共建立正式邦交，3月13日中英建交，英國承認中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中共人民大會堂舉行，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新表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分的一部份。日本政府，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立場表示十分理解並尊重。」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冷戰開始，韓戰及越戰的爆發，成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重要夥伴與據點，並在1953年4月28日生效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保護下，迅速地從戰敗的廢墟中重新站起，是美國「圍堵中國」政策的重要戰略盟友；對台灣尤其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日本政府不予承認，

[14] 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始末》（台北：秀威，2008），頁 15。

而是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並於1952年，與臺灣當局締結了《日台條約》，在臺灣問題上，日本把開羅宣言中的「歸還中國」解釋為歸還「中華民國」。

儘管如此，日本與中共建交當天，中華民國政府仍以「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宣佈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這是繼前一年退出聯合國、中美發表上海公報後，台灣又一項嚴重的外交挫折，對台灣政經情勢的衝擊十分巨大。事實上，從1970-80年間，中共與73個國家建交，在雙方的聯合公報中，中共要求建交國同時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合法政權」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1991年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後，台灣問題仍未擺脫國際形勢的影響。由於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增強，美、日等國出於各種利益考慮，基本上不願意為發展對台關系而犧牲與中國關係的代價，在涉台政策上不輕易改變長期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多年來美國一再公開表示，遵循中美「三個公報」，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柯林頓甚至於1998年在上海作出過不支持台獨、不支持「一中一台」與「兩個中國」、不支持臺灣參加只能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的「三不承諾」。

在這樣的國際現實底下，一個中國原則逐步為國際社會所公認與接受，與中國建交的172個國家，[15]都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並承諾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處理與臺灣的關係。即便在2000年台灣選舉剛結束，面對台灣政權政黨輪替的新局面，美國和眾多歐亞非國家，仍就台灣產生新領導人一事發表聲明，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主要大國不會輕易突破和台灣現有關係的基本框架。[16]

雖然國際社會大多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但美國仍然是兩岸關係中除了海峽兩岸兩個當事者之外最大的變數，在與中共建交後又制定《台灣關係法》，在冷戰結束後仍大量出售武器給台灣，把台灣視為一個政治實體，在事實上把台灣視為一個國家，把台灣列入其保護的勢力範圍，美國這種兩手策略讓中共頻頻發表抗議。1992年美國出售150架F-16戰機給台灣，1993年台灣啟動重返聯合國運動，1994年美國柯林頓政府提升與台灣接觸層級，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都被中共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日期簡表〉，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2193_611376/，查閱日期：2015/6/18。

[16] 席來旺，〈亞太格局變化中的台灣問題〉，《台灣研究》，2001 年第 4 期（2001 年 10 月），頁 55-60。

視為是台灣走向一個國家、走向台獨的舉動，讓中共決定採取強烈手段中止這些「遠離統一」的行動，遂舉行軍事演習向台灣東方外海發射飛彈，同時片面宣布中止兩岸兩會各層級的會談，1996年3月，台灣舉行首次民選總統選舉，中共在台灣南北方海域發射飛彈進行軍事演習，再度以武力威嚇台灣。

日本對台政策也和美國異曲同工，在冷戰結束後也沒有放棄兩手政策，一方面在台灣問題上做出承諾，儘量維護中日關係的大局，例如1998年江澤民訪日，日本對中國承諾將恪守中日聯合聲明的原則，強調只有一個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但另一方面，日台實質關係明顯提升，日台官員互訪不斷，1997年9月23日，日美發表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1999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了《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案》、《日美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修訂協定》三個相關法案。2000年11月，通過了《船舶檢查活動法》，日本政府把日美聯合防衛地區擴大到「周邊地區」，讓日本成為台海問題中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國際背景，企圖維持中共和台灣之間不統不獨的局面。[17]

在此同時，台灣自20世紀70、80年代以來，逐漸實現了經濟起飛，政治生態也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隨著民間活動領域擴展到海外，台灣領導人的思考空間也日益國際化，表現在台灣涉外領域最大的變化，就是指導了臺灣近四十年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漢賊不兩立」策略，被認為是自絕於國際社會的僵硬政策，台灣人民的主體性意識經過長期的社會培育之後，從李登輝時代開始賦予了政治內涵，再歷經陳水扁八年執政，強化了台灣人民的台灣主體意識，讓台灣往自主獨立的道路靠攏。

而中共自身也因為前蘇聯瓦解，作為美國聯合拉攏以制衡前蘇聯的戰略地位隨之下降，而且自改革開放以來，其經濟實力擴增儼然成為崛起的區域強權，對美國的國際戰略布局構成衝擊，美國國內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討論，已成為冷戰後，美國制定對中國或對台政策的主要考量，小布希的亞太政策也改變過去柯

[17] 石左，〈試論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4 年第 1 期（2004 年 7 月），頁 68-69。

林頓政府以美中夥伴關係的作法，而將北京定位成「戰略競爭對手」。[18]因此，美國的戰略重心出現東移的趨勢，逐漸將戰略重心從歐洲移向亞洲，其對台政策的改變，將由原先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調整為為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美國強調與中國的交往但不忽略台灣的安全與福祉，美國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不再刻意強調「三不政策」。[19]

2009年美國歐巴馬政府上任後，大幅提升亞洲戰略地位，總統本人、國務卿希拉蕊、前國防部長蓋茲等國安高級官員頻訪亞洲，並多次揭示「重返亞洲」的政策意圖，2010年以來，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更加大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重心轉移。時至今日，國際政治與經濟格局都發生了巨變，全球化風潮從經濟領域席捲至政治與安全領域，美國聯邦參議院2015年6月18日通過「國防授權法案」（NDAA），納入邀請台灣參加紅旗（Red Flag）軍演，並敦促美軍方派遣將級軍官及國防部助理部長層級以上官員訪台，[20]在這個政治與經濟、內政與外交等傳統政策界線日益模糊的全球化時代，中共雖然一直都把台灣問題看作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鑒於長期的分離和他國的介入，中共必須認清台灣問題的解決需要國際環境的配合，奉行的一個中國原則要有更彈性的做法。

參、各時期的相關論述

中共領導人最早提及「一個中國」，並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首見於毛澤東在1956年9月30 日與印尼總統蘇卡諾談到關於恢復中共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時，[21]他在對台政策上，也是歷任中共領導人手段最激烈的。

---

[18] 陳建民，《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台北：秀威，2007），頁 284-289。
[19] 初國華，〈美國的中國觀點及其對台政策：從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育達科大學報》，第 33 期（2012 年 12 月），頁 75。
[20] 蘋果日報，〈美參議院法岸過關，邀我參加紅旗軍演〉，2015 年 6 月 21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621/36621057/，查閱日期：2015/6/21。
[21] 邵宗海，〈兩岸談判中「一個中國原則」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78 期（1999 年 4 月），頁 507。

就歷史背景而言，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在國內外形勢尚未穩定之際，毛澤東即欲挾其內戰勝利的餘威，實行武力解放台灣，消滅中華民國政府，完成統一。同年3月15日，中共新華社發表〈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社論，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一寸土地為止。」首次在文字上表述以「武力解放台灣」的方針。[22]當時沒有明確的一個中國論述，是因為國際上沒有兩個中國的問題，也沒有台獨的問題，在中共認知裡，台灣本來就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不過，同年10月爆發的「古寧頭戰役」，參與該役的中共解放軍幾乎全軍覆沒，證明當時的中共還沒有渡海攻台的能力。

即便如此，中共仍未放棄武力解放台灣，1950年5月，國軍撤出海南島與舟山群島，中共就積極在大陸東南沿海部署武裝部隊，準備渡海一舉攻下台灣，但6月25日韓戰爆發後，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唯恐中共對台灣進攻，將威脅到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故令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並要求台灣方面停止對大陸一切海空活動，促成「臺海中立化」，限制了中共以武力達成統一的目標。然而，1953年7月韓戰停戰協定簽訂後，中共又開始準備武力犯台，9月3日中共砲轟金門，引發臺海危機，美國隨即於12月2日與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台灣納入美國西太平洋防線一環，美國承諾臺灣遭中共攻擊時，願意協防台、澎。

由於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值國民經濟建設時期，內部反共勢力威脅也尚未全面解決，為集中精力與資源完成社會主義改革，不得不採取較緩和的姿態，避免引起與美國全面衝突，使得台海危機不致擴大。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使得中共認為美國是解放台灣的最大障礙，周恩來曾說：「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臺灣增加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擋著。」於是中共欲尋求外交途徑與美國進行談判，使美國停止干涉台灣問題，並向國民黨提出舉行國共談判，以和平

[22] 中國共產黨歷史網，〈新中國對台政策的發展和“一國兩制”方針的提出〉，http://www.zgdsw.org.cn/BIG5/218994/219014/220570/222734/14738569.html，查閱日期：2015/7/5。

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1955年4月周恩來參加第一屆亞非會議，會中他發表聲明：「願意與美國進行談判，以和緩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這是中共首度對美國作出善意的表示。亞非會議後，周恩來在同年5月全國人大會議中說：「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23]這一主張說明了中共對台政策重大轉變的開始。

1956年6月，周恩來正式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和談的建議：「我們願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8月21日，毛澤東對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作了修改：「我們希望一切有愛國心的臺灣軍政人員，同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提出和平解放臺灣，標誌了中共對臺方針的調整已確立下來。

不過，當時台灣的蔣介石政府一再重申「漢賊不兩立」，中共鼓吹和談無功，遂於1958年8月23日發動金門砲戰，企圖製造和談壓力，同時恫嚇美國，欲迫使美國放棄協防金馬；但中華民國部隊在美國支援下不斷進行補給，力守金門。這時期毛澤東意識到，雖然美國積極推動「劃峽分治」，但蔣介石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並未動搖，這讓中共感到放心，所以「繼續爭取蔣介石，支持和鞏固蔣介石的統治，是防止台灣獨立的最好辦法」；對中共而言，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也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中共因此調整作戰方針，對金、馬採取攻而不取的作法，毛澤東更指示由周恩來將這些作法歸納出對台政策為「一綱四目」。[24]其內容為：

㈠一綱：

臺灣必須統一於祖國。

---

[23] 屈建軍、張建輝，〈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為歸與展望〉，《西安航空技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30 卷第 6 期（2012 年 11 月），頁 4。

[24] 熊華源、單勁松，〈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 年第 6 期（2009 年 6 月），頁 45-51。

㈡四目：

1. 臺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于蔣介石。

2.所有軍政及建設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

3.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徵得蔣之同意後進行。

4.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總體觀之，5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雖然推動對台「和平解放」政策，其目的亦只不過是配合對美外交策略的運用，避免海峽分裂因美國的介入而成為事實，對台基本上還是以武力統一為主；到了60年代，中共對內因「三面紅旗」政策（工農業生產大躍進、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全面失敗，引發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路線鬥爭，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造成內部政經危機嚴重，對外則與蘇聯日益交惡，在此內外交困情況下，台灣問題暫時被擱置，「和平解放」僅只能說是口號。

70年代之後，冷戰和解氣氛濃厚，中共開始尋求和美國改善關係，嘗試突破「文化大革命」時期自我封閉的孤立狀況，積極尋求對外建立關係，尤其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與中共簽署上海公報，確定「一個中國」的原則，中共進而在國際與兩岸間彰顯其代表中國，從而建立全面孤立台灣的措施。不過，兩岸此時期基本上處於軍事衝突與對峙的狀態，中共認為彼此間的敵對只不過是內戰延續，故強調「武力解放」為主，「和平解放」為輔，提出的統戰口號如和談、認同、回歸則只是一種策略。

毛澤東死後，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鄧小平為中共領導人，其深知發展經濟對中國的重要性，於是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而改革開放需要和平與穩定的環境，於是積極推動與美國建交，接著在1979年的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佈對台改採「和平統一」政策。

對於「和平統一」的內涵，鄧小平先是在1982年1月，利用接見到訪的美籍

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接著在1983年6月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提出6條具體構想(簡稱「鄧六條」)以闡述「一國兩制」的理念。而這6條的主要內涵是說明在「一國兩制」之下，台灣可以擁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與中國大陸不同的制度，台灣的黨政軍系統可以由台灣自己管理等。1984年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一個代表團時，又進一步闡述：「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25]1985年3月，鄧小平鑒於「一國兩制」論述已成熟，乃在第6屆中國全國人大3次會議上，正式提案通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基本國策、大政方針。

「一國兩制」的前題是「一國」，而所謂「一國」的內涵，據1979年元旦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中，「一國」就是「一個中國」，其中國定義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為了進一步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1981年9月30日中共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提出「關於臺灣回歸祖國實施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簡稱「葉九條」)。強調以「國共兩黨對等談判」為和平統一方式，並明確指出「國家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等，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首度正式提出「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等概念。[26]其觀點為「臺灣是地方政府，大陸為中央政府」，中華民國管轄下的臺灣是在中共同意下享受有限「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或地方政府，兩岸的定位關係是彼為「主體」，我為「客體」的主從隸屬關係。

[25] 人民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形成和主要內容〉，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07/65708/65722/4444475.html，查閱日期：2016/2/18。

[2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與研究中心，〈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葉劍英「對臺灣同胞的講話」全文〉，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7396&ctNode=5841&mp=4，查閱日期：2015/7/4。

此時，中共強硬的堅持中國只有一個，而且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主權，以致於在1990年代兩岸開始協商後，台灣主張「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為中共所拒絕；所以中共國務院在前述1993年8月31日發布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中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在北京。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也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提。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分裂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言行，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一國兩府』，反對一切可能導致台灣獨立的企圖和行徑」。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接著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談話指出：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絕不容許分割，任何製造「台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都應堅決反對；主張「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國」等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也應堅決反對。然而，中共的強硬只導致了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並未能解決台灣問題，在經過檢討後，江澤民卸任前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終於提案將「一個中國」修正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容分割。中共的目的在「統一台灣」，所以對「一個中國」開始採取了和緩語氣。

胡錦濤繼任為中共國家主席後，於2005年3月4日參加政協會議時，對於台灣問題提出了四點意見，這四點意見分別是：(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動搖。(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三)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四)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妥協。[27]

胡錦濤雖然仍把「統一台灣」當作任務，但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兩岸關係趨於和緩，遂於同年12月31日藉「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發表「胡六點」談話，將「一個中國原則」轉移為「一個中國架構」，可看出中共在「一個中國」的話語上變得更柔軟，但範圍更限縮；尤其在述及「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的看法時，強調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

[2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大事記（2005 年）〉，http://www.gov.cn/test/2007-10/09/content_771198.htm，查閱日期：2016/2/13。

關系展開探討」，其涵義代表兩岸如果仍是內戰中的交戰團體，那麼兩岸就不是兩個獨立主權，而是在一個中國架構下的兩個對等政治關係。至此，一中框架論述的背景已趨近成熟。

第二節　一中框架的意涵

一、中共一中原則的堅持與轉變

早在李登輝總統兩國論觀點一出，中共當局就寄望於台灣新任總統能夠改變兩岸政策，避免走向獨立，2000年2月台灣總統大選前，為了表達中共的根本立場，中共以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名義發表了《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共對台政策的基石，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白皮書還對中共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下定義，指「一個中國」的基本涵義是「主張和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一個中國原則的核心，則是要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28]

不過，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說法，將台灣當作地方當局，壓低台灣地位的說法令台灣各界難以接受，尤其令中共失望的是，台灣的新任總統竟是民進黨的陳水扁，為了避免台獨勢力擴張，並增加「一個中國」原則的在台灣的被接受度，中共開始改變一個中國原則的提法，將相關論述修飾得更不具壓迫性；2000年8月24日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首次提出一中原則的新論述方式：「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29]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則在2001 年中外記者會上強調，「只要承認一個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28]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新華社，2000 年 2 月 21 日。
[29] 《聯合報》，2000 年 9 月 6 日，13 版。

江澤民在2002年11月8日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為題的報告指出，二十一世紀中共三大歷史任務之一就是完成中國統一。為完成此一歷史任務，中共在十六大後，新任總書記胡錦濤以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江澤民提出的「八項主張」（以下稱江八點）為對台政策核心基礎，探索在民進黨執政的情況下，對台工作的新思路。

2003年3月11日，胡錦濤在第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臺灣代表團審議時，發表對台工作的新四點意見，一是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是要大力促進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三是要深入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四是要團結兩岸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30]

這四點意見的發表與當時台灣局勢有關，因為自2000年陳水扁總統上臺執政後，民進黨的台獨路線逐漸從理論轉向實踐，尤其陳水扁在2002年8月3日世界台灣同鄉聯合第二十九屆年會，發表視訊直播致詞時提出「一邊一國」論述，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31]2003年又在各種場合聲稱公投立法是民進黨長期以來堅持的理想，為台獨公投製造輿論基礎。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認為深化兩岸交流或有助於加強兩岸之間的認同。

事實上，「一中框架」可以視為是中國對台政策的發展延續，一個中國原則形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其內涵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一原則作為中國開展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則，亦為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一個中國原則強調國家主權的政治概念和法理意義，即便中國在改革開放之際提出「一國兩制」，一個中國原則仍是中共不可動搖的事實和法理基礎；如同1992年兩岸兩會達成擱置爭議，中共默許「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簡稱「九二共識」），原因即是中共認可其核心

[30]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官網，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4701&ctNode=6501&mp=1，查閱日期：2015/7/4。

[31] 許志嘉，〈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2003 年第 2 期（2003 年 4 月），頁 95。

內涵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歸納兩岸兩會在1992年同意各自以口頭方式說明立場的內容，海基會是以國統會當年8月1日對「一個中國」涵義所做的決議文來表述：「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而海協會的表述則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32]

所以，雖說九二共識的形成，在功能性上讓兩岸簽訂許多協議，但它實際上既沒有文本也沒有法律背景，頂多只是兩岸間一個高度政治性的默契而已，其真實意涵與脆弱性不言可喻。對中共而言，「一個中國」原則的重要性遠高於九二共識，中共跟台灣談九二共識不過是為了要把台灣框在「一個中國」的架構裡。

二、北京主導一中框架的詮釋權與話語權

2012年1月總統大選前後，兩岸關係的走向出現些許微妙的變化。首先，是「九二共識」效應的發酵，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在選前登高一呼支持「九二共識」，[33]為國民黨的選情發揮了臨門一腳的效果，馬英九順利當選連任，而「九二共識」在經過選票的洗禮後，儼然在兩岸間獲得更多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共首次將「九二共識」納入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中共有意將「九二共識」賦予官方化與正式文件化的意涵，讓未來兩岸之間的互動，以「九二共識」為核心作進一步的開展。

果然李克強在中共2014年3月5日人大與政協「兩會」開幕會議首次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對於對台工作指出：「我們將全面貫徹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堅持九二共識，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鞏固增進兩岸政治互信。」揭示了習李體制下中

[32] 馬紹章，〈九二共識的史實、緣起與意義〉，收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修訂版，陳錫蕃、鄭安國編（台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1），頁 6-7。
[33] 蘋果日報，〈「不能沒有九二共識」王雪紅挺馬〉，2012 年 1 月 14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114/33959958，查閱日期：2015/6/30。

共對台的政策主軸。

中共詮釋一中框架，其根本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反分裂國家法》，用以對應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國統綱領》。在這些文件底下，無論是中國還是台灣談論到「一中」，這個「一中」都會想到是包括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在內的中國。因此，中共認為，堅持一中框架，就能維護中國和中華民族的統一，一中框架就是兩岸談判的公約數，也是推進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所以在承前啟後的中共十八大上，把一中框架寫進報告。

若以胡溫時期做為參照點，從李克強的報告可以看出，中共對台路線已做出調整：首先、確立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的基礎性地位，並且將之載入大陸政府的文書報告；其次、通過強調堅持九二共識，沒有再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改提維護一個中國框架；其三、特別強調鞏固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凸顯兩岸一家親的軟性訴求。

在理論內涵方面，一中框架包括法律層面及現實層面；以法律層面來說，無論是中國法律，還是台灣法律，雖然對一個中國的解讀各有不同，但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態度卻是一致的，在國際社會上更是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兩岸一國」的觀點被普遍接受；以現實層面來說，歷史上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當下兩岸分治的局面是歷史遺留的問題，兩岸至今尚未簽訂停戰協定，等同內戰狀態並未停止，台灣也尚未更改國名國號，難以否認兩岸的現狀仍屬於一個中國。

中國官方對「一中框架」的論述指出，「一中」是指一個中國，而「框架」則是指事物的組織和架構。桑登平說，「從內涵上講，一中框架是在一個中國基礎上形成客觀存在的表現，它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內的寬範疇概念，比一個中國的內涵更加寬泛，且也更具包容性。同時，它也是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理念下，根據兩岸在各自現行規定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更是大陸對台政策的整體思路從現實性的指導思想向建構性思想的一個轉變。因為，承認客觀存在的事實，是務實解決臺灣民眾所關注問題的前提，是大陸追求國家統一模式的思

維突破。一中框架並非是要取代一中原則，它是大陸基於戰略層面的考慮，是九二共識和一中原則的自然延伸，也是為落實一中原則而產生的具有鮮明時代意義的相對具體的新論述。」[34]

由於九二共識的前提是一個中國，而馬政府又完全接受九二共識，促成中共掌握了一中框架的話語權，因為台灣針對兩岸關係的法律規定及政治主張，已在維護一中框架：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序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均明確界定，目前兩岸關係處於「國家統一前」的階段，印證兩岸目前處在「國家尚未統一」的情況下；中華民國憲法把中國和台灣都列為「中華民國領土」，在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當中把中華民國分為「自由地區」（即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而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則明確規定，大陸地區就是「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儘管目前台灣內部對於「國家統一」這個字眼的意義有很大爭議，但台灣方面的憲法宣示，卻是中共構建一中框架的基礎之一，連陳水扁在2000年跨世紀談話中都希望兩岸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因為「事實上，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原本並不是問題。」[35]

2012年7月28-29日，中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哈爾濱舉辦的國共兩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時表示：「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36]接著，一中框架理論於中共十八大工作報告產生，強調「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簡單而言，一中框架就是以一中為原則，框架為策略。201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了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習近平表示，「國共兩黨理應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2014年2月18日，習近平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行時強調，「兩岸雙方要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基礎，深化維

[34] 桑登平，〈一中框架下的兩岸新型關係〉，《唯實月刊》，2013 年 12 期（2013 年 12 月），頁 87。
[35]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陳總統跨世紀談話〉，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8172&ctNode=6621&mp=1，查閱日期：2105/6/29。
[36] 顏建發，〈國民黨的中國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2 期（2013 年夏季號），頁 71。

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可見一個中國、一國兩制、九二共識和一中框架，可以說是中共不同時期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雖然各個階段的原則有其時代特徵，但核心思想一脈相承。

三、對台獨形成的輿論壓力

台灣在李登輝執政後期以及陳水扁執政期間，當局的某些政治主張已經對一個中國原則造成某種程度的破壞，積極推動「去中國化」，台灣人民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已經不再是多數，「台灣本土意識」與「台灣主權獨立」的觀念逐漸深植民心，說明臺灣內部在國家認同這個關鍵問題上已與中共所期待者出現嚴重異化。

就中共的認知，所謂「台獨」，就是切割台灣與中國的關連，其重要目標就是要變更國號、改國名為台灣，換言之，只要中華民國的國號還存在，台灣就無法脫離中國，不論這個中國的意義為何，至少台灣仍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從這個層面上來看，中華民國就是維護和鞏固一個中國框架的重要標誌，甚至是遏制台獨發展的根本因素，如果中共正視中華民國，就有機會爭取到台灣民心，因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人民的國家象徵。中共提出一中框架或許就是由這個角度出發，讓中華民國國號、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法律共同來支撐一中框架；進一步說，要維護、鞏固一中框架，就要讓中華民國繼續存在，並以此壓制台獨發展的空間。

以兩岸現狀而言，2008年馬英九上台以來，國共兩黨都堅持九二共識，但國民黨解釋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儘管都有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語言，但「一中各表」對一個中國的定位仍處於各說各話的層次。對中共來說，政治議題中的一個中國原則，即使不定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可能去承認或默認國民黨宣稱的中華民國；同時，台灣方面在主張「一中各表」時，極力強調兩岸政治差異，對兩岸政治對話則持消極態度，彼此的政治定位已很難再被模糊。

中共在十八大正式提出一中框架，某種程度上似乎是希望藉由認同中華民國的過程中，可以減少兩岸分歧、求同存異，並彰顯中共對台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

性，甚至帶有召喚或分化民進黨的意味；例如前民進黨主席謝長廷在2012年10月的登陸開展之旅，引發民進黨各派系的不同反應，雖有批評者認為謝長廷到中國主張「憲法各表」、「憲法共識」，鼓吹「憲法一中」，其論述本質就是「一中」，讓台獨支持者情何以堪，但也有贊成者認為謝的大陸行揭開民進黨與中共的正式接觸，也打破國民黨長期單方面主導的兩岸論述。

不可否認，中共提出一中框架，已在嚐試因應台灣各方面的政治需求，與以往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相比，一中框架最大的特點是加入了兩岸現狀以及策略上的彈性，雙方可以求同存異，重點是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的情況下，兩岸如何在一個中國架構底下，尋求和平穩定的政治關係。

在這種氛圍中，2013年6月13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吳伯雄在會見中即強調，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實行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係，而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謝長廷甚至表示，吳伯雄在會見習近平時所發表的「一個中國框架」，並沒有違憲問題，他認為，「一中」不應刻意說「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互相承認並尋找新的特殊關係」。與此同時，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也提出「大膽一中」的兩岸新主張，他表示正視一中框架已不可避免，未來要確保台灣在一中框架下的空間。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章　民進黨目前主要派系的中國政策論述分析

民進黨從創黨到扎根再到執政的歷史過程當中，「派系共治」是民進黨這個政黨分享權力的主要特色，派系主導了政治資源的分配，也主導了意識形態和政策軸線，派系權力鬥爭的結果，往往影響黨的未來走向，可以說，民進黨的政策走向，通常是各派系折衝妥協的結果，因此各派系勢力的消長變化，或是各派系的合縱連橫，都會影響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走向。

民進黨的創建，一開始即是由所謂推動本土化運動的黨外人士所籌組，其核心價值就是台灣獨立於中國，建立台灣共和國，但隨著台灣整體內外政經環境改變，為了獲取台灣人民對民進黨執政的信心，民進黨理解到必須符合民眾的利益與期待，各派系對於中國政策的論述必須隨時代調整。

不過，自陳水扁 2000 年執政後，民進黨推動解散派系，原本的正義連線、福利國連線、新潮流系、泛美麗島系（如新世紀、新動力等）等大派系大多隨之瓦解，變成黨內有實力者如擔任總統、行政院長者自行成就一個派系，陳水扁有其「扁系」、游錫堃有其「游系」、謝長廷有其「謝系」、蘇貞昌有其「蘇系」，而至蔡英文有其「英系」等，是目前民進黨內較有影響力的派系，各派系俱以其領導人馬首是瞻；唯有組織扎實、紀律嚴明的新潮流系於 2008 年民進黨下台，蔡英文就任黨主席後轉型為台灣新社會智庫繼續運作，[1]為民進黨實力最堅強的派系，六都中高雄市長陳菊、台南市長賴清德、桃園市長鄭文燦都屬新潮流系。

若以統獨作為光譜的兩端來看，民進黨所有派系的中國政策論述都是中間偏獨，而最靠近「獨」這一端者要屬「游系」，再過來則是「蘇系」、新潮流系、「英系」，最靠近中間的則是「謝系」；但由於民進黨的運作向來是派系共治，雖說論述有別，但黨中央對外論述時仍會謀求最大公約數，以求取口徑一致。以當前狀況分析，在蔡英文極有可能贏得總統大選的情況下，未來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論述

[1] 華夏經緯網，〈民進黨最強派系新潮流大分解〉，2008 年 9 月 9 日，http://big5.huaxia.com/jjtw/dnzq/2008/09/1156940.html，查閱日期：2015/7/3。

將會是蔡英文與新潮流系聯合主導，再與其它各派系取得妥協；因此，蔡英文與新潮流系的中國政策論述至關重要，而謝長廷的論述則提供蔡英文緩衝的空間。茲將各派系中國政策論述分述如下：

第一節　新潮流系的中國政策論述分析

新潮流系長期以來在意識形態上傾向台獨，其政治綱領的三大柱為「台灣獨立」、「群眾路線」、「社會民主主義」，對於台灣前途，立場強硬，不承認也不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2]但在兩岸交流方面比較務實，希望能夠主導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在檯面上與謝系爭奪兩岸議題的話語權。

1986 年民進黨成立，並通過有關「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自決」的主張，當時黨綱並未將「台灣獨立」的主張納入，此一時期的民進黨宣稱「台灣全體住民自決」與「台灣獨立」是不同的，「自決」強調程序而非結果，所以「台灣獨立」只是自決的選項之一，兩者並非等號；但因為自決的概念較為模糊，各派系對此條文理解不一，較激進的新潮流系認為「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實際上就是「台灣獨立」。[3]

1990 年 10 月 7 日民進黨召開第四屆第二次全代會，通過「一〇〇七決議文」，宣布「我國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其起源即是在新潮流系運作下，為了釐清台灣主權與中國主權的關係，確認憲法所規定的領土範圍與政府有效統治領土範圍不一致，以及反擊「國家統一委員會」的成立，而搬上黨的討論機制，顯示新潮流系高純度的台獨主張已漸漸成為黨內意見主流。[4]因此，號稱台獨理論大師的新潮流系立委林濁水在 1991 年民進黨第五屆全代會領銜提出「建立主

[2] 黃香梅，〈民進黨執政後派系政治與中國政策關係之研究（2000-2004）〉（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2005），頁 100。
[3] 柳金財，《大膽西進？戒急用忍？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台北：時英，1998），頁 146-147。
[4] 林德宇，〈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40-41。

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黨綱修正案，幾經討論後通過，即成為所謂民進黨「台獨黨綱」。

新潮流系推動的各項主張到台獨黨綱確立時，已否決了國民黨所主張的「中華民國主權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更以「台灣主權獨立」概念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擁有主權，強烈彰顯「台獨黨綱」有別於國民黨的「一個中國」主張，讓民進黨的兩岸關係漸往「一中一台」定位。

所以，陳水扁於 2000 年 6 月 27 日會見美國亞洲基金會會長傅勒時，一改先前對於「兩岸一個中國原則並無共識」的立場，而表示願意接受海基會與海協會九二共識的協議，立即招到黨內新潮流系立委的強烈抨擊，林濁水即認為在國際間普遍接受「一個中國三段論」時，此舉非常危險。[5]反之，對於陳水扁在 2002 年 8 月 3 日為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致詞時表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別人的一省或地方政府，不能成第二個港澳，「台灣與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強調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時，[6]新潮流系就表達支持。新潮流系領袖邱義仁當時表示，民進黨政府對於兩岸關係立場非常清楚，就是一邊一國，中國對民進黨政府不必測試，在這個基礎上，大家來處理現實問題。[7]不過，新潮流系對台灣獨立主權的堅持，並不代表制憲建國的立場不能改。

民進黨經過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總統直選後，「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的概念面臨是否調整的抉擇，因為當初民進黨極力反對，「缺乏統治正當性」的國家機器，在經過人民投票的民主程序中，已獲得台灣人民的授權，成為展現主權在民的政府體制；此時若民進黨一方面否定中華民國，一方面又參與中華民國體制的選舉，尤其是長期於海外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彭明敏，成為民進黨候選人進入體制參選中華民國總統，更突顯民進黨中國政策論述上的矛盾。

---

[5] 黃香梅，前引文，頁 96。
[6] 林奇伯，〈陳水扁提一邊一國，盼兩岸關係正常化〉，《台灣光華雜誌》，2002 年 9 月號（2000 年 9 月），頁 61。
[7] 《聯合報》，2003 年 10 月 26 日，A2 版。

於是，出任民進黨駐美代表的立委張旭成，在 1995 年華府舉行的民進黨駐美辦事處成立酒會之時，率先表示臺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因此沒有再宣佈獨立的必要；稍後，當時民進黨主席施明德亦指出：民進黨認為，目前事實上臺灣已經獨立，民進黨若執政，不必也不會宣布臺灣獨立。施明德這項聲明在民進黨內部可謂是台獨論述史上的革命，相較於以「自決獨立建國」為基調的舊台獨典範，這種論述可說徹底否定了「臺灣地位未定論」，不過這項主張在日後漸趨成熟，並成為民進黨人的主流意識。[8]

林濁水也在 1997 年以「主權已經獨立，革命尚未成功」形容「獨立建國」修正後的台灣主權論，他認為，台灣主權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實，已經透過多次的全國民主選舉得到確認，但儘管台灣主權已經獨立，但台灣的法律主權並未獲得國際承認或支持，台灣法政體制仍遺留許多舊時代殘餘，國民意識也有待鞏固強化。不過，爭取國際支持、改造國家體制、鞏固國民意識，這三項政治工程，都可在「維持台灣主權現狀」的基礎展開，不須預設宣布台灣獨立。這波轉型最終展示於 1999 年 5 月民進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這段過程中，新潮流系亦是其中的主導者之一，林濁水仍是主要的理論旗手與起草者。[9]

「台灣前途決議文」中指出：「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 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領海與鄰接水域。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民進黨重新定義「獨立現狀」並不須「打破重建」國家體制，而只要「就地改建」確認台灣主權獨立即可，如此一來，變成唯有統一才會涉及現狀改變，現狀即是獨立。

總括而言，新潮流或許被認為是民進黨黨內的激進派，但其實應該是務實派，

[8] 潘啟生、廖俊松，〈民進黨台灣前途主張變貌的探討〉，《東亞論壇季刊》，第 450 期（2005 年 12 月），頁 86。
[9] 鄭明德，〈民進黨新潮流派系的台灣前途論述〉，《中華行政學報》，第 8 期（2011 年 6 月），頁 228。

尤其在兩岸經貿議題上，其「積極定位、自信開放」的主張，遭批評為「中國流」，民進黨內同志也撰文質疑，曾經強烈批判國民黨和部分民進黨人士鼓吹中國經貿開放，被視為台獨先鋒幹部組織的新潮流，已違背當初向人民宣揚的路線和價值，甚至成立「兩岸政經學會」，與過去對兩岸經貿的看法有南轅北轍的差異。[10]雖然如此，分析新潮流系的中國政策論述，仍應依林濁水穩健台獨的戰略內容：「主權立場清楚，態度善意，政策彈性務實。」[11]新潮流系認為，「台灣獨立」、「台灣優先」等觀念，尚未得得台灣民眾多數認同時，在統獨爭論未歇、國家認同模糊不清、國家定位與國家利益不明的情況下，必須把「對內凝聚共識、宣揚台獨理念」視為階段性目標，所以新潮流系必須把民進黨圈定在「台灣優先、台灣認同」的走向範圍內，再以此來牽制國民黨，進而牽引整個台灣的走向，但這個目標階段達到後，新潮流系就可以轉移自己的定位，朝另一個階段努力。[12]

第二節　英系-蔡英文的中國政策論述分析

身為2016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且極可能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的蔡英文，先後知遇於李登輝及陳水扁，兩人的總統任期加總起來長達二十年，歷來對於中國的看法，從漸進的決策模型來看，政策制定難免會有「脈絡倚賴」（path dependent）的現象。在李登輝總統任內的「台灣與中國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即「兩國論」），大體上是走實質的「兩個中國」路線；在陳水扁執政八年中，初期對中國釋出種種的和平訊息，譬如「四不一沒有」、「擱置政治爭議，恢復對話交流」的「九二精神」、架構「政治統合論」等，但中共一直冷眼相待，阿扁在失望之餘，終於喊出「一邊一國」，重回李登輝「兩國論」的軌道。

---

[10] 邱莉莉，〈台獨先鋒中國流？〉，《自由時報》，2006 年 1 月 15 日，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53294，查閱日期：2016/3/4。

[11] 林濁水，〈民進黨怎樣面對兩岸問題〉，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台北：時報，2015），頁 149。

[12] 林德宇，前引文，頁 43-45。

中外媒體常提到蔡英文是李登輝兩國論主張的推手，但對岸卻完全不能接受「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說法，蔡英文在 2000 年被陳水扁延攬入閣，擔任陸委會主委時對兩國論表示：「兩岸政策的延續一定有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提出，有其綿密的邏輯思考。我不認為李登輝總統主政的兩岸政策有什麼不當之處，他的想法有其階段性思考。問題是兩岸已經走到另一個關鍵，我們要如何修改，同時又維持政策的一貫性，是新政府施政的重點。」[13]

從「階段性思考」幾個字可發現，蔡英文在陳水扁就任後，認為兩國論的階段性任務已過，兩岸間的問題「已經走到另一個關鍵」，而這個關鍵就是民進黨當時最關心的立即目標-「開放三通」，要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先「擱置政治爭議，恢復對話交流」，所以，為了推動與中國的復談，可以在「九二精神」下思考「一個中國」。然而，思考「一個中國」絕不等於接受或承認一個中國，對蔡英文而言，「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是她的紅線，她在 2000 年擔任陸委會主委時表示，九二共識的爭議，海基會與陸委會對這段歷史的認知是，當時兩岸確有討論如何解決一個中國的問題，但並未獲致任何結論，雙方對一個中國問題各自表述，也就是各說各話。對蔡英文而言，九二共識根本不存在，[14]也因此，對於 2008 年以來兩岸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簽署的相關協議，蔡英文表示「民進黨無法接受九二共識，若兩岸基於九二共識簽署相關協議，一旦民進黨重新執政可以不接受」。

蔡英文雖不接受九二共識，但也跳出兩國論的框架，陳水扁在 2002 年 8 月 3 日提出「一邊一國」的說法時，蔡英文隨即在 5 日舉行記者會提出澄清，強調所謂的「一邊一國」是指：「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不是別人的一部分，不是別人的地方政府、別人的一省，這是歷史事實，只是對現狀的重申而已，目的在強調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能被

[13] 滕淑芬，〈法政高手縱橫兩岸-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台灣光華雜誌》，2000 年 6 月號（2000 年 6 月），頁 42。
[14] 自由時報，〈蔡：無九二共識　推台灣共識〉，2011 年 8 月 24 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18815，查閱日期：2015/6/14。

矮化、被地方化、被邊緣化。」她替陳水扁緩頰，認為「一邊一國」與「兩國論」是兩回事，既不是走回「台獨黨綱」、也不是「獨立建國之路」。顯然，蔡英文認為「一邊一國」比「兩國論」更可以接受。[15]

基本上，蔡英文認為兩岸之間的政治歧見並非無解，只要能確保「中華民國存在」的前提，雙方就可以尋找彼此可以接受的中間地帶，建立解決問題的架構；在程序上而言，蔡英文認為民進黨的政策很清楚，必須透過「共存共榮、可久可長」的架構，來尋求解決的方案，這個架構包括底層的交流、中層的協商管道建構、以及上層的政治談判，她認為目前最欠缺的是中間的協商管道，而中國卻只著眼於下位的交流、以及上位的政治談判。所以，只要中共堅持以「一個中國」來否定台灣存在的事實，就不可能建立解決問題的架構，這個架構不僅是雙邊的，她更要尋求多邊的架構，例如 WTO 的全球多邊架構就是一種保障。[16]

這樣的理論脈絡可以解釋蔡英文在 2010 年擔任民進黨主席時強調，民進黨與國民黨最大的不同是「民進黨走向世界，再和世界一起走向中國；但國民黨是走向中國，再透過中國走向世界。」這個重大差異體現在雙方經貿與非經貿層次的相關戰略；她更批判 2008 年馬政府上台後，採取「透過中國走進世界」的錯誤戰略觀，讓台灣在和平穩定、經濟發展、國際參與等面向，視中國為唯一的依靠和途徑，犧牲台灣的自主性與對等尊嚴，質疑國民黨戰略觀的最大危險在於「從中國走向世界」，將使台灣走到中國後就被鎖在中國，最後被全世界當成中國的一部份。

所以，蔡英文公布民進黨中國戰略的四個基本原則：（1）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互惠而非歧視、和平而非衝突、對等而非從屬，使台灣不可陷於中國設計的一中框架。（2）從全球戰略平衡及區域安全的角度來思考台灣與中國的關係。（3）以民主原則作為對外的防火牆，對內的防腐劑，中國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須遵循民主程序，重大事項也必須由人民公投決定。（4）民進黨堅持自由、民主、人權的

[15] 施正鋒，〈蔡英文的中國政策〉，201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台灣政治學會與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主辦，2011 年 11 月 11-13 日。
[16] 施正鋒，前引文。

價值，作為與中國的最大區隔，並作為外交的戰略高點。[17]

即便如此，蔡英文的中國政策主張仍不明顯，一路看起來，蔡英文似乎比較擅長於「反向」的說明及程序的設定，卻拙於正面的主張陳述，冗長的文字說明背後，刻意模糊真正的意義。不過，為了 2012 年總統大選，蔡英文不得不對兩岸政策論述提出較明確的說法。

2011 年蔡英文提出「十年政綱」時認為，台灣內部對於中國的態度還沒有形成共識，無法讓中華民國政府展開對中國的談判，而台灣目前內部最大的共識是「維持台灣現狀」，她希望能透過民主機制來凝聚國內最大的共識。但這樣的「台灣共識」論述仍顯空洞，看不出對台灣前途的主張，直到 2011 年 10 月 8 日在高雄市勞工公園演講時首度表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再是外來政府」，[18]依稀點出台灣共識就是維持現狀，而現狀就是台灣等於中華民國。這樣的意涵，近似於民進黨在 1999 年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依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同時為了淡化台獨黨綱，以公投來避談民族自決。

到台灣共識提出後，才能比較清楚瞭解蔡英文在此之前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中國政策主張。延續著以往要建立「共存共榮、可久可長」的架構理念，蔡英文在 2011 年 2 月 23 日成立民進黨智庫時指出，兩岸議題必須有國際戰略思考，台海的現狀，是國際權力結構與東亞近代歷史演變的結果，必須要把台灣放在國際的結構當中，把政策思考著眼在未來關係的建構，才能拉出必要的戰略縱深；民進黨必須維持台灣對中國關係穩定與和平，同時要考慮全球與區域戰略的平衡，和亞洲各國一起共同面對中國的崛起。台灣應該以國際多邊體系，做為與中國互動的架構。所以，民進黨主張台灣發展與中國的關係，應從台灣認同

---

[17] 民主進步黨，〈無可迴避挑戰蔡主席強調民進黨中國戰略的四個基本主張〉，2010 年 5 月 2 日，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kw=%E8%B5%B0%E5%90%91%E4%B8%96%E7%95%8C&m1=07&y1=2015&menu_sn=&sub_menu=43&show_title=%E6%96%B0%E8%81%9E&one_page=10&page=3&start_p=1&act=&sn=4325&stat=&order_type=desc&order_col=add_date&data_type=%E6%96%B0%E8%81%9E，查閱日期：2015/7/1。

[18] 中央通訊社，〈蔡英文：中華民國就是台灣〉，2011 年 10 月 8 日，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2456-2/201110080060-1.aspx，查閱日期，2015/7/3。

出發，以台灣價值為核心，兩岸必須維持「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關係。這個「和」，就是和平發展的「和」，所謂不同，指的是台灣與中國在歷史記憶、信仰價值、政治制度、社會認同方面都不一樣；但台灣與中國，有共同的責任和利益，就是追求和平穩定的關係，掌握繁榮發展的契機；這就是兩岸「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真義所在。[19]

因此，要先建立台灣共識，才能求同，因為「台灣共識」是民主的過程，是以「在不同的立場中找出共同點」為出發點、以及以「在不同的立場中找出共同的可能性」為精神；彷彿就是「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邏輯套套句（tautology），也就是循環定義。[20]

蔡英文所論述的兩岸政策，若逐一深究恐難推論出實質上的主張，也許是因為過往長期談判的訓練，她似乎養成重視程序甚於實質內容的反射性習慣；她或許可以很清楚的釐清在兩岸關係上，台灣應該站在哪個位置，並且「哪些可以做」或「哪些不應該做」，但卻不願說清楚接下來「怎麼做最好」，如同空有戰略，苦無戰術，偏偏攻擊國民黨的中國政策又有條有理，看起來又像是戰略模糊，戰術清晰。但是，從 2012 年到 2016 年，蔡英文在兩次的總統大位競逐中，中國政策的論述逐漸清晰，2012 年大選的「台灣共識」是模糊的「維持現狀」概念，而且是到了選舉最後階段才千呼萬喚始出來，甚至說不清是要維持「怎樣的現狀」；但到了 2016 年大選，她選擇在 2015 年 4 月，展開總統選舉步調時，就直接向美中台三方明示民進黨執政後處理兩岸問題的底線和態度，且清楚以白紙黑字表達，「維持兩岸現狀」，就是維繫台海和平及持續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現狀，劃出民進黨在 2016 年重返執政後在兩岸關係上的位置，確保會延續扁、馬執政 16 年發展而來的兩岸現狀。[21]至此，可以看出，蔡英文中國政策論述的這個「現狀」，

---

[19] 民主進步黨，〈蔡英文主持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智庫揭牌〉，2011 年 2 月 23 日，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kw=%E5%92%8C%E8%80%8C%E4%B8%8D%E5%90%8C&m1=07&y1=2015&menu_sn=&sub_menu=43&show_title=%E6%96%B0%E8%81%9E&one_page=10&page=2&start_p=1&act=&sn=4757&stat=&order_type=desc&order_col=add_date&data_type=%E6%96%B0%E8%81%9E，查閱日期：2015/7/1。

[20] 施正鋒，前引文。

[21] 風傳媒，〈重返執政 蔡英文提前定調美中台框架〉，2015 年 4 月 13 日，

比台灣前途決議文所認為的「現狀即是獨立」更為緩和。

整體來看，雖說仍難一窺蔡英文的中國政策論述全貌，「維持兩岸現狀」或「維繫台海和平」都相對模糊且解釋空間極大，但可以確定她是在尋求兩岸和平穩定的大戰略下，維持兩岸現狀，發展與中國周旋的機會，在「多邊架構」的前提下，提出「和而求同」、「和而不同」的目標，試探如何建立與中國對話的基礎，強化民共交流的機會，進而創造出中共可接受的台灣共識；或許更重要的是如同前陸委會陳明通所言，蔡英文從擔任陸委會主委以來，她對中國政策始終抱持「保持平衡」的基本信念。[22]

第三節　謝系-謝長廷的中國政策論述分析

謝長廷被視為是民進黨的智多星，在 2000 年擔任高雄市長時曾主張高雄與廈門是一個國家的兩個城市，因為沒有講是屬於哪一個國家，中共也就曖昧以對，含糊接受，2012 年謝長廷參訪中國，初到彼岸便表示「兩岸如果要再跳躍提升，就不能只是求同存異，應面對差異，處理差異，超越差異」，可見其對於兩岸政策的主張彈性務實；謝長廷擔任民進黨黨主席時提出「回歸憲法一中架構」的主張，當時即引發黨內各派系批判，連他自身所屬的福利國連線都強調「黨主席對外代表本黨，有關發言不得違背民進黨的立場」。[23]後來提出憲法共識、憲法各表，認為民進黨必須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不應再談制憲，謝長廷強調，遵守憲法是朝野政黨最大公約數，他所倡議的「憲法各表」，是維持現狀的設計，兩岸現狀互不隸屬，但憲法有特殊關係，「憲法各表」更務實且有合理發展性，試圖以中華民國憲法來連接兩岸，搶奪民進黨內部兩岸論述的話語權。

---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70，查閱日期：2016/2/20。

[22] 陳明通，〈建構台灣、東亞和國際的新平衡策略〉，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台北：時報，2015），頁 82。

[23] 黃香梅，前引文，頁 97。

2011 年 1 月，謝長廷提出「重疊共識、憲法各表」，的主張。他認為兩岸應該和平的往來，不應該做為鬥爭的工具，台灣應該爭取更多的尊嚴和利益。事實上，「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 的概念是美國知名當代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在 1971 年出版《正義論》中提出的。「重疊共識」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不同人群、不同民族之間能否達成重疊共識，關鍵在於相關人群或民族.能否以負責的態度，參與共同自覺的歷史實踐過程。[24]

所謂「重疊共識」的構想，是羅爾斯自 1980 年代中期起對他的良序社會觀所做的一項補充說明，他認為公民們各有各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觀，雖然他們所信奉的全面性學說不可共量，但只要他們能接受同一套公共正義觀，相信社會的基本結構滿足了這套正義觀，並且發展出有效的正義感，同時以這套正義觀作為調解衝突、檢驗基本結構是否合乎正義的唯一準則，「穩定的社會整合」就能在一個異質多元的社會中達成。簡單來說，雖然公民們所信奉的全面性學說各有各的立足基礎，但是只要這些學說能夠接受同一套公共政治規範，把公共的歸公共、非公共的歸非公共，那麼這便是一個穩定的「重疊共識」；而要達到「穩定的社會整合」，政治哲學家必須從某些「共識」出發，也就是從自己與對方所能共同接受的前提或命題出發，設法找出一套能夠營造出穩定的社會整合的「穩定的正義觀」。[25]

所以，謝長廷認為，台灣內部應建立「重疊共識」，雖然台灣朝野對憲法的若干條文有不同看法，卻對憲法制度、福利、民主、自由或人權保障等理念，均有共識。他認為，由此建立重疊共識，內部的任何競爭或對抗，都有一個不會逾越的框框，社會與國家才能穩定；[26]所以，謝長廷主張用「憲法的重疊共識」來取代國共兩黨片面聲稱的九二共識，這個「憲法的重疊共識」就是所謂「憲法共識」。

---

[24] 王崑義，〈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共識〉，《九鼎月刊》，第 41 期（2011 年 3 月），頁 45。
[25] 陳宜中，〈羅爾斯與政治哲學的實際任務〉，《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2001 年 6 月），頁 50-51。
[26] 香港文匯報，〈謝長廷拋「憲法各表」 圖取代馬英九「九二共識」〉，2011 年 1 月 11 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1/11/TW1101110001.htm，查閱日期：2015/7/2。

謝長廷自己也投書媒體闡述他的主張，他認為現在國共之間的「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不但有爭議，且變成台灣內部惡鬥的工具，台灣應該尋求更大的共識，才不會造成國、共兩黨捨異求同來切割民進黨的窘境；但民進黨否認有「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也應提出替代案，他說：「台灣現在最急迫的應該是台獨派要跟維持現狀派結合，來守護台灣不要被急統，所以對中華民國的憲法，要捨異求同，做為大家認同的基本規範。」所以，對台灣內部是「憲法共識」。「憲法各表」則是對兩岸要取代「一中各表」，當然是反對一中，因為一中是台灣內部不重疊的部分，也是必須要改革的對象，但憲法可以表達台灣的主體性，彰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理論上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憲法，所以「憲法各表」不該被認為是承認一國的論述。[27]

謝長廷進一步指出，台灣在兩岸議題上，應尋求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台灣共識」，並落實在制度、法律上，才能在兩岸和解、協議上擁有堅實後盾，若民進黨有百分之六十支持率，形成民主穩固的結果，才會得到國際社會尊重；但「台灣共識不等於民進黨共識」，應包含超越民進黨的其他共識，甚至是部分國民黨和其他黨的主張，並包括中華民國憲法現狀。兩岸的憲法都有一個共識，都強調主權在民，中華民國憲法條文沒有廢掉，過去曾在大陸實行，英譯都有「China」，但中華民國當然統治台灣，中共統治大陸，國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兩憲互不隸屬，但有特別關係。[28]總括而言，謝長廷是在正視法理台獨面臨困境的角度下，另闢與中國交往的路徑。

第四節　蘇系、游系-蘇貞昌與游錫堃的中國政策

[27] 自由時報，〈關於憲法共識〉，2011 年 1 月 15 日，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460302，查閱日期：2015/7/3。

[28] 謝長廷，〈凝聚台灣共識靠中華民國憲法〉，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台北：時報，2015），頁 121-122。

壹、蘇貞昌的中國政策論述分析

蘇貞昌與游錫堃在兩岸政策的論述上比較傾向於保守的論述。蘇貞昌對中國政策方面的論述不多，大抵遵循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基調，固守柔性台獨，否認九二共識，排除統一選項，但主張有條件地務實推進兩岸互動交流，包括維持現有經貿合作，認同黨公職人員登陸交流等，同時又主張「聯美制中」，積極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對中共的立場堅定，但態度模糊。2011 年 2 月，蘇貞昌首度拋出「台灣共識」概念，主張以台灣前途決議文為主要精神，堅持台灣主權立場，守住「生存是王道、民主是基石」的兩大原則。[29]

蘇貞昌認為，台灣依目前的憲法叫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所以不接受以一個中國為前提的兩岸和平協議，認為這等於「剝奪台灣人的未來選擇權，嚴重威脅台灣的民主價值及生活方式。」他主張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前提下，以「政府對政府」的形式展開兩岸協商與談判；同時宣揚「大陸威脅論」，[30]主張發展自主國防，強調兩岸和平的障礙來自於大陸的武力威脅。

不過，蘇貞昌雖堅持台獨立場，但認識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勢趨，主張以「對話代替對抗」，在台灣主體性與安全性的前提下，漸進、穩步開展與大陸的政黨、經貿、人員交流。 因為「世界在變，中國在變，不能以不變應萬變，要積極自信地與中國交往互動」；而且「民進黨要瞭解中國，不只是現在的、經濟的中國，更應關注未來的、經濟以外的及廣大的庶民中國」。[31]

基本上，蘇貞昌長期強調台灣前途自決，對涉及一中原則的政治議題極力排斥，但不是「逢中必反」，尤其他對經濟政策相對務實，在任行政院長期間就認為陳水扁「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可以再開放些，因為中國經濟實力未來將超越美

---

[29] 自由時報，〈台灣共識 蘇兩點堅守兩岸底線〉，2011 年 2 月 16 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468937，查閱日期：2015/7/4。

[30] 自立晚報，〈蘇看歐習會 籲陸放棄對台武力威脅〉，2013 年 6 月 10 日，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artid=20130610abcd011，查閱日期：2015/7/4。

[31] 自由時報，〈參選黨主席 蘇：強黨才能護台〉，2012 年 4 月 12 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75414/print，查閱日期：2015/7/4。

國，台灣面對中國「有些政策要靈活」，應漸進式的推進與大陸是經貿往來，這即是所謂「蘇修路線」。

有關台灣主權論述的論辯，在蘇貞昌在 2015 年 1 月表示，「台獨黨綱」在整個歷史進程中已經過去了，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早已經獨立；他並提出兩岸關係新見解，拋出「中國加一」的概念。他說：「兩岸關係就像海灘之鷗，海灘有一隻鳥在走，人不要去抓鳥，牠就不會飛；牠走牠的、你走你的，你欣賞牠、牠欣賞你，兩個都很好，你要去抓牠，牠就會飛走。他認為，中國要抓住台灣的心，不要去抓他、不要去礙他，多給一點鼓勵與空間，一點都不礙事。」[32]台灣與中國一起在世界上，就是「中國加一」。

綜上，蘇貞昌雖然對中國政策論述不多，但他的態度很清楚就是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立場，他認為台灣社會最大共識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是所有台灣人的台灣，台灣是世世代代人的台灣」。同時，『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依憲法名稱叫中華民國，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決定，「這就是民主，這就是具體顯現的台灣共識，這就是民進黨的共同價值。」[33]

貳、游錫堃的中國政策論述分析

2014 年九合一大選中，游錫堃本人在一片不看好中與朱立倫對決新北市，最後僅以 2 萬票小輸做收，遠低於 2012 年蔡英文參選新北市長輸朱立倫的 10 萬票，加上贏得台中市長的林佳龍以及贏得基隆市長的林右昌，都屬於游系，讓游錫堃在選後聲勢上漲，游系繼續在民進黨內發揮影響力。

相較於蘇貞昌，游錫堃的中國政策論述更保守，更傾向於獨派論述，在民進黨內被歸為台獨基本教義派，2007 年 5 月民進黨內舉辦總統初選政見會，游錫

[32] 自由時報，〈兩岸關係 蘇拋出「中國加一」〉，2014 年 1 月 15 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46975，查閱日期：2015/7/4。
[33] 紀舜傑，〈檢視民進黨之中國政策〉，《台灣研究國際月刊》，第 9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90-91。

堃強調，做台灣的總統要說明清楚將要帶領台灣往何處去，並交代國家定位的主張為何，他主張要以正常國家決議文，取代台灣前途決議文；「唯有制定新憲法，更改國號，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才能真正改變台灣，讓台灣完全執政、完全改革、完全獨立，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社會公義、經濟繁榮、永續發展的國家。」他要讓全世界意識到台灣人民支持台灣獨立的想法。[34]

游錫堃要推動台灣正常國家化的目標其來有自，2006年紅杉軍事件發生時，他就說：「民進黨 20 年來就是要建立正常的臺灣國，現在很多人要我們倒、要讓本土政權崩潰，怕民進黨建立正常國家的理想實現。」所以，游錫堃在擔任民進黨黨主席任內，急欲在台獨黨綱與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基礎上，通過正常國家決議文，希望民進黨「積極推動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落實轉型正義與建立台灣主體性等作為，以實現台灣為正常國家。」

然而，游錫堃的強硬獨立路線，並無法為黨內多數接受，正常國家決議文通過後，「正名、制憲、建國」的訴求，讓民進黨總統提名人謝長廷在兩岸議題毫無轉圜，幾乎陷入一路挨打局面；甚至到 2012 年蔡英文參選總統，儘管蔡英文強調遵循 1999 年台灣前途決議文，但正常國家決議文的歷史陰影，仍然繼續困擾著民進黨候選人，畢竟正常國家決議文是 2007 年才通過，蔡無法以「後法蓋過前法」做自我辯護，國民黨果然緊抓這點，猛攻「民進黨連黨綱都變來變去」，質疑民進黨「表面主張維持現狀，其實並未放棄制憲建國」。[35]

事實上，游錫堃在中國政策的態度上頗為矛盾，他出任行政院長時，曾積極支持蔡英文推動的小三通及修訂兩岸關係條例，也更改李登輝的戒急用忍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但在出任民進黨主席後，卻又主導「獨」性比臺灣前途決議文還要強的「正常國家決議文」，而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又

[34] 民主進步黨，〈總統黨內初選第三場政見會　移師高雄受黨員熱烈歡迎〉，2007 年 5 月 3 日，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kw=%E6%AD%A3%E5%B8%B8%E5%9C%8B%E5%AE%B6%E6%B1%BA%E8%AD%B0%E6%96%87&m1=07&y1=2015&menu_sn=&sub_menu=43&show_title=%E6%96%B0%E8%81%9E&one_page=10&page=4&start_p=1&act=&sn=687&stat=&order_type=desc&order_col=add_date&data_type=%E6%96%B0%E8%81%9E，查閱日期：2015/6/29。

[35] 郭正亮，〈游錫堃大搞法理台獨所為何來？〉，美麗島電子報，2013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my-formosa.com/article.aspx?cid=5,15&id=50574，查閱日期：2015/7/4。

主張不應違反臺灣國家利益前提下，跟中國做正面對等的交流；在不違背臺灣前途決議文與正常國家決議文的前提下，進行對中國政策的研究與檢討。或許只能說，內心裡堅信台灣必須成為正常國家的游錫堃，雖然認為「民進黨有無執政還在其次，台灣前途第一，民進黨執政第二」，[36]但在面對環境趨勢時還是可以稍作妥協。

第五節　其它論述

壹、一邊一國連線的主張

一邊一國連線是 2010 年直轄市長暨市議員選舉前，由陳水扁之子陳致中、立委陳其邁所主導組成，立委陳唐山為總召集人，以「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為其共同追求的目標，基本上就是以扁系的勢力為基礎集結而成，首腦人物幾乎都是陳水扁創立正義連線時的大將，如許添財、高志鵬、王世堅等人；2014 年九合一大選推出 84 位泛綠及無黨籍縣市議員參選人，並簽署共同政見「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目前在立法院擁有七席立委，六都中超過三十位市議員，力量強大。

2010 年 9 月 27 日一邊一國連線及助選團於陳水扁辦公室正式成立，助選團由陳唐山、李鴻禧擔任榮譽團長，黃越綏擔任總團長，台灣北社社長陳昭姿、台灣南社前社長鄭正煜、台灣客社社長張葉森、公投護台灣聯盟召集人蔡丁貴、前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黃慶林擔任副總團長，名單一字排開，等於是獨派勢力大集合，強調台灣主體性，以台灣獨立為目標。

不過，一邊一國連線政策論述不多，大多是挺扁主張，在中國政策論述上，就是陳水扁喊出的「一邊一國」。「一邊一國」的產出背景，主要是民進黨 2001 年在國會成為最大黨後，想要在兩岸關係上有所作為，但在各種國際上的外交或

[36] 自由時報，〈正常國家是民進黨願景　游錫堃：為何不敢講〉，2012 年 11 月 5 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718947/print，查閱日期：2015/7/4。

經濟場合，中共卻仍頻頻對其進行打壓，尤其是在 2002 年 7 月 21 日陳水扁兼任民進黨黨主席就職當日，中共宣布與台灣原邦交國諾魯共和國建交，以粗暴的方式刻意給陳水扁難堪，陳水扁當下在致詞中，脫稿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要走台灣的路，要走出台灣的前途」，引起「一邊一國」的序幕。

2002 年 8 月 3 日陳水扁向在日本舉行的世台會第 29 屆年會發表演說，表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跟對岸中國是「一邊一國」，在面對中共武力的威脅和在國際上的打壓，台灣要堅持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條自由民主的大路；2006 年 9 月 28 日在民進黨 20 週年黨慶致辭說，「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與中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這種簡單而明確的國家定位，相信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內心共同的信仰與不變的堅持。」這兩段說法，大抵即可說明一邊一國連線在中國政策上「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論述。畢竟，一邊一國連線成立至今並沒有正式提出過更完整論述的主張，其連線成員更表示，四年多前一邊一國連線打著力爭國家主權、獨立建國的旗號成立，但這數年來，連線除了若干關心陳水扁司法人權的活動偶有聲援外，有關獨立建國活動的實踐並不多見。[37]

貳、凍結台獨黨綱的全代會提案

台獨黨綱的存廢問題，從 2000 年陳水扁執政後就糾纏著民進黨，民進黨第九屆全代會，立委陳昭南就提案廢除台獨黨綱，但因爭議太大被勸說撤案。[38]民進黨團立院總召柯建銘在 2014 民進黨對中政策檢討時，建議民進黨凍結「台獨黨綱」，他指出，回顧歷史，民進黨執政時期並非沒有尋求過兩岸和解方案，陳水扁剛上任即提出四不一沒有主張，第一任期內嘗試成立跨黨派兩岸小組，提出「共同處理未來一中」、「兩岸政治統合」、「不排除未來與中國大陸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等，第二任期嘗試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推動扁宋會，進行民進黨與親民

[37] 中國評論新聞網，〈扁系一邊一國連線內訌 台南邱莉莉退出〉，2014 年 12 月 30 日，http://hk.crntt.com/doc/1035/5/0/8/103550845.html，查閱日期：2015/7/4。
[38] 中時電子報，〈陳昭南撤回「廢台獨黨綱」提案〉，2000 年 7 月 16 日，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DPP_9th/89716f83.htm，查閱日期：2015/7/1。

黨合作，代表總統與大陸方面談判尋求建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當時甚至說出「法理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但是為何皆檄羽而歸？問題可能出在民、共之間並無所謂互信存在，而台獨黨綱就是民、共雙方來往的障礙。今天的國際、兩岸和台灣社會主流民意大環境下，堅持台灣主體性與社會核心價值不變，沒有必要再回過頭去搞台獨，台獨黨綱已經完成階段性的歷史任務。

接著在 2014 年 7 月 20 日民進黨全代會中，由前立委陳昭南、郭正亮及前陸委會副主委童振源等四十名黨代表再次正式提案凍結台獨黨綱，[39]相較於 2000 年的陳昭南主動撤案，這回黨主席蔡英文以時間不足為由，將凍獨案直接交付中執會研議。陳昭南表示，凍結「台獨黨綱」並不是要放棄台灣獨立，而是認為台灣已經獨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國號為中華民國，主權屬於 2300 萬人，台獨黨綱確實已完成階段性任務。

就提案人對凍結台獨黨綱的論述，仍不脫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範圍，只能說是向中共釋出民進黨善意的一種做法。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9] 台灣醒報，〈民進黨全代會冷處理台獨黨綱〉，2014 年 7 月 20，https://anntw.com/articles/20140720-BJVn，查閱日期：2015/7/4。

第四章　民進黨中國政策與獲取執政權的關連性

第一節　國際社會的關連性

從 1949 年兩岸分治以來，兩岸關係與台灣對外關係息息相關，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自不能作為孤立於兩岸之間的單獨課題，而應該放在東亞區域及整個國際結構裡面來討論。今天的國際結構是由美國所主導的「一超多強」權力結構，美國在東亞一直扮演主導大國的地位；金融風暴後，美國國力呈現衰退的狀態，中國國力則日漸茁壯。中國雖暫時無法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的地位，但在東亞地區這二個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一個是衰退中的霸權，一個則是崛起中的強權，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2010 年戰略調查」（Strategic Survey 2010）指出，為對抗中國日漸壯大的勢力，包含印尼、南韓與澳洲等亞洲地區的中型強權國家（middle powers）正努力增強外交與軍事力量，日本亦於 2010 年 1 月針對中國修正防衛大綱，各國均加強與美國聯繫以因應中國在經濟崛起後的軍事崛起，這種態勢可能使東亞區域安全陷入新的「安全困境」。[1]

因此，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必須在東亞區域安全之間尋求平衡，也必須尋求美國全球戰略和中國崛起之間的平衡。中共一直要台灣站在中國一方，但在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裡，台灣不能變成美國的負面因素。[2]影響所及，雖然華盛頓再三強調不介入台灣的總統選舉，但美國透過政治力影響台灣大選選民投票行為卻屢見不鮮。[3]誠如中國的軍事戰略家所言，從冷戰結束以後，台灣就變成美國用來牽制中國的棋子。[4]

---

[1] 王高成、王信力，〈東亞權力變遷與美中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39 期（2012 年 7 月），頁 43,49。

[2] 陳明通，〈建構台灣、東亞和國際的新平衡策略〉，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台北：時報，2015），頁 83-84 。

[3] 劉世忠，〈民進黨兩岸政策中的美國因素〉，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台北：時報，2015），頁 263。

[4] 朱成虎編，《中美關係的發展變化及其趨勢》（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 194。

台灣從民進黨創立後，加快了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進程，在挑戰國民黨執政權力的情況下，出現了「統」、「獨」勢力的政治競逐，在爭取政治權力的過程中，「統」、「獨」勢力的中國政策成為首要的聚焦點。因此，台灣政治最核心問題就是「誰能掌握政權」及「誰能處理兩岸關係」這兩個面向，而美國對台灣事務的影響就體現在這兩方向上。

吳玉山曾點出美國對台政策有一特性，即是美國總統大選前後理想主義會高漲，華府的政策會向台北傾斜，而在兩次選舉中間，尤其是上次選舉已結束一段時間，距離下次選舉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現實主義會執牛耳，美國的中國政策會向北京傾斜；他並以台灣 2000 年總統大選為例，在總統大選逐漸接近的情形下，美國對於台灣的關切與日俱增，即使許多國會菁英反對李登輝的兩國論，但不論立法或行政部門都表示反對中國在台灣海峽採取任何軍事活動，符合華盛頓中國政策隨選舉週期而擺盪的預期；從此角度看，美國的政治人物和台灣的政治人物一樣，在選舉期間會受到較大的國內政治因素影響，而主張對本身政治地位較有利的對外政策。[5]不過，美國在重返亞太的戰略下，與中國正在建構新型大國關係，即便遇總統大選時會向台灣傾斜，但「誰能掌握政權」及「誰能處理兩岸關係」牽涉到美國的利益，民進黨不見得能從其中獲得好處。

美國近二十年來不斷介入台灣選舉，最根本的原因是台灣主體意識的抬頭導致兩岸政治意識上分歧，影響了台海穩定。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台灣在推行民主化和本土化後，已經出現相當強固的台灣主體意識，特別是對解嚴之後出生的新生代而言，雖然多數認為中國是經濟機會，但卻無意因此放棄台灣的主權與自決意識，[6]台灣主體意識終成為兩岸關係中，國、民、共等各政黨的角力點；中共把台灣主體意識認為是台獨的根源，造成台海的緊張與危機，而美國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柯林頓第一屆任期後半段，就對台北和北京傳達一項重要訊息，他不

[5] 吳玉山，〈台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選票極大化模式與戰略三角途徑〉，《遠景季刊》，第 1 卷第 3 期（2000 年 7 月），頁 17-20。
[6] 賴怡忠，〈2008-2016 台灣對中國戰略的發展與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6 卷第 2 期（2010 年夏季號），頁 93。

會支持台灣獨立，也不會支持任何可能暗示台灣為一主權獨立國家之行動，同時根據一個中國政策，拒絕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7]柯林頓政府副助理國務卿魏德曼(Kent Wiedemann)曾表示：美國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會危及臺灣海峽的和平穩定及臺灣的政經發展，而此一行動將帶來災難性的衝擊。[8]但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終究與美國的支持密不可分，台海若發生緊張情勢也將迫使美國不得不在緊要關頭出面斡旋，以免局勢失控。

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的政治結構從一元化走向二元化，出現了「統」、「獨」勢力劃分成「泛藍」和「泛綠」兩大陣營，由於美國在 1979 年通過《台灣關係法》後，長期扮演著台灣保護者角色，台灣人民也根深蒂固地以為美國是台灣對抗中國的最大靠山，「泛藍」和「泛綠」陣營都不約而同地希望爭取美國支持，「挾美自重」成為各政黨在政治競逐獲取執政權的關鍵因素之一；而美國也樂於成為影響藍、綠力量的關鍵因素，因為透過影響台灣內部政治力量的平衡，能有效地幫助美國實現在台灣海峽和亞太地區的戰略意圖。

對民進黨獲取執政權比較不利的是，自尼克森訪中以來，美國即表明「不支持法理台獨」是其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底線，甚至必要時，美國會出於自身利益制止台獨分裂行為，而目前中共是以「防獨勝於促統」表現在政策作為上，[9]因此中共不斷利用美國來達到「以美制獨」的目的。事實上，藉由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力，通過美國來制止台獨比中共使用非軍事手段阻止台獨更有效，從 2003 年以來台灣問題發展看，美、中在「遏制台獨」、「維護台海地區穩定」上有共同利益。

2002 年下半年之後，兩岸間的關係持續的惡化，陳水扁先提出一邊一國的立場，繼而在總統大選時提出公投及制憲的主張，均使中國覺得台灣有意推動台獨，美國基於反恐需要中國配合，也求維持台海的穩定，不願見到台灣因採取挑

---

[7] 楊永明，〈從戰略模糊到三不政策：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理論與政策》，第 12 卷第 4 期（1998 年 12 月），頁 94。

[8] Kent Weidemann, “Taiwa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U.S. Department ofState Dispatch*, Vol.6, No.34 (August 21, 1995), p.655.

[9] 顏建發，〈國民黨的中國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2 期（2013 年夏季號），頁 67。

釁的政策，使台海地區發生衝突，自總統大選前，美國透過公開及私下的管道，要求台灣有所節制，形成美國與中國聯手壓制台獨的發展。[10]

事實上，早在 2000 年美國即透過影響力要求陳水扁在選前承諾「四不一沒有」中的「三不」；2003 年 12 月初溫家寶總理訪美期間，小布希總統發出反對民進黨政府推動公投舉動的最強硬的聲明，稱美國「反對任何來自中國或者台灣意圖改變目前現狀的單方面決定」，當著溫家寶的面批評尋求連任的陳水扁「評論和行動顯示他或許要單方面決定改變現狀」；2008 年要求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與陳水扁推動的「入聯公投」切割；2011 年再次出手傷害蔡英文的總統選情。[11]

2011 年 9 月，蔡英文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身份訪問華府，會晤歐巴馬政府美國副國務卿奈茲以及東亞助卿坎貝爾等官員，[12]但就在蔡英文結束華府行程，歐巴馬政府國安會高層官員逕自透過媒體放話表達對蔡英文的不信任；[13]英國「金融時報」9 月 15 日在報導中引述不具名的美國資深官員說，歐巴馬政府擔心若蔡英文當選，可能升高與中國的緊張關係，被解讀為美國政府不相信蔡英文有能力和意願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似乎美國有意在台灣總統大選中選邊站。[14]也因此蔡英文在 2012 年敗選時提到，民進黨要重返執政還剩下「最後一哩路」，而外界多認為這距離勝選的一哩路，就是民進黨對兩岸的中國政策，可見在中國政策上獲得美國的信任與支持有多重要。

因此，蔡英文為了 2016 總統大選，在 2015 年 5 月 29 日再度訪美 11 天，當中包含造訪首府華盛頓，期能以「維持現狀」論述得到美方認同。事實上，此次蔡英文訪美，早在 3 月 20 日美國在台協會（AIT）前執行理事施藍旗（Barbara Schrage）即於華府表示，「美國已悄悄對蔡英文施壓，希望蔡提出能讓華府及北

---

[10] 王高成，〈台灣總統大選與台海安全：一個政治層面的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9 期（2005 年 1 月），頁 23-42。
[11] 劉世忠，前引文，頁 263。
[12] 自由時報，〈蔡訪美：盼建立堅實溝通機制〉，2011 年 9 月 13 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23783，查閱日期：2015/7/5。
[13] 劉世忠，前引文，頁 262。
[14] 自由時報，〈國務院：台灣大選美不選邊站〉，2011 年 9 月 17 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24792，查閱日期：2015/7/5。

京放心的兩岸政策。」[15]

美國雖然在 2012 年暗助馬英九連任，但並不意味著美國對國民黨執政下的兩岸關係走向不持戒心，實際上，從 2008 年泛藍陣營贏取總統大選後，美國已經出現了對國民黨兩岸政策走向的憂慮。美國會研究部的一份報告警告說，國民黨在經濟利益的支配下甚至可能會與北京達成和解，最終損害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利益。儘管如此，民進黨也很清楚，台海的和平，才是美國最關切的，就如同 2012 年初，美國國務亞太事務助卿坎伯在東京與日本討論台灣選舉時，公開表示，美國與日本極願意維持台海和平與穩定，台海能延續對話與經濟交往，才能符合各方最佳利益；而且對 2016 年的總統選舉而言，最符合美方利益的，乃是一個想獨而獨不起來的民進黨，以便能與北京對峙，但又必須鬥而不破，以免美國被拖下水，若以此觀察，美國對於蔡英文參與 2016 年總統大選，應該是抱持歡迎的態度。

華府智庫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資深研究員任雪麗（Shelley Rigger）在研究所網站發表專文指出，蔡英文 2015 年再度訪美情勢與上次不相同，目前她的民調領先所有可能對手。任雪麗表示，蔡英文當年訪美拒絕北京的兩岸關係構想，並遭美國官員批評；這次她的底線雖與 2012 年不同，但還是沒有說出中方想聽到的字眼，對於「九二共識」，蔡英文一如上次拒絕為其背書，然而華府未有反彈聲浪，兩次出訪的落差，反應出台灣本身與美中關係過去 4 年的重大變化。因此，美國如同台灣選民，可能在重新思考更密切的兩岸關係是否一定比較好。過去 4 年，中國崛起引發的懷疑與焦慮，影響了美國政策與台灣內部政治；基於這些變化，未來台灣的總統與立委選舉加溫，仍有許多值得觀察。[16]

除了美國之外，日本對於中國崛起也是深自警惕；日本是最早指出「中國崛起」的國家之一，並認知到北京挑戰區域秩序的潛力，1990 年，日本防衛大學

[15] 中時電子報，〈「維持現狀」兩岸論述口試 蔡英文 529 訪美 11 天〉，2015 年 5 月 9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09000286-260102，查閱日期：2015/7/5。

[16] 任雪麗，〈蔡訪美後台灣大選待觀察〉，中時電子報，2015616，http://udn.com/news/story/5/996088，查閱日期：2015/7/5。

教授村井友秀即在《諸君》雜誌中撰文「新中國『脅威』論」。[17]因此，中日經濟關係雖然持續發展，但就外交和區域安全而言，日本對中國崛起抱持著非常謹慎的態度。

日本與台獨勢力的接觸歷史久遠，台灣獨派大老辜寬敏、許世楷等人在 1960 年代即在日本成立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台獨組織「台灣青年社」；[18]2010 年安倍晉三首相下台後訪問台灣，在台北正式參訪行程結束後，他還利用晚上的時間自行驅車去與民進黨人「續攤」[19]；311 核災之後，台灣的捐款世界第一，讓日方極為感動，在災後的重建的過程中，就把台灣當成日本相關廠商重建的最重要海外基地，地點就選在南台灣，因為台南市是綠營執政，顯見民進黨與日本的關係。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12 月第二次上台後，其所推動的首腦外交日趨活躍，繼就任之初訪問越南、泰國和印度尼西亞之後，還先後訪問了美國和蒙古，2013 年 4 月又訪問俄羅斯等 4 個國家；以「俯瞰地球儀外交」的方式在就任後 4 個多月就訪問了 9 個國家，這在歷任日本首相中非常罕見。安倍晉三在 2006 年第一次擔任首相時，首次的出訪選擇了中國，同時提出了「戰略互惠關係」，但他第二次擔任首相時卻選擇了與中國相鄰的東南亞、蒙古和俄羅斯，猶如包圍中國一樣，不難看出安倍的外交戰略和關注點的轉變。[20]這種態勢更有利於反親中立場的民進黨。

隨著中國崛起世界環境的變化，美國可能將於未來逐漸面臨被動的情境選擇，而美國對於未來介入世界的戰略選擇，是否轉變當前的積極干預態度，將直接影響東亞國家之間結盟關係。美國若從當前積極干預轉變為「託付」日本擔任亞太地區代言人，則有利於日本採取與中共對峙的戰略態勢，但若美國最後選擇了淡出亞太地區的戰略，日本就有兩種戰略選擇：一是組成新的聯盟以對抗中共，二

---

[17] 村井友秀，〈新・中國「脅威」論〉，《儲君》，第 22 卷（1990 年 5 月），頁 186-197。
[18] 華夏經緯網，〈台獨組織及活動〉，http://big5.huaxia.com/zl/tw/td.html，查閱日期：2015/7/8。
[19] NOW 今日新聞網，〈安倍晉三搭小黃會民進黨 楊進添認了：不是故意的〉，2010 年 11 月 3 日，http://www.nownews.com/n/2010/11/03/621411，查閱日期：2015/7/8。
[20] 〈從安倍出訪看其外交戰略〉，《日經中文網》，2013 年 4 月 26 日，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5406-20130426.html，查閱日期：2015/7/5。

是傾向與中共合作或保持中立。如果是最後一種情勢，將明顯導致台灣在區域國家中的孤立，依據這種觀點，台灣最希望美國在此一地區繼續維持美中之間現狀權力的平衡，維持現狀以等待中共政權在本質上的轉變。[21]

第二節　兩岸的關連性

2012 年總統選舉結束後，民進黨就被蔡英文的「最後一哩路」逼著檢討中國政策，儘管當時蔡英文講這句話時，並不見得就是指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是影響選舉的關鑑因素，但因為敗選的隔天，部份媒體以兩岸因素定勝負的角度報導，中共和國民黨更刻意操作九二共識就是最後一哩路，強化人民對民進黨兩岸政策不放心的刻板印象。[22]續任黨主席的蘇貞昌上台後，為了檢討民進黨中國政策路線，進一步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與召開華山會議，希望尋求黨內共識來突破那「最後一哩路」。

兩岸關係從 1949 年的軍事對立，走向 1990 年代「政治疏離、經濟融合」的基本結構。[23]民進黨因為選舉的關係，修改黨內對中路線並不是第一次，最重要當屬 1999 年台灣前途決議文的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起因，是在陳水扁台北市長選舉失利後，其所屬派系正義連線將敗選責任，歸咎於民進黨的台獨主張；而且為了即將到來的 2000 年總統大選，避開「台獨是票房毒藥」的困擾，尋求修改台獨黨綱。但在其他派系的反對下，最後改以「本文不動，只作附加決議」的方式處理。「台灣前途決議文」承認了「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又不挑戰「中華民國」的國號，在立場上向中間靠攏，形成陳水扁所謂「新中間路線」，

[21] 翁明賢，〈對歐巴馬兩岸政策的反思：台灣觀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5 卷第 1 期（2009 年春季號），頁 13-14。
[22] 中時電子報，〈國民黨轉型，兩岸關係定勝負〉，2012 年 1 月 15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20115000234-260102，查閱日期：2015/7/5。
[23]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台北：正中，1997 年），頁 159。

陳水扁競選總統時所提的有關兩岸關係、中國政策，即是建立在此一基礎上。

1999 年 11 月陳水扁提出「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指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兩國特殊關係的走向，以及任何改變現狀的決定應該經台灣人民同意。」而「推動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全面正常化，正是跨世紀中國政策的主軸。」[24]其中的意義即代表民進黨承認「中華民國」做為台灣的國號，並將兩岸關係的定位應為「兩個國家的特殊關係」，未來兩岸關係可以全面正常化。

「台灣前途決議文」是民進黨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台灣在實質上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與其去爭執是否「要從中華民國『獨立出』台灣共和國」，倒不如正視對岸中共的強大主權圖謀壓力。「台灣與對岸大陸是兩個不同主體」的堅持，是當今台灣國家安全最重要之所在，民進黨為了邁向執政，為了要向選民宣示民進黨是一個「有能力的執政黨」，選擇了務實轉型的道路，向執政之路前進。整體而言，民進黨的兩岸關係論述至此又回歸過去所主張的「住民自決」，保持兩岸關係的開放性與多重選擇性；這種策略性的調整使得民進黨在現實政治中得到最大利益，因此，在確保台灣安全和「台灣主權獨立」的因素考量下，繼續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是民進黨最有效的策略，這項主張也幫助民進黨取得執政權。[25]

但是民進黨從建立台灣共和國退回至承認中華民國，並沒有降低中共的敵意，終於讓陳水扁說出「台灣要走自己的路」。邵宗海解讀，陳水扁在「一邊一國」及「公投立法」清晰談話後，外界終於瞭解陳水扁政府在過去對台灣民眾所講的話，就是要走向「台灣實質獨立」之路，並希望能對其個人甫接任黨主席的民進黨加分，提高年底北高市長選舉的聲勢，更為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前哨戰作提早部署，在中共拒絕承認台灣存在的事實，無意接受台灣為其談判對手情況下，陳

[24]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原員會，〈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附錄）〉，1999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8311&ctNode=6621&mp=1，查閱日期：2015/7/5。

[25] 林德宇，〈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48-49。

水扁積極設法讓中共面對海峽兩岸的現實。[26]北京當然對陳水扁所提出的「一邊一國」、公投新憲等主張表示反對，警告「陳水扁當局」懸崖勒馬，立即停止利用公投立法進行分裂國家的罪惡活動。[27]

中共對於台灣政治主張的反應，以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其實已趨於僵化而非理性，幾乎台灣所有的政治變革，都傾向以台獨的面向解釋，尤其陳水扁出身民進黨，在 2000 年就任總統後就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再加上一連串「去中國化」的作為，都使北京認為陳水扁在推行「漸進式」的台獨。只不過，鑑於 1996 年大規模軍演的恫嚇，以及 2000 年朱鎔基的疾言厲色，強烈的動作及言詞回應，不僅未能通阻台獨勢力發展，反而促使「反中共」的候選人當選總統，並種下了台灣人民仇視中共的心態；2004 年總統選舉中共儘管不滿意陳水扁的政治主張與作為，反應卻相對低調，對於台灣的一連串的政治主張，僅停留在言詞批評的層次。[28]

不過，陳水扁的努力證明是白忙一場。2008 年台灣再次政黨輪替後，中共對民進黨設下以「廢除或凍結台獨黨綱」作為兩黨正式交往的前提，過去六年來，無論蔡英文、蘇貞昌或謝長廷在中國政策上做出什麼樣的改變或調整，例如批判蔡英文「十年政綱」、無法接受謝長廷「憲法共識」，連蘇貞昌主導的「2014 對中政策檢討紀要」都大表不滿。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很容易產生一個基本判斷，就是無論民進黨做什麼調整，北京都是用有色眼鏡在看民進黨，中共內心裡並不想要，甚至認為不需要跟民進黨交往或談判，中共會對民進黨私下接觸，目的只在統戰或是轉化民進黨。也無怪乎蔡英文會說出：「只要能打贏年底九合一選舉，中國會自動朝民進黨方向調整；而且，只要中國調整，美國就沒什麼好講的了。」[29]

事實上，民、共雙方都應該看到，雖然彼此立場相反，但挑戰是相同的，政

[26] 邵宗海，《當代大陸政策》（台北：生智，2003），頁 110-111。
[27] 《中國時報》，2003 年 11 月 18 日，A4 版。
[28] 王高成，前引文，頁 31-32。
[29] 中時電子報，〈小英：打贏選戰，大陸會朝綠調整〉，2014 年 7 月 10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10000402-260102，查閱日期：2015/7/5。

策的調整都要兼顧四個方面的平衡：第一是兩岸關係發展與國家整體利益的平衡；第二是兼顧政策穩定一貫與求新求變的平衡；第三，兼顧突破僵局與維持現狀的平衡；第四，兼顧中國崛起與美國重返亞洲的平衡。[30]所以，民進黨為取得執政，蔡英文的中國政策已稍微往中共能「忍受」的方向調整。

但中共顯然還沒有這樣的體會，2016 年總統選舉將近，中國人大常委會即在 2015 年 7 月 1 日通過新版國安法，明定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台灣同胞的「共同義務」，其意義是重提「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老調；然而，中國任何片面作為，都無法改變現階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及兩岸互不隸屬的事實，中共未正視兩岸分治現實及尊重台灣人民對維持台海現狀的堅持，並不利於兩岸關係良性互動發展。[31]2012 年總統大選中打「恐嚇牌」有用，但在 2014 九合一大選中已變成負面作用，兩岸關係中民、共的競合實已需要新思維來調整。

第三節　台灣內部的關連性

民進黨在思考的中國政策時，應該先確立三項政策目標：（一）贏得總統大選取得執政權；（二）建構國會多數穩定施政；（三）推動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和解。而要達到這三項政策目標，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必須遵循三項原則：讓台灣人滿意、美國接受與大陸忍受。這三項原則中，最重要的是必須要符合台灣的主流民意，也就是要大多數的台灣人民滿意，民進黨才有機會執政；台灣的民意與民主才是民進黨執政後對中國最大的籌碼。但根據民進黨的民調，馬政府與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主張都沒有獲得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支持，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滿意度甚至比國民黨來低。[32]

---

[30] 董立文，〈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夾縫中求變〉，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台北：時報，2015），頁 250-251。
[31] 《自由時報》，2015 年 7 月 2 日，A1 版。
[32] 童振源，〈對民進黨的四項兩岸政策建議〉，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台北：時報，2015），頁 228。

人民的政治態度，向來是「資訊與既有傾向的結合」。[33]放在選舉看，就是選民的投票行為，受到資訊與既有傾向的影響，形成認同與否。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多年來給台灣人民「逢中必反」的刻板印象，所以當九二共識被描繪成兩岸和平穩定的基礎，不承認九二共識存在的民進黨，似乎就無法提供台灣人民對民進黨執政後兩岸和平的信心；在2012年選舉期間，蔡英文以「台灣共識」、「我是台灣人」及「Taiwan Next」當做選戰的主軸與口號，馬英九則提出「認同三段論」:「血統上，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身分上，我認同台灣、為台灣打拼，我是台灣人；國籍上，我是中華民國國民，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就國家認同的界限而言，二人皆是以「台灣／中華民國」為我群，相對於「中國人民共和國」的他群，差別在於國、民二黨長期以來對臺灣未來走向立場上的不同，這些差異顯示了台灣社會對認同內容的共識與歧見，[34]所以當2012年馬英九以80萬票的差距勝過蔡英文時，國、共兩黨認為這是反映了當前台灣求和平、求穩定、求發展的主流民意，反映了台灣人民對九二共識的認同。

在兩岸關係中，一般人民思維中還是存在「和與戰」、「穩定與衝突」、「信任或不信任」三個思維。這三個思維影響到選民投票意向，影響其對政黨的認知。民進黨因為有「台獨黨綱」的制約，而蔡英文擔任主席時雖提到「台灣共識」，卻沒有清楚擘畫兩岸關係新內涵，也未解釋執政後如何規劃設計兩岸關係；因此，民眾因民進黨「台灣共識」的模糊，反而鮮明了「台獨黨綱」的對比，結果讓長期停留在「和與戰」及「穩定與衝突」和「信任或不信任」對立思維的民眾，當民進黨的中國政策無法說服選民如何保障生活安全時，就影響了選民的認同。

誠然，2008年以來，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簽署了包括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兩岸直航等21項協議，促進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而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濟交流，隨著中國的經濟實力愈來愈強，台灣逐漸失去投資者及領

---

[33] John Zaller, *The Nature &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6.

[34] 鄭夙芬，〈2012 年總統選舉中的台灣認同〉，《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4 期（20131 年 12 月），頁 108。

先者的角色，從而改變了兩岸經貿關係；現今台灣經濟愈來愈依賴中國，尤其某些產業，特別是電子業，台灣的生產研發實力儘管優於中國，卻需大量依賴中國市場的採買；過去台灣是高姿態到中國觀光，現在是台灣經濟相當依賴大量中國觀光客來台消費；諸如此類，都會影響台灣人民投票時的選擇。因此，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對於台灣的總體發展而言，有著難以言喻地重要性，也是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希望。

台灣是一個海島型國家，經濟上高度仰賴出口貿易，而中國大陸廣大的內需市場是台灣世界貿易出口的主要對象國之一；在兩岸關係上，「民生交往」與「雙方經濟利益」才是兩岸關係最直接與深遠的意義。2008年總統選舉，有學者檢視民台灣民眾的感性認同與理性思維對投票意向的影響，感性認同可以概括為台灣意識，理性思維則是經貿利得與戰爭風險，發現台灣意識對於民眾的投票選擇，仍有重要的影響力，同時也是穩定民進黨基本盤的重要因素；而戰爭風險雖然沒有主宰民眾的投票思考，但對經濟利益的考量則有重要的影響，所以提出兩岸共同市場的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而當選。[35]

也因為海峽兩岸雙方民眾所期望的，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和平穩定」，而非「意識對立」。隨著兩岸經濟交流的快速、深化，兩岸關係中最受兩岸人民所關心乃是經濟層面議題，相對於兩岸經濟議題趨勢的熱絡，民進黨因為以兩岸「政治意識」為前提，使得在選舉過程中兩岸議題的「經濟優勢」難以獲得認同，導致在全國性選舉中無法獲得最大公約數支持。現階段，以「經濟思索」來衡量兩岸關係的「純經濟」選民約有 73.9%。若再以「準經濟」選民來看兩岸關係選民的比例高達 82.5%。很清楚地，「兩岸關係經濟化」是民進黨無法逃避的嚴峻挑戰。[36]

不過，兩岸關係中以「經濟思索」為主的選民雖然希望維持兩岸關係穩定交

[35] 陳陸輝、耿曙、王德育，〈兩岸關係與 2008 年臺灣總統大選：認同、利益、威脅與選民投票取向〉，《選舉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2009 年 11 月），頁 16。
[36] 童振源，〈兩岸關係與台灣民意〉，收錄《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蘇起、童振源編（台北：五南，2013），頁 230。

流，並沒有改變國家認同；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以「國家認同」而言，將「台灣人認同」比例減去「中國人認同」比例當作是「台灣人認同指數」。「台灣人認同」指數從1993年的-7.9％，增加至2000年24.4％，再增加至2007年38.3％，最後增加至2011年48.3％，在馬英九執政四年是台灣認同指數增加最快的時期。[37]

從這些民調與總統選舉結果可以看出，台灣人民並沒有因為兩岸經濟利益放棄台灣主權，反而更加鞏固國家認同與價值。隨著兩岸經濟與社會交流日益擴大，日後在維護台灣主權與堅持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國民黨與民進黨兩政黨誰能同時維持兩岸互動與擴大兩岸社會、經濟交流，才會是兩岸關係選民與兩岸經濟選民的支持對象。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7] 童振源，《台灣的中國戰略：從扈從到平衡》（台北：新銳文創，2011），頁 201-213。

第五章　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對策研究

第一節　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戰略意圖

中共對台灣實際作為的底限，向來訂在不能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例如胡錦濤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提出胡六點，第一點即是要兩岸恪守一個中國原則，認為兩岸在一個中國框架的原則，達成共同認知與一致立場，兩岸才有政治互信進行協商，繼續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要條件。所以，要探討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戰略意圖，應先從民進黨迄今為止發表過的六次決議文，分析其在台灣主權立場的脈絡演變，因為這六次決議文引導著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走向。

1987 年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令，解除黨禁，1988 年民進黨通過「417 決議文」主要內涵為「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以北京為首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主張台灣獨立」。這個時候的民進黨，認為台灣尚未獨立建國，只擁有國際獨立主權，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切割。

1990 年通過「1007 決議文」，內涵為「台灣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我國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此時提出「事實主權說」，就表示台灣還沒有「法理主權」，換句話說，民進黨認為台灣當時雖尚未獨立，但是很清楚的釐清台灣主權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

1991 年的「台獨黨綱」指出：「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台灣本應就此主權獨立之事實制憲建國。」所以民進黨主張「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此

即表示當時民進黨雖認為台灣還沒有獨立，但強調台灣已有「主權獨立」的事實，所以應該要制憲、建國，只是其過程必須經由公投來完成。

1999 年公布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指出台灣經過 1992 年的國會全面改選、1996 年的總統直接民選、以及修憲、廢省等政治改造工程，已使台灣事實上成為民主獨立的國家，這個時候，民進黨很清楚強調「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領海與鄰接水域。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等於宣布台灣已經獨立，主權及領土都已界定，現狀就是獨立的狀態，只是名稱叫做中華民國，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理昭然若揭。也因此「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中國併吞的藉口。」

2004 年發表「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指出，台灣經由民主化建立國家主權後，已無外來統治問題，只有如何共同抵抗外來併吞的挑戰；而且中華民國主權既屬於全體台灣人民，而非其他政權，則台灣認同與中華民國認同，都是對國家認同的表達方式。這個立場已不同於 1999 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不僅主張台灣已經獨立了，更將台灣與中華民國劃上等號，中華民國的本質就是台灣。

2007 年民進黨在黨主席游錫堃的主導下，通過「正常國家決議文」，或許可以說是對 2005 年中共通過反國家分裂法的反制，認為台灣在國際關係、憲政體制、國家認同等都不正常，所以要「強化台灣意識，並體認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已很難在國際社會使用，因此應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且早日完成台灣正名，制定新憲法，在適當時機舉行公民投票，以彰顯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個時候的民進黨不但認為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不認同中華民國的國號，所以要制憲、正名，行獨立建國之實，整個主張已退回台獨黨綱，差別只在於台獨黨綱認為台灣還沒有獨立，而正常國家決議文認為台灣已獨立。

雖說正常國家決議文走回頭路，限縮了民進黨中國政策論述的彈性，也招致

黨內不少檢討的聲音，但貫穿這六次決議文的內涵，可發現民進黨一路走來永遠不離一個核心精神-「兩岸主權分離」：既然是主權分離，台灣與中國自不可能是「一個中國」，所以，兩岸會不會是「一個中國」，只能是議題，不能是前提。

2008 年馬英九上台後，台灣總統府一再強調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中國及國際上對於九二共識的理解向來只有一個中國，而且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各表」。2012 年胡錦濤在十八大提出「一中框架」的說法後，得到馬英九授權的吳伯雄在 2013 年 6 月 13 日與習近平見面，他提出「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主張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架構來定位兩岸關係，而非國與國的關係」。過去馬英九不接受一個中國，只接受一中各表，但吳伯雄沒有在習近平面前以中華民國表述一中，反而直接承認台灣的法律、體制都主張一個中國原則，顯示馬英九的一中各表防線開始空洞化，一中框架實際上進一步架空了台灣的主權地位。[38]

所以，民進黨做為台灣最大在野黨，為了避免國民黨將台灣帶入「終統」的死胡同，維護台灣人民的民主自由社會，從意識型態到政策立場，都必然要突破一中框架，堅持台灣主權獨立，並藉以取得執政權；換句話說，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與獲得執政權，必須做正面的連結。從民進黨六次決議文的演變，民進黨在 1999 年台灣前途決議文就已確認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獨立的現狀並不一定需要制憲立國，只要維持現狀就是獨立，就是確認台灣的主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涉，民進黨只要形成一套中國政策論述可以和中國對話、交流，維持台海現狀，在國際社會行使正常國家權力，意義上就已在一中框架的對立面。

第二節　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機遇與挑戰

壹、機遇--有利的條件有哪些？

[38] 洪奇昌、張國城，〈兩岸和平發展的機遇與挑戰〉，收錄《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蘇起、童振源編（台北：五南，2013），頁 33-34。

中共在台灣 2014 年九合一大選前即已針對台商做了佈署，據稱將有 15 萬台商回臺投票，[39]選後並安排了密集的兩岸活動，例如已規劃的海協會長陳德銘 12 月訪臺、兩岸企業家峰會等，企圖影響台灣選舉。然而，中共似乎也做好面對國民黨敗選的準備，因此，選舉結果國民黨雖然空前的慘敗，中共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第一時間即喊話說，「我們注意到這次選舉的結果。希望兩岸同胞珍惜兩岸關系來之不易的成果，共同維護並繼續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不像國民黨面對選舉結果的驚惶失措。

事實上，中共在台灣太陽花學運之後，就應已感受到台灣人民對馬政府親中政策的疑慮，此次九合一選舉的結果，只不過證實這個疑慮確實存在而已。因此，中國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在選後的 12 月 9 日展開 8 天 7 夜的台灣參訪行程所代表的意義，在於讓兩岸關係「保持樂觀」，其目的是為了維持兩岸關係的溫度，彰顯「選舉結果是一回事，兩岸交流又是另外一回事」，而「兩岸交流的重要性肯定高於選舉結果。」而且，儘管北京方面不滿意馬政府主政的台灣延宕服貿、貨貿的談判，但在選舉過後，卻也未對此出言恫嚇，在陳德銘的參訪中也只象徵性地強調「兩岸協商必須加速。」反而重心在觀摩台灣的商業文化、評估執政黨敗選的原因，並著眼於農業、生技與健保產業參訪，可以看出中共試圖讓九合一選後的兩岸關係維持在較穩定局面。

所以，證諸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說中共對台政策是持續性、穩定性的談話，加上 2008 年以來，兩岸已簽署 21 項協議，中國過去 6 年已投資諸多心血，在馬政府還有一年執政的情況下，斷不會貿然把這些投資下去的成本付諸流水，2016 年選舉前，北京當局沒必要馬上修正對台政策。

這樣的情況，讓民進黨在這段期間的中國政策沒有往「一中」方向調整的必要。2012 年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總統大選中「差一哩路」而挫敗，這「一哩路」究竟是要再向中間靠攏些，還是要堅持「國家主權獨立」道路，也曾引發民進黨

[39] 中時電子報，〈返鄉投票台商預估 15 萬人〉，2014 年 11 月 28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28000476-260102，查閱日期：2015/7/6。

內對中國政策論述的爭辯，甚至有「凍結台獨黨綱」的提案；但隨著該提案在全代會中被擱置，九合一大選又大勝，蔡英文目前沒有必要去調整她自己的中國政策路線的主軸－「維持現狀，推動民共對話，鼓勵民進黨與中共交流，同時強調北京不能只與國民黨打交道」。

因此，諸如 2014 年 6 月蔡英文釋放願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面的訊息，台南市長賴清德訪問上海這類事件，民進黨都會抱持樂觀積極的態度。蔡英文相信，以中共的立場也希望兩岸關係不會因為政黨輪替而受到影響，因此民進黨也可以和中國維持一個穩固的關係，而且只要民進黨有實力，中共也會調整步伐。

從以上兩方的態度，可以看出不論是中共還是民進黨，在九合一大選後仍都希望在兩岸關係上取得穩固的狀態，而為求得兩岸「和平發展」的最大公約數，蔡英文在過去也說過會「概括承受」兩岸達成的協議，如果民進黨 2016 年執政，蔡英文即便想突破一中框架的束縛，但只要實際作為堅持在兩岸現狀的維持，兩岸目前和緩的關係不會一夕崩盤；同時，相較於中國前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造成的風波，這次陳德銘來台引發的關注與抗議都減少，這些都說明民共的對立已減緩，雙方都有意朝正常化方向發展，至於中共也深刻體認到國民黨不可能永遠執政，未來必須與民進黨充份溝通、交流將是最重要的課題。

除了台灣內部民意對馬英九親中的疑慮、民共對立減緩的機遇外，習近平於 2013 年 6 月習歐會上提出中美應發展不同於兩極對抗、圍堵模式的新型大國關係，對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論述也是一個契機，尤其台灣在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中居於何種地位至為重要，2011 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夏威夷「東西中心」演說中，明確把台灣定位為安全和經濟夥伴，顯示台灣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中的合作夥伴之一。在經濟議題上，台、美對中國都是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在安全議題上，台、美都需要警戒中國的軍事擴張。所以，在中美仍有競爭關係的條件下，美國強化在亞太的軍事部署，將可減輕台灣在軍事上所受到的威脅，降低

民進黨的後顧之憂。[40]

貳、挑戰--風險有哪些？

台海兩岸的軍力從 2000 年之後就已經失衡，中國的軍力開始優於台灣，美國國防部智庫蘭德公司(RAND)2009 年 8 月 3 日發表了兩岸「均勢問題」(A Question of Balance :Political Context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Dispute)的報告，它警告：近年來臺灣內部的「臺灣意識」呈現上升趨勢，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已經過半，使得馬政府在兩岸政策上受限於國內政治，無法符合中共的期望。一旦中共發現經濟拉攏等和平手段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就有可能使用非和平手段。[41]所以，中共不曾放棄以武力攻臺的準備。

美國國防部 2015 年 5 月 10 發表《2015 年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指出，共軍對台軍事部署未有顯著變化，飛機和潛艦數量仍大幅超越台灣，中方戰機架數是我軍 4.5 倍、地面部隊人數為我軍近 10 倍，兩岸軍力懸殊。台灣依恃的地理位置和軍事科技優勢，隨共軍現代化發展不斷喪失；報告同時指出中國雖在馬英九 2012 年連任總統後，對兩岸關係發表正面的聲明，但仍不排除以武力進攻台灣，並重申中共對台用武的 6 項前提條件不變，即：台灣宣布獨立、台灣明確朝向獨立、台灣內部動盪不安、台灣獲得核武、兩岸和平統一對話的延遲、外國兵力進駐。[42]

在這六項前提中，民進黨最需要考慮的是「兩岸和平統一對話的延遲」，證諸民進黨過去六次決議文，民進黨顯然排除和中國統一的選項，而且認為現狀就是台灣已經獨立，統一才是改變現狀，所以在戰略上會以「積極維持現狀」為階段性目標，對中共而言，是否構成「延遲兩岸和平統一對話」的情況，值得觀察，但以中共對台武力威脅的外在條件下，安全議題若不能保障，民進黨要突破一中

---

[40] 洪奇昌、張國城，前引文，頁 45-47。

[41] 張廖年仲，〈從蘭德公司『均勢問題』報告看台海關係」〉，《亞太和平月刊》，第 1 卷第 10 期（2009 年 10 月），頁 12-14。

[42] 蘋果日報，〈美示警：共軍可能犯台〉，2015 年 5 月 10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50510/36542151/，查閱日期：2015/7/6。

框架，並不容易說服台灣內部主流民意。

民進黨以台獨黨綱作為理念雖與國民黨做出明確差異，但也變成與中國交往的阻礙，中共表明一個中國原則或九二共識是兩岸交流的基石，國際上對於九二共識的理解也是只有一個中國，並沒有「各表」的認知，可是，根據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在 2013 年兩岸協商議題上，贊成續用九二共識的比率占 38%，不贊成的比率為 28%，跟民進黨一樣認為九二共識不存在的比率則只有 5.7%，贊成九二共識的比率較高；行政院陸委會在 2014 年 11 月所做民調指出，53.4%的台灣人民認同「政府對於九二共識的立場，就是一中各表，一中就是中華民國」，另有 35.6%不認同。[43]台灣人民目前接受九二共識的態度，對民進黨突破一個中國框架就是一種阻礙。

究其緣由，是因為台灣始終有一種思維，將兩岸關係作為是解決內政問題的方式來看待，並且高度寄託於中共的善意，錯誤地以為兩岸是在一中各表的共識下發展關係，甚至默認兩岸是在一中原則下才保有和平發展，讓台灣容易陷入乞求中國「高抬貴手」或是「讓利」，造成在互動過程中喪失應有的堅持而進退失據。這樣的思維不僅自我傷害了台灣的主權，也不利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昭示自己的主權地位；而在現實上，中國處處打壓台灣的國際地位，也增加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挑戰。兩岸關係若趨於緊張，台灣的政治經濟將受到很大影響，所以，成功的兩岸政策必須要能夠解除兩岸關係的緊張，但是這種解除不能只是言語上的和緩或交流的密切，必須包含中共對台軍事威脅的降低，以及台灣的國際空間不被壓縮矮化。可惜，目前兩岸對此都還沒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44]

[43] 洪耀南，〈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走向〉，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與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編（台北：時報，2015），頁 161。
[44] 洪奇昌、張國城，前引文，頁 35-36。

第三節　　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手段方式

壹、強硬手段--採取與中國相對抗的模式？

一、政治手段--推行去中國化、制憲

在不宣布台灣獨立建國的前提下，要以強硬的政治手段與中共一個中國原則對抗，「制憲」無疑是最根本的手段，因為廢除原有的中華民國憲法，建立一部以台灣為本質的新中華民國憲法，等於一次切斷與中國的淵源，也切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恩怨糾纏，更永遠切斷一個中國原則的連結，2003 年 9 月 28 日，陳水扁在民進黨十七週年黨慶晚會時，即提出 2006 年「催生台灣新憲法誕生」的重大目標。

但中共認為「制憲」就是「建國」的工作，中共涉台學者張文生認為「制憲」所代表的改革意義並不是首要的，關鍵是通過「制憲」從法理上明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他說，「『公投制憲』的根本目標是『台獨建國』，是台獨勢力企圖在島內實現『法理台獨』的關鍵一步，是台獨分裂主義的主張在法理架構上的表現，是對一個中國法理架構的突破和否定。」[45]當中共認為制憲就是建國，公投制憲就等於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就會認為陳水扁違反「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其所可能引發的後果，當不是民進黨所樂見。

除制憲外，加速「中華民國台灣化」則不失為突破一中框架的良策，民進黨在陳水扁執政時代也已嚐試過，他推動了一連串「去中國化」的運動，強化了台灣人民的台灣意識，卻仍可以向中共或美國宣稱，這與改國號沒有關係，也不牴觸「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在外交上，陳水扁命駐外單位避用中華民國國徽，改以代表台灣的梅花圖案，在第五次推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時，首度以「TAIWAN（ROC）」名稱，取代「ROC（TAIWAN）」，在護照加註台灣（TAIWAN）字眼；在教育上以本土化教育政策，在中小學實行台語教學，強調台灣主體性，以《認

[45] 張文生，〈台獨勢力的制憲活動與主張分析〉，收錄《台灣研究 25 年精粹政治篇》，孫雲主編（北京：九州，2005），頁 356。

識臺灣》教科書作為教學範本，修改高中歷史教科書，同時對中船、中油、中鋼、中華郵政等國營事業改名等，讓台灣意識在台灣內部扎根，成為主流認同，在兩岸關係的民意趨向上，「台灣人認同指數」不斷上升，「中國人認同指數」持續下降，而在馬英九執政的 7 年間，「台灣人認同指數」增長的速度比陳水扁時期還來得快，兩岸統獨指數也在 2014 年達到了新低，顯示台灣人民在國家認同上已愈來愈偏向支持獨立。[46]

不過，當台灣意識已成為台灣人民的主流意識，「去中國化」運動的階段性任務也已告終，民進黨也必須承認，當陳水扁說更改國號「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時，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已經在中華民國的國號前止步，「制憲正名」的可能性已接近於零，未來蔡英文選上總統，也不敢再挑戰中華民國的國號；而只要「中華民國」這四個字還在，台灣就很難切割與「中華」有關的元素，這裡頭包括了與中國的歷史連結和文化傳承，還有錯綜複雜的國際因素。既然切割不了，台灣意識又已成為主流，未來再加強「去中國化」運動的意義就已不再。

二、選舉手段--全民公投、學習蘇格蘭等模式

用行動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意志，或是透過統獨公投學習 2014 年蘇格蘭獨立公投，也是一種突破一中框架的手段。2004 年 2 月 28 日，陳水扁基於選舉考量及宣傳台灣首次舉行的三二〇公民投票，民進黨主辦「228 牽手護台灣」活動，台灣人民用雙手共同牽起一道人牆，從基隆一路綿延到屏東，上百萬的台灣人民一起站出來向世界發聲，表達面對中國武力威脅但仍守護台灣的決心；透過這樣大型活動的渲染，陳水扁主張的「一邊一國」論述，迅速地催化台灣人民的認同情緒，為了真正落實「守護台灣」的決心，民進黨訴求選民務必支持「三二〇和平公投」，藉以用總統選票和公投選票來展現台灣人民認同「一邊一國」的決心。

三二〇公投的議題設定，一個是「如果中共不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是否同意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強化台灣自我防禦能力」，

[46] 中時電子報，〈民眾趨獨反統 馬任內勝扁時期〉，2015 年 2 月 21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221000250-260301，查閱日期：2015/7/7

另一個是「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協商談判，推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這些公投議題背後所明示或暗示的更深層意義，卻是台灣人民正面對一個強大的敵人，而這個敵人隨時以武力威脅、恐嚇台灣人民；因此台灣人民應透過這次的公投，對這個敵人齊力一心，勇敢、大聲地說「不」，展現「台灣人民不受恫嚇、不畏威脅的堅強意志」。

陳水扁在擬訂公投題目之初，雖然為了避免三二〇公投被外界解讀成「統獨公投」，而稱為「防禦性公投」，但此舉含有兩岸對抗意識以及宣示國家主權之意，馬上引來國際注目，各國的壓力接踵而來，例如日本、美國等。而在提出兩個公投的題目後，雖然美國方面表示可以接受，但是法國仍然公開表示公投是一項重大錯誤。國際社會有這樣反應，是因為發動公投者常常預設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政治世界觀，他們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傾向透過公投舉行期間的政治宣傳、群眾動員等，訴諸並喚醒、強化此一二元對立的社會分歧，甚至是想像地建構出此項分歧，以區分我群與他群，形塑人民意志，並以公投的結果為人民意志的展現，排除異質之他群。[47]所以，在 228 牽手護台灣活動之後，支持公民投票的民眾更加支持陳水扁，但是對於連戰的支持度下降，轉變成未決定，可見得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以及統獨議題隨著選舉的逼近而越加強化與公民投票之關聯性。[48]活動與公投的手段營造出陳水扁在選舉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卻造成台灣內部族群分裂及兩岸不信任都更為嚴重。

而蘇格蘭的獨立公投與台灣不一樣，蘇格蘭至今還在倫敦的統治之下，並沒有自己的中央政府，其公投是創造獨立主權並建立自己中央政府的程序；但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從 1949 年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各有各的中央政府，台灣已擁有的獨立自主已經不需要公投去創造；而且就算進行了統獨公投，支持獨立的一方獲勝，世界各國也沒有承認台灣獨立的義務，例如蘇聯 1917 年

[47] 李俊增，〈從 Schmitt 之民主理論論台灣三二〇公投〉，《政治科學論叢》，第 26 期（2005 年 12 月），頁 14-17。
[48] 蔡佳弘，〈民主深化或政黨競爭？初探 2004 年台灣公民投票參與〉，《台灣政治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2007 年 6 月），頁 113-114。

建國，美國一直到 1933 年才給予承認，這中間的 16 年蘇聯並不因此失去他的獨立性；中國亦同，其在 1949 年建國，卻直到 1971 年才進入聯合國；反過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西方列強都承認波蘭和捷克，但當時這兩個國家並不存在。所以，台灣既已擁有獨立主權，至於國際間的承認，已經是國際政治的問題而不是有沒有公投的法律程序問題；統獨公投或許是突破一中框架的方式，對民進黨而言卻已沒有必要。

三、軍事手段--強化軍事實力，與中國對抗

90 年代面對中國的威嚇，台灣實際上在台海享有戰術優勢。1996 年台海危機時，中國對台飛彈數量實際上不超過 40 枚，質量與彈頭的載量均低，也缺乏先進的戰機與潛艦。但在 2000 年政黨輪替時，中國已經部署 200 枚左右的短程飛彈；其後在 2004 年，中國已經部署 496 枚對台飛彈，到 2009 年這個數目增加更為驚人，根據美國國防部估計，中國部署對台飛彈已經超過 1,200 枚。十三年間，中國對台飛彈部署超過 30 倍，更遑論先進的核子潛艦與戰機。更因為台灣立法院在 2000-2008 年間持續杯葛軍購預算，導致台灣軍事實力缺乏相對進展，台灣在 1996 在台海享有絕對的戰術優勢，已經被逆轉。軍事平衡改變的結果，是中國運用軍事手段解決台海問題的可能性大增，中共在 2005 年通過的反國家分裂法，對使用武力處理台灣的爭議給予法律基礎，如果能夠阻絕美國的支援，或在美國馳援前已經造成既成事實，則動用軍事力量的誘因極高。[49]

在這種態勢下，雖說強化軍事實力與中國對抗也是突破一中框架的方式，但台灣的建軍思想在馬英九執政後已經做了大幅改變，轉向不以中國當作唯一假想敵的方向調整，這有幾項作為可以印證：其一，減少國防預算；其二，不積極向美方採購軍備；其三，實施募兵制，減少兵員。所以，在馬英九政府國防預算不足國內生產毛額（GDP）3%的現況下，民進黨未來若要用軍事力量與中共對抗以突破一中框架，顯然並不討好。

[49] 賴怡忠，〈2008-2016 台灣對中國戰略的發展與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6 卷第 2 期（2010 年夏季號），頁 103。

蘇貞昌擔任黨主席時公布國防藍皮書《2025 中國對台軍事威脅評估》，強調 2016 年若執政，將提升國防預算至 GDP 的 3%，並立即啟動潛艦國造計畫，預估 2022 年可以有第一艘自製潛艦下水，並在 2025 年達成至少 8 艘的規模；然而，以中共現在的海軍建置，大陸海軍新啟用了包括 054A 型多用途全封閉導彈護衛艦、056 級輕型導彈護衛艦、052C 型中華神盾導彈驅逐艦、903A 大型綜合補給艦，而且航母遼寧艦已經試航，預估 2020 年擁有 5 艘戰略核潛艇，2014 年的國防預算是 8082 億人民幣。[50]這本國防藍皮書的軍事規劃，顯然跟不上中共建軍的腳步。

2008 年 10 月，美國國務院國際安全顧問局(Inter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ISAB)，提出 1 份中共戰略現代化(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Report from the ISAB Task Force) 的研究報告(GlobalSecurity.org, 2008)。該報告指出，所有指標都顯示中共在過去 10 年係依據「經濟發展」與「國家利益」這兩項戰略計畫行事，而其目標的優先次序，首先是台灣問題，其次是成為全球強國，而這 2 個目標都會與美國發生衝突。該研究報告指出，中共的現代化努力，重心在威攝美國勿在台海危機時與中共作戰，以及藉由威脅攻擊美國本土或其前進基地之能力，進一步限制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有限選擇。此外，中共的戰略部隊也會瞄準美國的主要盟國，例如日本，以在一旦發生美中對抗時，減弱他們與美國之間的相互支援。簡言之，ISAB 的政策建議，強調中共作為未來美國頭號敵人的必然性，建議美國大選後的新政府延續圍堵與對立的戰略態勢，以確保美國霸權地位的維繫。[51]所以，蘇貞昌這項「執政後」建軍的構想，也許只在加強台灣自身的防衛能力，告訴美國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延長中共武力犯台時台灣支撐的時間，台灣在軍事力量上實難以和中國抗衡。

四、外交手段--開展務實外交

---

[50] 中時電子報，〈蘇貞昌走回頭路〉，2014 年 3 月 7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07002092-260310，查閱日期：2015/7/4。

[51] 翁明賢，〈對歐巴馬兩岸政策的反思：台灣觀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5 卷第 1 期（2009 年春季號），頁 4。

務實外交自 1988 年李登輝開始推展後，一直是台北對外不變的官方說詞，這項外交改革運動具有相當的構想和目標，因為李登輝在上任之初對中華民國的外交現狀不滿，對「彈性外交」的名稱和作法表示不宜，認為台灣應該以更積極更務實的態度，來開創外交新局；他認為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自退出聯合國以來，很多國家都接受「一個中國」的架構，台灣的外交就必須設法突破此一架構。李登輝時代台北突破「一個中國」架構的務實外交，以李登輝訪美達到高峰。不過，實際的發展並未如預期來得樂觀，台灣自認為理性與務實的兩岸國際互動模式，並沒有被中共所接受，北京認為不論是「彈性外交」、「務實外交」都只是利用台灣經貿資源換取政治條件，用來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形成台灣與中國的永久分離化。[52]

務實的外交手段確實是在國際間突破「一中框架」的必要手段，但是接續李登輝的陳水扁在 2000 年到 2008 年任期內，進一步推動「全民外交」，目的是以多元的方式來加強外交關係；策略思考雖較為靈活，但能否成功將外交政策與兩岸政策脫鉤，其實需要諸多國際環境的配合。[53]事實證明，在當時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外交部長陳唐山等人的策劃下，臺灣的外交活動明顯增多，包括「過境外交」、「典禮外交」、「元首外交」、「 學術外交」等五花八門，甚至有邱義仁鼓吹的「烽火外交」，呂秀蓮赴印尼的「硬闖外交」，八年時期陳水扁個人就出訪友邦達 15 次之多，但結果並不理想，邦交國數目由 29 國減為 24 國，更與美國的戰略利益一再衝撞，美國政府高層官員多次發言指責，使台灣與美國的雙邊實質關係降到冰點。

馬英久上台後，與中共在九二共識的默契基礎上，在外交上推動不互挖雙邊邦交國的「外交休兵」，以及國際多邊參與的「活路外交」，[54]看似在外交上找出一條明路，但對台灣而言，外交休兵的主動權在中國，台灣只有被動權，而且是

---

[52] 鄭瑞耀，〈務實外交的發展與抉擇〉，《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4 期（1998 年 4 月），頁 2-7。
[53] 中時電子報，〈全民外交理念 衝擊外交體系，〉，2000 年 4 月 9 日，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abian2000/international/89409c12.htm，查閱日期：2015/7/7 。
[54] 黃奎博，〈從零和走向雙贏：我國活路外交的戰略轉折〉，收錄《馬總統執政後的兩岸新局：論兩岸關係新路向》，蔡朝明編（台北：遠景基金會，2009），頁 95-96。

建立在北京的默許下。民進黨對外交休兵的反彈一直存在，認為它是接受「一個中國」的前提，會讓國際社會成員對台灣法律、政治的主權地位，在認知上將更模糊，也無法避免諸如北京要求世界衛生組織內部文件上以「中國台灣省」來指稱「中華民國」、「中華台北」或「台灣」這類問題。[55]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民進黨過去的「全民外交」、「烽火外交」雖然使兩岸關係緊張，邦交國在八年內損失六個，金錢外交橫行，但卻也讓中共在外交方面防不勝防，台灣可以掌握主動爭取邦交國的機會，讓外交部官員的警覺性提高。蔡明彥教授在「兩岸外交休兵對美中台戰略三角的衝擊」一文中指出，台灣在戰略上與中國愈來愈近，一旦美國認為台灣在戰略上向中國傾斜，可能會重新評估美台關係，降低對台灣在政治、經濟、外交、及軍事上的支持，會進一步影響台灣的外交與安全利益。[56]所以，可以預見，為爭取執政權並與國民黨馬政府區隔，民進黨在外交的主張上，勢必趨向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路線，藉以突破中共一中框架的制約。

貳、柔性手段--採取與大陸接觸及說服的模式？

一、交流手段

2015 年民共交流起了一些變化，蔡英文相當倚重的民進黨副祕書長邱太三轉任桃園市副市長後，跟隨桃園市議會登陸上海訪問，而且途中脫團兩天，參訪行程異常低調；緊接著民進黨現任中國事務部主任趙天麟立委，也以海基會董事身份隨同海基會高層參訪團赴大陸交流，與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及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會面，陳德銘首先「破冰」問候趙是否來過大陸？[57]趙天麟特殊的政治身份與色彩，引發外界不少的政治聯想。

兩岸的交流在馬英九上任後七年來，在範圍與層次上日趨密切，民進黨無需

[55] 林正義，〈台海兩岸外交休兵：可能性與侷限性〉，收錄《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蘇起、童振源編（台北：五南，2013），頁 178-181。
[56] 林正義，前引文，頁 182。
[57] 中時電子報，〈綠營趙天麟登陸 陳德銘破冰問候〉，2015 年 4 月 10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10000623-260108，查閱日期：2015/7/9。

迴避，民進黨也一再強調，與中共互動不會預設前提。對民進黨而言，如果可以透過交流手段與中共接觸，甚至對話，可以增加台灣人民對民進黨處理兩岸事務能力的信賴，但問題是，中共過去認為沒有與民進黨「交流」的必要性，因為民進黨就是台獨黨，政治關係難以解套，導致國民黨壟斷兩岸的話語權，兩岸交流等於國共交流。所以，民進黨若要以柔性方式突破一中框架，民共交流是第一步。

民進黨在中共和平發展論及 2012 年敗選後，面對兩岸轉型的壓力，正好遇到馬政府拒絕配合北京議程，國共矛盾惡化的時機，中共為了促使兩岸議程走向深水區，必須爭取更多台灣人民的認同，加上體認到「防獨」大局大勢底定，中美聯合共管台海，不必再擔心台獨失控，因而開始醞釀新的政黨交流思維；不過，相較於國共交流，民共交流並未發展到制度化階段，黨對黨之間的溝通平台付之闕如，只限於個別民進黨員以個人身分參訪，除了「四處走走看看」，最多僅止於政治溝通。[58]即便是有幾位縣市首長出訪中國，也不是代表民進黨。

然而，中共決定推動民共交流，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而言仍是意義非凡，蔡英文在 2014 年中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時，即首次表示願意和他會面。[59] 張志軍雖然最後沒有和蔡英文碰到面，卻在南台灣與民進黨籍高雄市長陳菊會唔。張志軍與陳菊會面中，強調知道台灣民眾非常珍惜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方式，「大陸也尊重台灣民眾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價值理念、生活方式；兩岸不只存在地理差距，也存在心理差距，因此應鼓勵兩岸間交流。」

對民進黨與中共方面的交流，當然是良性發展，但雙方並不會因此而有重大突破，以張志軍來訪過程諸多抗爭活動來看，民進黨中央雖沒有公開發動支持者抗議，卻也沒有約束黨公職人員以個人身分抗議。抗議的發起者雖多半由台聯黨、獨派團體及學運成員擔綱，民進黨中央袖手旁觀，也仍可看出即便樂見民共交流，民進黨仍無法在短時間內拋下台獨基本教義派的群眾。

---

[58] 郭正亮，〈民共互動的前景〉，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台北：時報，2015)，頁 189-190。

[59] 中時電子報，〈首次表達歡迎陸官員來台 蔡英文願與張志軍會面〉，2014 年 6 月 6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606000808-260102，查閱日期：2015/7/9。

此外，九合一選舉後，民進黨執政縣市掀起一波的成立兩岸小組機構的熱潮，從民進黨中央的邏輯來看，顯然是希望透過地方執政縣市的兩岸小組來做為推動與中國互動的管道，從而最終達到推動民共開展務實交流的目標。不過，中共涉台學者陳先才認為效果有限，即使不少縣市的兩岸小組成員，許多本來就是經常往返兩岸間的綠營知名學者，與大陸的產官學有一定的私交與管道，但以地方事務的現實需求，展開與大陸之間的互動，其本身與兩岸之間敏感的統獨等政治高階議題的關聯度不大，雖然有助於雙方的互動與利益的增進，在民共整體沒有形成政治共識的大環境下，功效會大打折扣，也無法化解北京對民進黨兩岸政策的顧慮。[60]

即便如此，民進黨在 2014「對中政策檢討紀要」，仍鼓勵黨員尤其是縣市長要積極自信交流，2014 年 6 月台南市長賴清德首次出訪上海，他公開說，「究竟台灣社會是先有民進黨，才有台灣獨立主張？還是先有台灣獨立主張，才有民進黨？」這恐怕是第一次在中國境內，民進黨和中共公開討論台獨問題，賴清德在上海給中共三項重大訊息：一是台獨固然是民進黨的主張，但民進黨尊重台灣人民的決定；二是民進黨「凍獨」或「棄獨」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是先有台獨才有民進黨；三是民進黨尋求與中共的瞭解、理解、諒解與和解。對此，中共的反應是「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無論是誰，不管他以前有過什麼主張，只要現在贊成、支援和參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我們都歡迎。」民、共雙方的友善態度顯示彼此確有機會坐下來溝通交流。[61]

其實，不管民進黨如何界定兩岸關係，中國對台灣交流上的強勢作為，民進黨採守勢就勢必陷於被動，讓兩岸交流拱手讓給國民黨變成國共交流，不僅無法突破中共現在設定的一中框架環境，甚至不利於生存與發展；民進黨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不接受九二共識，不代表就要拒絕接觸、交流、對話，就像中共一向

[60] 陳先才，〈綠營縣市兩岸小組無法打破民共堅冰〉，《美麗島電子報》，2015 年 3 月 23 日，http://www.my-formosa.com/article.aspx?cid=6&id=77526，查閱日期：2015/7/9。

[61] 董立文，〈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走向〉，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與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編（台北：時報，2015），頁 247-248。

在遏止台獨，從來不信任台獨人士，不認為台獨人士可以改變，但卻從來沒放棄對台獨人士的統戰。所以，民進黨要認清楚，台灣主權獨立和與中共交流是兩回事，在民共交流上，必須要付出更大的耐心。

二、合作手段

一般而言，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可概括分為：政治、經貿與文化三大部分，兩岸之間雖存在主權爭議，仍可以國與國的關係參照；依據功能學派理論主張，國與國之間功能性關係的發展，可以用來避免戰爭的爆發，國與國之間交往愈密切，戰爭則愈不可能，兩岸應可在此理論上創造與增進互信。[62]2008 年兩岸經貿關係在馬政府上台後，各界交流大門敞開，尤其兩岸產業界的交流合作極為熱絡，透過不斷擴大之經貿往來，兩岸不再是獨立發展的兩個系統，而是形成既互補又競爭且互相學習的產業生態。

中共從 1979 年正式取消兩岸經貿禁令至今，陸續主動提供台灣廠商多項優惠政策，主要集中在「擴展雙邊貿易」與「吸引台商投資」兩大項目，[63]而那個年代，台灣正是面臨勞動力短缺，薪資快速的經濟起飛期，於是兩岸之間的經貿合作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便快速發展起來，這一時期兩岸產業合作領域多是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由台灣生產原材料，經由中國工廠製造組裝後進行海外銷售，兩岸形成產業垂直分工的合作模式。經過 1980 年代傳統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大量外移，到了 1990 年代已逐漸形成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製造業的主體，部分台灣中、上游廠商，為了滿足位在中國的下游廠商日益增加的需求，也逐步遷移至中國，此時台商投資中國，主要以「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型為主導，按照「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歐美銷售」的「前店後廠」模式進行產業合作。[64]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增加及投資行為，讓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依賴程度的加深；因此李登輝以「戒急用忍」政策，企圖減緩台商到中國投資的速度。

---

[62] 湯紹成，〈當前兩岸合作的思考〉，《海峽評論》，第 286 期（2014 年 10 月），頁 65。
[63] 高長，《大陸政策與兩岸經貿》（台北：五南，2012），頁 170。
[64] 孫林，〈兩岸產業合作之進展與成效〉，《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8 卷第 1 期（2015 年 1 月），頁 89-90。

但到了 2000 年後，陳水扁政府用「強本西進」取代「戒急用忍」，其結果不僅帶動對大陸出口的增加，也逐漸提高了對大陸市場的依賴。[65]

事實上，兩岸從開放至今三十多年來，除了產業經貿上的合作，還包括金融合作、司法刑事偵查合作、文化學術合作、教育合作、旅遊合作、新聞界合作等不勝枚舉，許多合作結論都在俗稱國共論壇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中獲致共識；而自 2006 年開始舉辦的國共論壇，是在民進黨執政且排斥兩岸經貿交往期間，朝野政策形成對照，響應者眾，但民進黨人士始終未同意出席。[66]民進黨與中國的合作模式，僅限於地方執政縣市與中國建立的農特產品推廣運銷平台，也就是賴清德口中會繼續推動的模式，但這種模式，其實也是一種依賴中國的模式。

這種情況到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因為大陸政策過於傾向中國，讓原本企圖透過改善兩岸關係以尋求更寬廣的國際空間的目的，變成更加依賴中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就是這個策略下的產物。從 2009 年馬英九政府提出 ECFA 的規劃，到 2010 年 6 月完成簽署，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並於 2011 年元月生效，開始對「早期收穫清單」上的產品實施關稅調降。然而，ECFA 在協商過程中，引起台灣社會的激烈反應，並形成贊成一方由國民黨代表，反對一方由民進黨代表的兩大陣營，展開了民主政治體制中公共政策辯論的大型實踐。儘管雙方都持台灣可能在區域經濟整合中被邊緣化的論點，但台灣必須認清楚這個危機存在的起源，是因為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對台灣的打壓。所以，台灣在國際經濟上有被邊緣化的危機首先是因為政治性，其次才是經濟性。

在這樣的外在條件及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民共未來要談合作，豈是容易？所以，民進黨在戰略上仍舊只有以「擱置爭議，求同存異」，與中共打交道，以突破民共合作的困境。所以，在張志軍在 2014 年 6 月在高雄與陳菊

---

[65] 吳榮義，《台灣／中國經貿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未來台灣經貿該何去何從》(台北：台灣智庫，2009)，頁 7-10。

[66] 張榮恭，〈國共平台的現況與展望〉，收錄《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蘇起、童振源編（台北：五南，2013），頁 267-269。

會唔時，陳菊向張志軍提出「兩岸城市共同發展」四點建議：增加對岸城市與高雄之間的航班、共同發展亞洲郵輪經濟圈、共同促進觀光及農漁產品的銷售、期待未來與亞太各港口城市共同發起「港灣城市論壇」；陳菊並強調，去年高雄市政府前往對岸邀請五大城市參與亞太城市高峰會，張志軍自北京特地趕來天津相會，大力促成各城市參與，這次張志軍造訪高雄，禮尚往來，她當然也要以相同的熱忱來歡迎。[67]積極促進民共合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張志軍拜會陳菊，正是落實地方政府的民共合作；張志軍將訪問台灣定位為「傾聽之旅」，正視兩岸經貿合作產生的分配矛盾問題，改變以往忽略的「三中一青」（中南部、中小企業、中下階層、青年）為參訪重點，由於民進黨的選民結構以「三中一青」為主體，張志軍在回程時納入回訪高雄，從地方交流開始可以避開民共兩黨至今缺乏共同政治基礎的障礙，同時具有擴大民共合作、擴大接觸非國民黨選民的雙重意義。[6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67] 中國評論新聞，〈陳菊唔張志軍 提兩岸城市共同發展四建議〉，2014 年 6 月 27 日，http://hk.crntt.com/doc/1032/5/9/3/103259379.html?coluid=221&kindid=11165&docid=103259379&mdate=0627101217，查閱日期：2015/7/9。

[68] 郭正亮，前引文，197-198。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胡錦濤在 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指出，未來對台政策的重點是：「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這是胡錦濤的卸任演說，也是習近平的接班起點。但什麼是何情何理的安排？2012 年 11 月 26 日，當時國台辦主任王毅指出，「合情，就是照顧彼此關切，不搞強加於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礎，不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所以，2013 年 2 月 19 日在北京所召開的中共對台工作會議，新任的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即強調：「要鼓勵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5 月 21 日，新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接受聯合報專訪時指出：「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商簽和平協議等，這些都是遲早要面對的問題，但處理起來哪有那麼容易？然而，不談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至少要坐下來交流探討。」緊接著，俞正聲在 5 月 22 日接受聯合報專訪時也表示，政治交往，首先把戰爭狀態解除，簽訂和平協議，「這也是合情合理的安排」。[1]顯然，習近平的對台政策不只是「胡規習隨」，而是創新與突破，其突破點就是「建構統一前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軍事互信機制、簽定和平協議都是選項。

事實上，在胡錦濤任內，因為堅持兩岸和平發展道路，加上馬英九親中立場，使兩岸關係水乳交融，此情況下的民進黨，在兩岸關係的角色逐漸邊緣化；中共學者指出，民進黨在 2008 年失去政權之後雖沒有渙散，但在鞏固台灣內部的支持基礎的同時，卻消極應對兩岸和平發展的趨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民進黨既未能阻止兩岸經濟關係的加深，又提不出自己的兩岸關係新主張，但在經過

[1] 范世平，〈北京近年來積極推動兩岸政治對話之目的與影想〉，《台北論壇》，102 年 6 月 25 日，http://140.119.184.164/print/P_72.php，查閱日期：2015/7/9。

近幾年的兩岸和平發展實踐後，已開始調適如何在堅持台獨立場的同時，在兩岸和平發展的環境下生存和發展。從大陸的角度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論的提出，是考慮到台灣民意在短時間內無法扭轉到統一的方向上，兩岸政治關係結構性矛盾短期內無法解決，台灣社會統一的重建也必須在台獨意識的干擾下展開。所以，中共學者認為，在兩岸關係這個領域中，台獨主張者將面臨和平發展這個大的環境和秩序，生存環境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需要調整和適應。[2]

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對於對台政策做出了原則性規定，包括「繼續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方向，穩步推進兩岸關係全面發展。國民黨繼續執政，或者有機會再次上臺的民進黨回到一個中國框架之下，大陸在對台政策中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方向就不會改變」、「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進一中框架的建構」、「反對台獨不懈怠」等；在習近平上台後，逐漸強化對台政治談判的要求力道，但卻面臨對台政策向前推進的難度逐漸加大。

在經濟方面，通過制度性安排對台灣讓利，使中國內部越來越多企業面臨不平等的競爭，如果不能在政治層面得到相應回報，將越來越難以說服企業和民眾；在政治對話與政治談判方面，台海兩岸對於政治談判與政治對話的態度幾乎沒有交集，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希望的「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馬英九卻從 2012 年 5 月連任以來所確立的任期施政目標中，完全沒有兩岸政治對話或政治談判這一項，偏偏在國際活動空間方面，台灣的要求越來越多，越來越高，如何用一中框架把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建立在明確的「一個中國」原則之上，又要讓台灣基本滿意，是個高難度的課題。[3]在在都讓中共方面漸失耐心。

2013 年 5 月 1 日資深的涉台專家、前北京聯合大學台研院院長徐博東對媒

[2] 楊劍，〈和平發展情勢下民進黨「務實台獨派」的生存與困境〉，收錄《兩岸關係：共同利益與和諧發展-全國台灣研究會 2010 年學述研討會論文選編》，周志懷主編（北京：九州，2010），頁 170。

[3] 李振廣，〈大陸對台政策前瞻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43 期（2013 年 7 月），頁 10-11。

體表示，「大陸對台政策應不分藍綠，平等交往，做得對的都支援，做得錯的都反對，不能讓國民黨和馬英九『吃定』大陸，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要由國共民三黨來共同面對和解決。」[4]在中國的專制體制下，這種對重大敏感議題講究發言精確的國家，尤其習李新體制剛起動，徐博東敢這樣談論對台政策方向，必有其憑恃之處。

事實上，國共之間雖然都站在反獨的立場，但國共間仍存有相當矛盾，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都非中共所欣然接受，習近平剛上台時尚延續胡錦濤不提「一國兩制」的做法，但對於台灣問題的自信和國力登頂後衍生的信心，對台政策重心從兩岸和平發展轉移到和平統一；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國共雙方第一次把九二共識寫在「胡連公報」上，等到 2008 年、2012 年民進黨一敗再敗，九二共識做為國共聯手在台灣總統大選打敗民進黨利器的功用已鞏固，反獨反民進黨的目標既已達成，北京便認為應該朝一中框架邁進，進入統一進程，所以 2012 年選後，中共就愈來愈少提起九二共識。到了 2014 年 9 月，習近平會見新黨、新同盟會等統派人士時，竟說「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而且不提九二共識，在北京已有十年不提「一國兩制」的情況下，這樣的說法讓國民黨戒慎恐懼。[5]

但國民黨怨不得人，2013 年 6 月 13 日，習近平與吳伯雄會面，吳習會後，國民黨發出的新聞稿強調「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主張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架構來定位兩岸關係，而非國與國的關係。」洪財隆指出，目前兩岸已經進入深水區。過去國民黨提出的九二共識，在吳伯雄、習近平提出一中架構後，九二共識裡一中各表等實質內涵，已逐漸被淘空，未來恐怕得提出新的九二共識加強版或升級版。[6]

---

[4] 中時電子報，〈藍綠平等交往 不能讓馬吃定大陸〉，2013 年 5 月 3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503000421-260102，查閱日期：2015/7/9。

[5] 林濁水，〈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走向〉，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與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編（台北：時報，2015），頁 141-147。

[6] 美麗島電子報，〈民進黨論九二共識 藍綠兩岸要角針鋒相對〉，2013 年 7 月 19 日，http://www.my-formosa.com/article.aspx?cid=5&id=45150，查閱：2015/7/9、

吳、習兩人公開達成一個中國的 framework（架構或框架），但為了應付綠營質疑及策略性安撫民眾，陸委會在事後補充「一中就是中華民國」的說法，以符合北京長期「內外有別」的態度，也就是「對內，可以講『中華民國』；對外，則『中華民國』不存在」。馬英九以台灣對自身主權的界定作為代價結果，是將藍營後繼者的戰略空間玩盡。馬英九之後，藍營能迴旋的空間將大幅緊縮，幾無空隙讓台灣喘息，其「一個中國」僅剩下「架構」與「框架」之間的語彙差別而已。[7]

這樣的態勢發展，卻意外讓 2014 九合一大選大獲全勝的民進黨獲得與中國交涉的籌碼，一來台灣在大陽花學運之後，台灣民眾對於國民黨大陸政策已出現不信任感，ECFA 的簽定並沒有為台灣經濟帶來實質上的成長，兩岸經濟快速開放更引發台灣人民的焦慮不安，2014 年 12 月的台灣民意指標調查，台灣人民以 40%對 33.4%的比例，認為民進黨比國民黨更能兼顧台灣安全及民眾整體利益，[8]這對於民進黨在 2016 年總統大選勝選具有指標意義；二來在國民黨對中共籌碼出盡的情況下，北京必須考量趁勢崛起的民進黨取得執政權的機會，並思考用什麼方式面對民進黨，而且民進黨過去對中共經濟上的讓利本來就是鐵板一塊，未來又若沒有調整中國政策就贏得大選，胡錦濤花十年建構的兩岸和平發展架構將面臨崩解。

中共必須認知到，兩岸關係的癥結在於政治上的對立與分歧，兩岸經貿合作的深化並不能取代兩岸政治協商對話，近年來兩岸經貿合作突飛猛進，經濟相互依賴日趨深化的同時，各種民調卻顯示臺灣民眾的「中國認同」不斷下降，「臺灣認同」則日益鞏固，呈現「統消獨漲」的趨勢，產生「兩岸愈交流、認同愈疏離」的矛盾。[9]

民進黨則已體認到，台灣民意對於兩岸關係的主流發展趨勢，並不在於統一

---

[7] 顏建發，〈習近平對台政策的可能架構與內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4 期（2013 年冬季號），頁 51-52。
[8] 林濁水，前引文，頁 133。
[9] 劉凌斌，〈兩岸政經互動：理論探索與路徑選擇〉，《台灣研究集刊》，第 130 期（2013 年 6 月），頁 41-42。

或獨立的爭議如何或何時終止，而是在於雙方如何透過積極交流與合作互動，讓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創造兩岸最大的利益；所以民進黨面對的兩岸問題，是如何在穩定兩岸和平發展下，與中共促成兩岸鞏固交流與互利合作的發展基礎。

想像未來其實並非憑空臆想，而是尋找可能意象與途徑，進而勾勒所有可能的情境；在想像民進黨與中國的未來時，紀舜傑以未來學者 Jim Dator 提供的未來可能途徑分析，將有四種結果：第一是一切照舊（business asusual）， 第二是成長（growth）， 第三是崩壞（collapse）， 第四是轉型（transformation）。其結果如下表：[10]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0] 紀舜傑，〈檢視民進黨之中國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2 期（2013 年夏季號），頁 96-97。

表 **1-1**：未來可能途徑分析

一切照舊 **1.** 沒有突破，也沒有倒退。 **2.** 抗拒一中原則，否定九二共識。 **3.** 中國拒絕對話，僵持不下，雙方無法找到突破僵局的方程式。 **4.** 與中國對話的機會和權力還是在國民黨。	成長 **1.** 重新執政，取得與中國對話的官方立場。 **2.** 以台灣前途決議文維基本原則，以維持兩岸現狀為論述，獲得中國的讓步，願意拋開一中原則。 **3.** 在堅持台灣主權與主體性的前提下，與中國對話交往。
崩壞 **1.** 反中勢力主導，幾乎與中國決裂。 **2.** 深綠勢力抬頭，在扁案的仇恨基礎上，新仇加舊恨，完全拒絕與中國對話交往。	轉型 **1.** 民進黨完全放棄台獨黨綱，也不提台灣前途決議文，也不堅持台灣主權。 **2.** 接受一中原則，比國民黨更積極展開與中國對話交往。

以本文第五章所述之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對策研究，以及上述當前兩岸關係態勢、民進黨自身體認及民進黨可能在 2016 取得執政權的情況下，蔡英文在 2015 年 1 月 21 日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致詞時表示，民進黨認為兩岸交流互動是無可避免的，也有能力穩健推動兩岸關係，未來將在有利台灣民主自由發展，有利區域和平安全穩定，有利兩岸互惠互利的原則下與中共交往；若蔡英文在 2016 年贏得總統大選，當可獲致未來民進黨政府與中國未來的關係，將趨向上表所列之「成長」。只不過，要得到中共的讓步，拋開一中原則，在現階段機會渺小，只能在穩定維持現狀的前提下，以交流及外交的手段嚐試突破一中框架。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民進黨突破一中框架的務實作法

壹、進行心態調整，突破一中不等於要建立臺灣共和國。

台灣獨立與建立台灣共和國從來就不是等號。1995 年時任民進黨黨主席的施明德在美國華盛頓公開表示：「民進黨如果執政，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灣獨立」；彭明敏也於同年公開表示：「台灣已經獨立數十年了，因為支持現狀就是支持台獨，只有統一才是要改變現狀」；1997 年底縣市長選舉後，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表示，「台獨黨綱是一個陳述民進黨理想的歷史文件，並不是一個要立即實現的政策」;1999 年 1 月，當時的民進黨秘書長暨新潮流系領袖的邱義仁也表示：「雖然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仍是民進黨的目標，但並不表示我們將不擇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回應選民的擔憂，並使他們相信民進黨將不會無視現實採取任何莽撞的行為。」從以上四人的言論，可知早在廿年前，民進黨在追求台灣獨立的過程中，就不是一定要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目標。

所以，當中共以一中框架作為對台政策主軸時，民進黨要突破一中框架的意圖，自然不等於要建立台灣共和國；然而，民、共兩黨對立數十年，彼此信任薄弱，近期內很難達到政治互信，中共當前的政策仍然是「防獨勝於促統」；為了穩定兩岸和平發展，在兩岸都要維持現狀的前提下，而蔡英文也已表述「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民進黨其實已沒有追求法理台獨的必要；以中華民國憲法作為民進黨的基本底限，並不損害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既存事實，而已成為歷史文件的台獨黨綱，也沒有凍結、廢除或修改的必要。在這樣的基礎下，民進黨應勇於提出未來不追求法理台獨的論述，不會再推動更改中國民國的國號或是建立台灣共和國。或許對於「不追求法理台獨」在用語上可以再修飾，或是利用保留台獨黨綱的精神，以避免引起民進黨內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反彈，但透過這樣的心態調整並付諸實際論述，除可化解中共的疑慮，並可成為與中共對話的籌碼。

貳、強化維持現狀的論述

前述「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獨」是對台灣地位重新解釋，認為台灣已經獨立，台灣只要維持國際現狀，即可確保主權獨立，無需另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而維持現狀就是「維持台灣主權現狀」，19991 年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就詮釋了維持現狀既已等於台灣獨立，民進黨就變成「維持現狀的政黨」，反之，若是推動台灣與中國的統一，將導致台灣主權現狀的改變，從此台獨將不再指向破壞現狀，反倒是統一將改變現狀。

有人說，台灣前途決議文是民進黨務實取向的結果，但其實，台灣前途決議文更是以民意為依歸，其所主張的「台灣未來，由兩千三百萬人民決定」，完全符合台灣人民「維持現狀」的希望，陸委會在 2014 年委外民調顯示，台灣人民希望維持現狀的比例為 60%；[11]維持現狀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甚至可以說是台灣共識，而所謂「維持現狀」，也就是「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現狀」。某種程度上，民進黨的兩岸論述長期遭到誤解而不為台灣人民所了解，但如果研判相關民調，民進黨的基本立場通常與台灣主流民意一致；台灣前途決議文其實可以看成民進黨維持現狀的宣示，但卻往往被誤會為往獨立的方向走，或許是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政治性」宣示太過強烈。

所以，民進黨在突破一中框假的論述上，應強化維持現狀的論述，因為維持現狀不只是維持政治上的現狀，還包括經濟上、文化上、社會上等各方面，所以未來民進黨應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基礎上，加諸前述較為軟性的議題，更清楚說明所謂的現狀是怎樣的現狀，包括哪些不會更動的現狀，強調台灣主權現狀獨立的地位，同時降低「獨」性的表現，將有利民進黨的執政基礎與民共交流。

參、營造正面和平安全環境，兩岸與外交並重

不管是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不脫以軍備的加強或限制來達到制止戰爭的

[11] 洪耀南，〈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走向〉，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與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編（台北：時報，2015），頁 159-160。

目的，也就是「負面和平」；就戰略觀點而言，台灣的軍力以及國際現實都無法經由軍事力量來保護台灣，在這樣的反省下，台灣應思考比較廣義、積極的「正面和平」，消除「結構性暴力」。負面和平屬於治療的性質，而正面和平才能有效預防衝突。[12]以民進黨先天上與中共在統獨立場的迴異，在兩岸關係上製造和平誠屬不易，只能在美國與中國在國際體系權力地位的消長中，以生存安全為前提，營造正面和平安全的環境。

馬英九上台時提出「兩岸高於外交」的政策，同時喊出外交休兵，結果在全力操作「兩岸高於外交」的戰略路線時，美國「棄台論」甚囂塵上。當然，「兩岸高於外交」並不全然是錯誤，它是認知在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主要還是在中共的態度，國際上往往因為忌憚於中共而不願支持台灣，因此只要關係良好，中共不會封鎖台灣，國際上就不必擔心激怒中國而不與台灣配合；但這個策略的結果是形同放棄台灣的外交自主權，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能看北京施捨多少。本文在之前已指出，民進黨不贊同外交休兵，認為它是接受「一個中國」的前提，讓台灣的國際參與變成兩岸化，民進黨主張從世界走向中國，所以在國際的交往上，兩岸不能高於外交，而是兩岸與外交並重，不以犧牲外交以成就兩岸，也不以外交躁進導致兩岸互信崩潰。所以，民進黨未來在面對美國時，應將亞太政經安全情勢納入對美與對中的政策考量，避免美國以過度重視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台灣與美國的交往。

過去美國雖然一再對台海緊張降低表示歡迎，卻並未因緊張降低而增加台美合作項目，美國對台灣的戰略忽視有增無減，不論是出自於美國對馬英九戰略走向的擔憂，還是美國已經不再重視台灣的戰略價值，民進黨未來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台灣與美國的新戰略互信，這個戰略互信不是出於「聯美抗中」，而是建立台灣與美國在台海事務以外的合作關係，使台灣不被美國戰略邊緣化，針對美方所關心的議題與事務，找出新的可能合作基礎，並清楚定位台灣在此的角色。

[12] 施正鋒，〈和平研究與和平教育〉，http://faculty.ndhu.edu.tw/~cfshih/journal-articles/200310.htm，查閱日期：2015/7/9。

民進黨也必須知道，除台灣以外，擔心美國勢力後撤與中國獨霸的亞洲國家，還有印度、新加坡、印尼、越南、日本、南韓等，對中國也都有相當的警覺；因此，找出台灣與這些國家的合作的可能性，透過彼此合作而增加自信，促使亞太戰略秩序不會被中國所支配，也讓兩岸安全關係嵌入亞太整體安全利益，在美國重返亞太的大戰略下，對東海釣魚台爭議、台海航線與航空識別區爭議、南海島嶼主權爭議等，尋求合作的空間，都是民進黨所必須關注的；同時，台灣也應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深化與民主先進國家的夥伴關係。

肆、建立兩岸交流平台，維持台海的穩定，本身就符合民進黨利益

從兩岸關係的具體政治操作而言，交流與合作是必然的潮流與趨勢，民進黨在中國事務委員會達成兩岸積極交流的共識結果，並打算先以智庫交流、城市交流的模式化解民、共對立的政治僵局；而中共也在太陽花學運後，調整對台政策往重視「三中一青」的路線發展，民、共應就此強化兩岸政治互信。[13]

民進黨過去並不反對兩岸交流，也願意跟中國友好往來，但民進黨必須堅持兩岸交流必須從人民與民主的角度出發，建構兩岸交流平台，因為現在的民進黨與 2000 年取得執政權的民進黨不一樣，以前的民進黨政府沒有直接與中共交手的經驗，現在的民進黨則是有實際操作過兩岸交流經驗的在野黨，而且陳水扁執政的 8 年和馬英九執政的 8 年，其兩岸政策路線剛好在光譜的兩端，皆可作為現在民進黨的借鏡。面對中國的影響力在區域與全球與日俱增，民進黨要藉此兩岸交流平台向台灣人民展現民進黨執政後有能力且會務實透明地處理兩岸問題。

此外，兩岸交流平台還可直接傳達台灣民意。以往中共會透過間接的管道或是從國民黨的角度，甚至以自己在象牙塔研究的觀點去理解民進黨的政策，較少直接與民進黨人士接觸。民進黨中央黨部在 2009 年開始要求黨公職因公赴中需要報備，報備的人數雖然逐年成長，但大多數仍是以城市交流名義的縣市議員層

[13] 陳淞山，〈拆除民、共政治壁壘的新思維與新策略〉，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與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編（台北：時報，2015），頁 205。

級，即便是縣市首長赴中也多是為該縣市產品宣傳行銷，極少政策上的交流；即便是行之有年的智庫交流、學者交流、民間對話，也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因為無法解決兩黨間的根本分歧。[14]加上民進黨黨中央曾多次下達禁令，不鼓勵黨公職參加「統戰意味濃厚」的各類論壇，如海峽論壇、國共論壇等，甚至開除參加的前立委許榮淑、前農委會主委范振宗的黨籍，影響所及，民進黨人士自身都會擔心若與中共過於密切的互動，恐會引發內部的雜音或批判，讓民共交流難以光明正大。所以，透過由黨建立的兩岸交流平台，可以讓民、共交流常態化，藉由直接的接觸、對話，增進彼此互信，共同維持台海穩定。

更重要的是，兩岸交流平台能彙集中國對台訊息，掌握中國的真實狀況，並在中國內部建立友台力量。民進黨必須瞭解到，中國雖然是獨裁體制，決策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但隨著改革開放及科技進步，讓中國人民獲得資訊管道增多，中國網民的發言漸漸百無禁忌，而且往往形成廣大輿論，中國社會逐漸對中國決策階層形成某種壓力；所以，民進黨的兩岸交流政策必須思考到如何建立與中國人民及社會的交往關係。

以前台灣在宣導「反攻大陸」的年代，台灣政府常常說要「寄希望於中國人民」，但在停止動員戡亂，兩岸解禁開放探親，人員經貿交往日深後，即便兩岸仍存在主權獨立爭議，兩岸人民觀念互異，甚至中共還未放棄武力解放台灣，台灣的朝野各黨卻鮮少有人「寄希望於中國人民」，國民黨只經營中共官僚體系，民進黨則只重視民運人士或法輪功等反共立場人士。事實上，既然要交流，就要不管是高層還是底層都要交流，兩岸交流平台可以去接觸各個層面的中國人士，直接感觸中國局勢的變化；同時，透過與中國人民在其關切議題，如人權打壓、分配不均、環境污染等問題給予關心並尋求合作解決之道，在這種交流中，台灣一方面可以深入瞭解中國的問題，一方面可以讓中國人民多瞭解台灣對各項議題的態度，「廣泛結交中國人民，化解兩岸人民的敵意，共同促進台海的永久和平

[14] 王英津，〈凍結台獨黨綱能否開啟民共兩黨互動與對話〉，《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5 年第 4 期（2015 年 8 月），頁 42。

與建立兩岸真正友誼。」[15]用彼此瞭解來建立中國的友台力量。兩岸能否化解歧異，仍然要「寄希望於中國人民」；中國每年舉辦海峽論壇，台灣每年都有好幾千人出席，即便中共是為了統戰，這不就是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16]的做法嗎？

伍、全球化視野下建立兩岸經濟競合關係

民進黨面對兩岸經濟，須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切入，中國雖然安渡 2008 年金融海嘯，但其勞動成本在高度經濟成長下也大幅上揚，中國已無法再藉由低廉勞動力成本以出口取勝，中國「十二五規劃」即以內需重於出口的需求做結構調整，企圖透過「擴內需、調結構、促消費」的手段，達到推進中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同時以科學發展為主軸，加重以人為本、改善民生的措施，謀求中共改革開放的「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公平化。[17]也因為整體經濟結構的問題，習近平在 2014 年提到中國經濟從超高成長期進入中高成長期的新常態，正反應了這個現實，也導致台商在中國的經營環境出現大幅變化，製造業普遍經營困難，和中國廠商的關係從以前的合作變成競爭，新興產業卻進入新的合作空間。

但是民進黨應該記取教訓，台灣經濟從李登輝「戒急用忍」後，由陳水扁的「積極開放」起頭，到馬英九上台進一步發展成一中共同市場的產業戰略，再到 ECFA 的簽定，廿年下來，對中國一面倒的經濟依賴在台灣社會凝聚成愈來愈強的反中情緒；尤其是台海兩岸在全球經濟失衡以及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下，迅速簽署 ECFA，台灣的經貿角色與地位在推拉間更向中國靠攏，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景氣衰退和歐債危機，形成一股強大的推力將台灣的出口導向亞洲新興市場，但來自東亞區域整合趨勢和中國內需擴大，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IIT）在東亞的增加，使得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加深，區域經濟整合參與的進展也備

[15] 童振源，《台灣的中國戰略：從扈從到平衡》（台北：新銳文創，2011 年），頁 211。
[16] 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2006 年），頁 228。
[17] 莊朝榮，〈十二五規劃與中國經濟展望〉，《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4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99-100。

受牽制，更形成台灣內部的不安。

在民進黨立場，要驟然降低台灣與中國經濟上的羈絆固然不切實際，台商選擇中國市場仍要給予祝福與協助，但更應該提出適度降低對中國依賴的政策，為台灣企業開拓在中國以外的新市場；例如日本自 2010 年起，對東南亞的投資已超過在中國的投資，這種分散策略便是民進黨在全球化必須思考的務實之舉，並視為疏散中國投資風險的機會。中國是大市場，但世界之大，並非只有中國，金磚四國扣除中國外，還有其它國家，何況還有許多新興國家。

「讓利」是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 ECFA 的定調，雖然 2011 年始啟動至今，遭遇服務貿易、貨品貿易談判的停滯，不易斷言 ECFA 的效益估算究竟是否評鑑過高，但從 2011 年以來，台灣對中國出口的增幅顯著下降，同時間台灣對東協國家的出口卻持續成長。所以，即便中國經濟成長趨緩直接衝擊出口導向的台灣也是原因之一，但此現象也透露出 ECFA 不一定是兩岸經濟發展的保護傘，「讓利」也許只是讓台灣對其依賴度提高，使台灣經濟更容易受到中國經濟情況的影響而已。[18]

而習近平在四中全會後權力越顯鞏固，以中國夢為目標，掌控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面對美國的再平衡政策，以及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高門檻的貿易規則，中國尋求「另起爐灶」，和東協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藉由拓展周邊如一帶一路、亞投行到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形塑中國為亞太經貿的「領頭羊」，使中國極力避免在雙邊關係中處於從屬地位。[19] 以此為惕，民進黨自也須竭盡全力避免在兩岸經貿關係中處於從屬地位。

[18] 蕭清松，〈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與 ECFA 實施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復興崗學報》，第 102 期（2012 年 12 月），頁 42。

[19] 張執中，〈九合一選舉後中共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展望〉，《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1 期（2015 年 4 月）頁 105-106。

參 考 書 目

中文部分

一、專書

朱浤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1999年。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特殊國與國關係：中華民國政策說明文件》。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9年。

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收錄《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頁153-210。台北：五南，1999年。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台北：正中，1997年。

吳榮義。《台灣/中國經貿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未來台灣經貿該何去何從》台北：台灣智庫，2009年。

周恩來。〈目前國際形勢及我國外交政策〉，收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頁5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

林正義。〈台海兩岸外交休兵：可能性與侷限性〉，收錄《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蘇起、童振源編，頁178-181。台北：五南，2013年。

林濁水。〈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走向〉，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與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編，頁141-147。台北：時報，2015。

邵宗海。《當代大陸政策》台北：生智，2003。

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2006，頁228。

柳金財。《大膽西進？戒急用忍？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台北：時英，1998年。

洪奇昌、張國城。〈兩岸和平發展的機遇與挑戰〉，收錄《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蘇起、童振源編，頁33-34。台北：五南，2013年。

洪耀南。〈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走向〉，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與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編，頁159-160。台北：時報，2015年。

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始末》台北：秀威，2008年。

馬紹章。〈九二共識的史實、緣起與意義〉，收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修訂版，陳錫蕃、鄭安國編，頁6-7。台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1年。

高長。《大陸政策與兩岸經貿》。台北：五南，2012年。

張文生。〈台獨勢力的制憲活動與主張分析〉，收錄《台灣研究25年精粹政治篇》，孫雲主編，頁356。北京：九州，2005年。

張炎憲、陳世宏。《吳釗燮與外交突圍》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1年。

張榮恭。〈國共平台的現況與展望〉，收錄《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蘇起、童振源編，頁267-269。台北：五南，2013年。

郭正亮。〈民共互動的前景〉，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頁189-190。台北：時報，2015年。

陳建民。《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台北：秀威，2007年。

陳明通。〈建構台灣、東亞和國際的新平衡策略〉，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頁82。台北：時報，2015年。

童振源。〈兩岸關係與台灣民意〉，收錄《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蘇起、童振源編，頁230。台北：五南，2013。

童振源。〈對民進黨的四項兩岸政策建議〉，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頁228。台北：時報，2015年。

童振源。《台灣的中國戰略：從扈從到平衡》台北：新銳文創，2011年）。

黃奎博。〈從零和走向雙贏：我國活路外交的戰略轉折〉，收錄《馬總統執政後的兩岸新局：論兩岸關係新路向》，蔡朝明編，頁95-96。台北：遠景基金會，2009年。

楊劍。〈和平發展情勢下民進黨「務實台獨派」的生存與困境〉，收錄《兩岸關係：共同利益與和諧發展-全國台灣研究會2010年學述研討會論文選編》，周志懷主編，頁170。北京：九州，2010年。

董立文。〈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夾縫中求變〉，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頁250-251。台北：時報，2015年。

劉世忠。〈民進黨兩岸政策中的美國因素〉，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童振源、李曉莊主編，頁263。台北：時報，2015年。

謝長廷。〈凝聚台灣共識靠中華民國憲法〉，收錄《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

童振源、李曉莊主編，頁121-122。台北：時報，2015年。

關弘昌。〈台灣國內選舉對其大陸政策之影響〉，收錄《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頁217-238。台北：五南，2009年。

二、期刊論文

王高成。〈台灣總統大選與台海安全：一個政治層面的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9期。2005年1月，頁23-42。

王高成、王信力。〈東亞權力變遷與美中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39期。2012年7月，頁43,49。

王英津。〈凍結台獨黨綱能否開啟民共兩黨互動與對話〉。《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總第81期。2015年8月，頁42。

王崑義。〈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共識〉。《九鼎月刊》，第41期。2011年3月，頁45。

石左。〈試論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中國特色社為主義研究》，2004年第1期。2004年7月，頁68-69。

吳玉山。〈台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選票極大化模式與戰略三角途徑〉。《遠景季刊》，第1卷第3期。2000年7月，頁17-20。

李明。〈韓戰前後的美國對華政策〉，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民國94年7月1日。

李俊增。〈從Schmitt之民主理論論台灣三二〇公投〉。《政治科學論叢》，第26期。2005年12月，頁14-17。

李振廣。〈大陸對台政策前瞻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43期。2013年7月，頁10-11。

村井友秀。〈新・中國「脅威」論〉。《儲君》，第22卷。1990年5月，頁186-197。

初國華。〈美國的中國觀點及其對台政策：從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育達科大學報》，第33期。2012年12月，頁75。

邵宗海。〈兩岸未來和平發展的方向與前瞻〉。《全球政治評論》，第40期。2012年10月，頁17-19。

邵宗海。〈兩岸談判中「一個中國原則」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78期。1999年4月，頁507。

屈建軍、張建輝。〈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為歸與展望〉。《西安航空技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30卷第6期。2012年11月，頁4。

施正鋒。〈蔡英文的中國政策〉。2011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台灣政治學會與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主辦。2011年11月11-13日。

紀舜傑。〈檢視民進黨之中國政策〉。《台灣研究國際月刊》，第9卷第2期。2013年4月，頁90-91。

夏桐。〈國共內戰與台獨無關〉。《海峽評論》，第109期。2000年1月，頁84-85。
孫林。〈兩岸產業合作之進展與成效〉。《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8卷第1期。2015年1月，頁89-90。
席來旺。〈亞太格局變化中的台灣問題〉。《台灣研究》，2001年第4期。2001年10月，頁55-60。
徐永明、林昌平。〈選舉地理如何影響台灣縣市長候選人的當選機率：1989-200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4卷第2期。2012年6月，頁122。
桑登平。〈一中框架下的兩岸新型關係〉。《唯實月刊》，2013年12期。2013年12月，頁87。
翁明賢。〈對歐巴馬兩岸政策的反思：台灣觀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5卷第1期。2009年春季號，頁13-14。
張執中。〈九合一選舉後中共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展望〉。《全球政治評論》，特集001期。2015年4月，頁105-106。
張廖年仲。〈從蘭德公司『均勢問題』報告看台海關係」〉。《亞太和平月刊》，第1卷第10期。2009年10月，頁12-14。
許志嘉。〈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2003年第2期。2003年4月，頁95。
莊朝榮。〈十二五規劃與中國經濟展望〉。《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4卷第1期。2011年1月，頁99-100。
郭震遠。〈中國內戰及其沿續中的兩岸政治關係-關於兩岸政治協商起點的探討〉。《統一論壇》，2010卷第3期。2010年6月，頁11。
陳宜中。〈羅爾斯與政治哲學的實際任務〉。《政治科學論叢》，第14期。2001年6月，頁50-51。
陳明通。〈我國大陸政策的檢討與前瞻〉。《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9期，2005年3月，頁54-59。
陳星。〈試論台灣社會分歧嬗變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台灣研究》，第120期，2014年第5期，頁38-43。
陳陸輝、耿曙、王德育。〈兩岸關係與2008年臺灣總統大選：認同、利益、威脅與選民投票取向〉。《選舉研究》，第16卷第2期。2009年11月，頁16。
湯紹成。〈當前兩岸合作的思考〉。《海峽評論》，第286期。2014年10月，頁65。
楊永明。〈從戰略模糊到三不政策：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理論與政策》，第12卷第4期。1998年12月，頁94。
熊華源、單勁松。〈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6期。2009年6月，頁45-51。
劉凌斌。〈兩岸政經互動：理論探索與路徑選擇〉。《台灣研究集刊》，第130期。2013年6月，頁41-42。
潘啟生、廖俊松。〈民進黨台灣前途主張變貌的探討〉。《東亞論壇季刊》，第450期。2005年12月，頁86。

蔡佳弘。〈民主深化或政黨競爭？初探2004年台灣公民投票參與〉。《台灣政治學刊》，第11卷第1期。2007年6月，頁113-114。
鄭夙芬。〈2012年總統選舉中的台灣認同〉。《問題與研究》，第52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108。
鄭明德。〈民進黨新潮流派系的台灣前途論述〉。《中華行政學報》，第8期。2011年6月，頁228。
鄭瑞耀。〈務實外交的發展與抉擇〉。《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4期。1998年4月，頁2-7。
賴怡忠。〈2008-2016台灣對中國戰略的發展與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6卷第2期。2010年夏季號，頁103。
顏建發。〈國民黨的中國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9卷第2期。2013年夏季號，頁67。
顏建發。〈習近平對台政策的可能架構與內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9卷第4期。2013年冬季號，頁51-52。
蕭清松。〈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與ECFA實施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復興崗學報》，第102期。2012年12月，頁42。
關弘昌。〈從國際關係理論看和平協議之簽訂〉。《全球政治評論》，第34期。2011年4月，頁29。
顧立民。〈1949-1945年台灣安全局勢研析〉。《國防雜誌》，第26卷第4期。民國100年3月，頁6-7。

三、碩博士畢業論文

何維國。〈兩岸和平協議可行性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年。

林德宇。〈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黃香梅。〈民進黨執政後派系政治與中國政策關係之研究（2000-2004）〉。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2005年。

四、報章雜誌

《中國時報》。2003年11月18日，A4版。
《自由時報》。2015年7月2日，A1版。
《聯合報》。2000年9月6日，13版。
《聯合報》。2003年10月26日，A2版。

〈1979年全國人大告台灣同胞書（全文）〉。《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年12月31日，
http://hk.crntt.com/doc/1008/4/4/2/10084425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44253，查閱日期：2015/6/14。
〈胡錦濤：維護一個中國框架原則構築兩岸政治互信基石〉。《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8年12月31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8609054.html，查閱日期：2015/6/16。
〈從安倍出訪看其外交戰略〉。《日經中文網》，2013年4月26日，
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5406-20130426.html，查閱日期：2015/7/5。
NOW今日新聞網。〈安倍晉三搭小黃會民進黨 楊進添認了：不是故意的〉，2010年11月3日，http://www.nownews.com/n/2010/11/03/621411，查閱日期：2015/7/8。
中央通訊社。〈蔡英文：中華民國就是台灣〉，2011年10月8日，
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2456-2/201110080060-1.aspx，查閱日期，2015/7/3。
中時電子報。〈「維持現狀」兩岸論述口試 蔡英文529訪美11天〉，2015年5月9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09000286-260102，查閱日期：2015/7/5。
中時電子報。〈小英：打贏選戰，大陸會朝綠調整〉，2014年7月10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10000402-260102，查閱日期：2015/7/5。
中時電子報。〈民眾趨獨反統 馬任內勝扁時期〉，2015年2月21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221000250-260301，查閱日期：2015/7/7
中時電子報。〈全民外交理念 衝擊外交體系，〉，2000年4月9日，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abian2000/international/89409c12.htm，查閱日期：2015/7/7 。
中時電子報。〈返鄉投票台商預估15萬人〉，2014年11月28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28000476-260102，查閱日期：2015/7/6。
中時電子報。〈首次表達歡迎陸官員來台 蔡英文願與張志軍會面〉，2014年6月6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606000808-260102，查閱日期：2015/7/9。
中時電子報。〈國民黨轉型，兩岸關係定勝負〉，2012年1月15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20115000234-260102，查閱日期：2015/7/5。
中時電子報。〈陳昭南撤回「廢台獨黨綱」提案〉，2000年7月16日，
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DPP_9th/89716f83.htm，查閱日期：2015/7/1。

中時電子報。〈綠營趙天麟登陸 陳德銘破冰問候〉，2015年4月10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10000623-260108，查閱日期：
2015/7/9。
中時電子報。〈藍綠平等交往 不能讓馬吃定大陸〉，2013年5月3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503000421-260102，查閱日期：
2015/7/9。
中時電子報。〈蘇貞昌走回頭路〉，2014年3月7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07002092-260310，查閱日期：
2015/7/4。
中國評論新聞。〈陳菊唔張志軍 提兩岸城市共同發展四建議〉，2014年6月27日，
http://hk.crntt.com/doc/1032/5/9/3/103259379.html?coluid=221&kindid=11165&docid=103259379&mdate=0627101217，查閱日期：2015/7/9。
中國評論新聞。〈扁系一邊一國連線內訌 台南邱莉莉退出〉，2014年12月30日，
http://hk.crntt.com/doc/1035/5/0/8/103550845.html，查閱日期：2015/7/4。
台灣醒報。〈民進黨全代會冷處理台獨黨綱〉，2014年7月20，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40720-BJVn，查閱日期：2015/7/4。
自由時報。〈台灣共識 蘇兩點堅守兩岸底線〉，2011年2月16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468937，查閱日期：2015/7/4。
自由時報。〈正常國家是民進黨願景 游錫堃：為何不敢講〉，2012年11月5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718947/print，查閱日期：
2015/7/4。
自由時報。〈兩岸關係 蘇拋出「中國加一」〉，2014年1月15日，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46975，查閱日期：2015/7/4。
自由時報。〈參選黨主席 蘇：強黨才能護台〉，2012年4月12日，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75414/print，查閱日期：2015/7/4。
自由時報。〈國務院：台灣大選美不選邊站〉，2011年9月17日，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24792，查閱日期：2015/7/5。
自由時報。〈蔡：無九二共識 推台灣共識〉，2011年8月24日，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18815，查閱日期：2015/6/14。
自由時報。〈蔡訪美：盼建立堅實溝通機制〉，2011年9月13日，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23783，查閱日期：2015/7/5。
自由時報。〈關於憲法共識〉，2011年1月15日，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460302，查閱日期：2015/7/3。
自立晚報。〈蘇看歐習會 籲陸放棄對台武力威脅〉，2013年6月10日，
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artid=20130610abcd011，查閱日期：
2015/7/4。
風傳媒。〈重返執政 蔡英文提前定調美中台框架〉，2015年4月13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70，查閱日期：2016/2/20。

美麗島電子報。〈民進黨論九二共識 藍綠兩岸要角針鋒相對〉，2013年7月19日，http://www.my-formosa.com/article.aspx?cid=5&id=45150，查閱：2015/7/9。
香港文匯報。〈謝長廷拋「憲法各表」 圖取代馬英九「九二共識」〉，2011年1月11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1/11/TW1101110001.htm，查閱日期：2015/7/2。
華夏經緯網。〈台獨組織及活動〉，http://big5.huaxia.com/zl/tw/td.html，查閱日期：2015/7/8。
華夏經緯網。〈民進黨最強派系新潮流大分解〉，2008年9月9日，http://big5.huaxia.com/jjtw/dnzq/2008/09/1156940.html，查閱日期：2015/7/3。
蘋果日報。〈「不能沒有九二共識」王雪紅挺馬〉，2012年1月14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114/33959958，查閱日期：2015/6/30。
蘋果日報。〈美示警：共軍可能犯台〉，2015年5月10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50510/36542151/，查閱日期：2015/7/6。
蘋果日報。〈美參議院法岸過關，邀我參加紅旗軍演〉，2015年6月21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621/36621057/，查閱日期：2015/6/21。
任雪麗。〈蔡訪美後台灣大選待觀察〉。《中時電子報》，2015年6月16日，http://udn.com/news/story/5/996088，查閱日期：2015/7/5。
阮銘。〈蔡英文的最後一哩路〉。《南方快報》，2012年2月13日，http://www.southnews.com.tw/specil_coul/Yuan/00/00145.htm，查閱日期：2014/12/22。
林奇伯。〈陳水扁提一邊一國，盼兩岸關係正常化〉。《台灣光華雜誌》，2002年9月號（2000年9月），頁61。
邱莉莉。〈台獨先鋒中國流？〉。《自由時報》，2006年1月15日，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53294，查閱日期：2016/3/4。
施正鋒。〈和平研究與和平教育〉。http://faculty.ndhu.edu.tw/~cfshih/journal-articles/200310.htm，查閱日期：2015/7/9。
范世平。〈北京近年來積極推動兩岸政治對話之目的與影想〉。《台北論壇》，102年6月25日，http://140.119.184.164/print/P_72.php，查閱日期：2015/7/9。
郭正亮。〈游錫堃大搞法理台獨所為何來？〉。《美麗島電子報》，2013年11月15日，http://www.my-formosa.com/article.aspx?cid=5,15&id=50574，查閱日期：2015/7/4。
陳先才。〈綠營縣市兩岸小組無法打破民共堅冰〉。《美麗島電子報》，2015年3月23日，http://www.my-formosa.com/article.aspx?cid=6&id=77526，查閱日期：2015/7/9。
滕淑芬。〈法政高手縱橫兩岸-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台灣光華雜誌》，2000年6月

號（2000年6月），頁42。

五、機關文獻

人民日報人民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形成和主要內容〉，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07/65708/65722/4444475.html，查閱日期：2016/2/18。

中國共產黨歷史網。〈新中國對台政策的發展和「一國兩制」方針的提出〉，http://www.zgdsw.org.cn/BIG5/218994/219014/220570/222734/14738569.html，查閱日期：2015/7/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一個中國原則〉，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5-07/29/content_18293.htm，查閱時間：2015/6/10。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6-02/28/content_213349.htm，查閱日期：2015/6/1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大事記（2005年）〉，http://www.gov.cn/test/2007-10/09/content_771198.htm，查閱日期：2016/2/1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日期簡表〉，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2193_611376/，查閱日期：2015/6/18。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原員會。〈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附錄）〉，1999年11月15日，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8311&ctNode=6621&mp=1，查閱日期：2015/7/5。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海峽兩岸關係紀要1999年12月〉，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52737&ctNode=5611&mp=1&xq_xCat=1999#069，查閱時間：2015/6/10。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陳總統跨世紀談話〉，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8172&ctNode=6621&mp=1，查閱日期：2105/6/29。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4701&ctNode=6501&mp=1。查閱日期：2015/6/10。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與研究中心，〈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葉劍英「對臺灣同胞的講話」全文〉，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7396&ctNode=5841&mp=4，查閱日期：2015/7/4。

民主進步黨。〈無可迴避挑戰蔡主席強調民進黨中國戰略的四個基本主張〉，2010年5月2日，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kw=%E8%B5%B0%E5%90%91%E4%B8%96%E7%95%8C&m1=07&y1=2015&menu_sn=&sub_menu=43&show_title=%E6%96%B0%E8%81%9E&one_page=10&page=3&start_p=1&act=&sn=4325&stat=&order_type=desc&order_col=add_date&data_type=%E6%96%B0%E8%81%9E，查閱日期：2015/7/1。

民主進步黨。〈蔡英文主持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智庫揭牌〉，2011年2月23日，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kw=%E5%92%8C%E8%80%8C%E4%B8%8D%E5%90%8C&m1=07&y1=2015&menu_sn=&sub_menu=43&show_title=%E6%96%B0%E8%81%9E&one_page=10&page=2&start_p=1&act=&sn=4757&stat=&order_type=desc&order_col=add_date&data_type=%E6%96%B0%E8%81%9E，查閱日期：2015/7/1。

民主進步黨。〈總統黨內初選第三場政見會　移師高雄受黨員熱烈歡迎〉，2007年5月3日，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kw=%E6%AD%A3%E5%B8%B8%E5%9C%8B%E5%AE%B6%E6%B1%BA%E8%AD%B0%E6%96%87&m1=07&y1=2015&menu_sn=&sub_menu=43&show_title=%E6%96%B0%E8%81%9E&one_page=10&page=4&start_p=1&act=&sn=687&stat=&order_type=desc&order_col=add_date&data_type=%E6%96%B0%E8%81%9E，查閱日期：2015/6/29。

陸、英文部分

Lake, David A. “Powerful Pacifists: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6, No.1 (1992), pp. 24-37.

Marsh, David and Garry Stoker，《政治學方法論》（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陳青雯、葉銘元、許文柏譯（台北：韋柏，1998），頁235。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1995), pp.5-38.

Jih-wen Lin,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Washington-Beijing-Taipei Strategic Triang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aiwan at the Edge of Empires”

conferenc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aipei, December 18, 2004.

Zaller, John. *The Nature &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6.

Weidemann, Kent. “Taiwa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6, No.34 (August 21, 1995), p.655.

Gaubatz, Kurt Taylor. *Elections and War: The Electoral Incentive in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of War and Pea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aacson, Ryan. “Re-election Pressures and the Use of Force: Evidence of Diversionary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April 20, 2006.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